

## 目 录

永利碱厂奋斗回忆录·····	陈调甫 (1)
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 ·····	吴晋航 邓汉祥 何北衡 (27)
刘湘、刘文辉争霸四川的几次战争·····	冷寅东 (52)
关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见闻·····	杨济成 (65)
四川防区制时期金融货币紊乱情况·····	吴晋航 (77)
蒋方震小传·····	张宗祥 (87)
袁祖铭“定黔”始末·····	谌志笃 (99)
王怀庆二三事·····	李纶波 (113)
民初修建清室崇陵和光绪“奉安”实况·····	杜如松 (121)
南昌教案见闻·····	王迈常 (133)
毅军沿革谈·····	黄曾元 (136)
关于南苑航空学校的资料 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吴承禧 (142)
南苑航空学校·····	杜裕源 (143)

### 附注

对《袁祖铭“定黔”始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十八辑二二二页

对《王怀庆二三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十八辑二二三页

对《南昌教案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三十一辑二九六页

# 永利碱厂奋斗回忆录

陈 调 甫

## 筹备时期的过程

純碱(碳酸鈉)是玻璃、造紙、紡織、染料、有机合成等許多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之一,亦是饅头、油条等食品发酵的必需品,其重要性与硫酸并駕齐驅。一国工业的盛衰,可以酸碱的产量多少为其指数。我們昔年各方面所需的純碱,除一小部分的天然碱(称为口碱)通过张家口运往各地外,絕大部分都是依賴英国卜内門公司輸入的所謂“洋碱”供应市場。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貨中断,碱价猛涨,苏州瑞記噶嚨水厂厂长吳次伯认为有利可图,邀我同王季同(小徐)利用該厂的碳酸气,用氨法試制純碱,得到滿意的結果,时为一九一七年秋季。

試制成功后,吳次伯同我携帶了样品,到南通訪問主张棉鉄救国的张謇(季直),劝其提倡用苏北的盐設厂制碱。他未置可否,但同我們說:“要举办大事业,必須痛下决心,預备吃苦。我办紗厂,有一次机器已到上海,因缺乏資金,擱淺在碼头上。我对着机器踱来踱去,一筹莫展,惶急万分,走投无路。”这几句話深刻地描繪了旧时代企业家的痛苦,后来我們确确实实屡次尝到这种滋味。

南通之行沒有結果,吳次伯又想利用长芦的盐,到天津通过潘

子欣的介紹，訪問了范旭東。范亦是熱心鹼業的人，他在日本西京帝大化學系結業後，曾到比利時與蘇爾維鹼業公司作過聯系，未能成功，回國後先在塘沽辦了久大精鹽廠，為將來制鹼樹立基地。他同吳晤談之後，即決定組織起來，創辦鹼廠。

吳次伯函促我與王小徐北來，我們於一九一七年冬季到津，時大水方退，牆上水痕猶新。到津屢次座談，參加者有李穆（寔四）、張弧（岱杉）、景學鈴（韜白）、潘志禧（子欣）等。大家認為我們用南方的鹽做的鹼雖然不錯，改用北方的鹽，能否合用還有疑問，因此我們決定再做一次較大的實驗。由王小徐繪了草圖，交萬有鐵廠製成一套小機器，還造了一座三米多高的石灰窯供給碳酸氣，在當時“日租界”的太和里范旭東家中建設起來。開工試制多次，大家認為滿意。

試驗完畢後，王小徐因是電學專家，對於機電事業有興趣，無意投身化工事業，不久南歸。我同范旭東到塘沽參觀久大精鹽廠（即久大老廠），該廠規模不大，用敞鍋熬鹽，一對小煙筒，高不過十米，如蠟燭然。我問范：為什麼不做一大煙筒？他說：因急于出貨，且塘沽土壤載重力低，恐有問題。

久大的試驗室，僅兩丈見方，只有章舒元一位技師。范同我在室中促膝談心，他勸我把制鹼的技術責任負擔起來，共同奮鬥。我說：“我能力薄弱，要我負擔此重大責任，等於要孩子當家。”他說：“誰都是孩子，只要有決心，就能成功。”他又說：“為了這件大事業，雖粉骨碎身，我亦要硬干出來。”我大為感動，即相約共同為鹼業奮鬥。後來我們到廠外散步，看見一堆一堆的鹽坨，外面席蓋泥封，形如小山，數之不尽。他同我說：“一個化學家，看見這樣的豐富資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後還願意葬在這個地方。”從這

次談話中，我断定范旭东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事业家，决定追随他共同奋斗。

試制成功，大家同意办厂。但制碱主要原料是食盐，制碱一担，需用粗盐两担。盐价本賤，粗盐每担不过两角，而政府抽的盐稅，則为制盐成本的几十倍。如盐稅不免，則碱的成本将超过售价，无法經營，所以我們上文政府，請求准許制碱工业用盐免稅。

当时我国是处在半殖民地的时代，盐稅又作为借款的抵押品，而根据善后借款条約所設立之盐务稽核所，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我国自办碱厂，将直接影响英商卜内門公司的碱业垄断。他們于是千方百計利用英人掌握稽核盐稅的特权，阻撓我們免稅的成功，还造謠說什么“海水不能制碱”。幸而范旭东有了破除引岸（旧时代盐商銷盐有一定的区域，称为引岸）制造精盐的奋斗經驗，又得到各方面輿論的支持，免稅一事，經過长时期的奋斗，最后总算达到目的，但反复磋商，为时很久，这个过程是相当迂迴曲折的。

聞汇丰銀行当时曾借我国財政竭蹶的机会，要挾財政总长陈錦涛将用盐制碱特权給予英商，作为借款的条件。陈拒絕不允，反催促范旭东出任艰巨，速办碱厂。帝国主义用尽千方百計阻撓我們的工业建設，手段之卑鄙毒辣，一至于此。

### 暗中摸索的設計

我因用盐免稅批准問題耗費时日，决定趁此机会自己去美国进修，后經人介紹到紐約华昌貿易公司訪問李国欽，李亦贊成在国内自設碱厂，談話甚为投机。

当时各国制碱工业，完全为几个大公司托辣斯所垄断，国际間亦有联系，保密极严，重要机器設備均由各碱厂自制。因此創辦碱

厂,与办一般的工厂不同,无从购置整套的机器,必须自己暗中摸索,自行设计。李国欽介绍了一个法国人杜瓦尔 (Duval),据他自称有制碱经验,遂同他订约,委托他设计,我亦参加工作,并供给他一切资料。杜在华盛顿玻璃厂工作,只晚间有些时间可以同他谈谈,工作进展得很慢。我发现他对于制碱学识有限,大为着急,同李商议在暑假期间请几位留学生协助进行,以促其成。

李国欽介绍侯德榜在华昌公司晤谈,一见如故。我请他来华盛顿共同设计制图,他慨然允诺。后来徐允鍾、刘树杞、吴承洛、李得庸等均来相助。

我们在杜瓦尔指导之下,共同钻研,虽有一些心得,但全部图案,缺点尚多,经过一个暑假,尚未完成,而大家都要回校上学了。我心中万分着急,到纽约同李国欽商议,李亦非常懊丧。后来与范旭东函商,他复信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设计搞得完善,多花费些时间、金钱不要紧,塘沽的厂基已买好三百亩,只等你的设计了。

后来又访到工程师孟德 (W. D. Mount),他曾任马叙逊碱业公司 (Mathieson Alkali Works, Inc.) 厂长,以顾问工程师名义登广告,愿代人设计碱厂。我同侯德榜、刘树杞约他在纽约化学师俱乐部晤谈,订约委托他设计碱厂。他索价美金二万元之巨,我们忍痛签字。

孟德从碱厂偷了一套蓝图出来,成为他的资本,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他给我一份图纸,我时常同他商议,请他结合我国情形略为变通。他就说:“修改的地方,你负责,我不负责。”我答复他:“我负责好了。”因此,彼此关系搞得并不好。他很想来中国协助我们建厂,但要求巨大的代价,我没有理他。

我曾請孟德介紹到他以前服務的碱厂去參觀，他說：“我离开之后，还不能再进去，你是外人，万万不会准你去參觀的。”我又到过席勒叩斯苏尔維厂(Syracus Solvay Co, Inc.) 訪問老工程师梯拔尔(John E. Teeple) 請其协助，亦不得要领，要求參觀也不許，仅在厂外冒雪繞了一圈，由此可見碱厂保密之严。

### 建厂时技术方面的重重困难

范旭东为人俭朴，主张艰苦朴素，我們都本此精神办事，設計完成后，决定凡是可以在国内自制的机器設備一律自制，不能自制的才由国外采购。

在国外采购的第一架机器是一工作母机，即鉋光的直径二至三米、重一吨至二吨多的大鉄圈，两端凸緣(法兰，Flange)的机床。这种机床价值很貴，我在广告中見有一架簡單机床，是一出售的旧貨，同李国欽商議购进。他表示要慎重，恐买了不合用。我因价值低廉，不到正式新机床的二十分之一，仍决定买下来。至今这架机器还屹立在塘沽鉄工車間发挥作用。

在美所购机器，如鍋炉、汽机、发电机、压缩机、真空唧筒等，均由范旭东直接汇款給华昌貿易公司李国欽，託他的公司代购。李热誠相助，省錢不少，华昌代我們买机器，只抽手續費百分之二，要算极低的服务費了。当时欧战方停，美汇价值低落，美金一元仅合国币九角至一元，这是一个千載难逢的机会，惜国人能利用此机会举办工厂的不多。

一九一九年我同徐允鍾携带图紙回国，与范旭东商議，决定交王小徐在上海所办的大效鉄工厂按图制造。該厂开办不久，規模极小，設備簡陋。因范欽佩王的为人有学者风度，誤为比商人办的

鉄厂可靠,决定交他負此重任。工作进行中,发生許多困难,例如有时鉄水温度不够,大圈鑄件砂眼特多,一部分必須回炉重鑄。机器不够,利用了我們的工作母机,采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費了两年多时间,才把所有机件鑄造完毕。

机器制好后,在运往塘沽途中屡次遭逢意外。一次由上海天通菴鉄工厂中运往碼頭,大圈落入河中,費了大劲,才打捞起来。又一次因鑄件笨重,放在碼頭,把碼頭压坏,当时所謂“法国巡捕房”同我們大起交涉,要求賠償。机件到了塘沽,卸在太古碼頭,因沒有鉄道,运入碱厂极費时间。

碱厂机件除笨重外,有一部分还需堆叠起来,垒成高塔,按装工人缺少經驗,又缺乏升高举重設備,大部分依賴人力,慢慢按装,极为費时費力。

南北两楼的建成,也是經過許多困难波折的。在当时全国还未見过十层的高楼,建筑方面的技师和工人均沒有經驗,暗中摸索,极費苦心;塘沽土壤的負重力比天津更低,又加一层困难。高建筑的設計,由楊寬麟工程师負責,决定采用鋪开式的基础(Spread Foundation)。待基础打好后,有人怀疑下部不打桩恐有問題,于是又在基础周围,打了一批板桩,使基础下的土壤不致外流,以保安全。打混凝土大半用人工,質量不好,樑柱中心有空洞不紧密的地方,模子板做得不够細致,完工后建筑外觀粗糙得很。現在逐年要修补,极費人力物料,大半由于当时施工不佳所致。高楼逐年下沉,現在的南北楼与初完工时比較,已下沉两三呎余。至今南北二楼还巍然屹立,依旧利用,总算幸事。

以上一系列事实,說明了在四十年前的旧中国,要举办重工业,一切物質条件是极为困难的。



## 人才是永利的真正基础

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范旭东一向有这样的主张，所以他竭力从各方面罗致人才。我回国后，就向范旭东推荐侯德榜来厂工作。一九二〇年侯回国见范，会谈之下，彼此甚为投机。侯同我说：“象范这样的人，是值得我們拥护帮助的。”范同我说：“我觉得侯为人很好，你荐贤应受上赏。”我说：“我不要赏，我希望能充催化剂，发生化学作用，对于事业有利，就是我的成功。”

侯德榜工作极努力，“身先士卒”，埋头苦干，穿了蓝布工作服，同工人一起操作，数十年如一日。他这种深入羣众参加劳动的精神，我自愧弗如。他从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曾用英文写成《制碱工业》一书，为世界各国碱业权威所称道，已有俄文译本，近又用中文写成《制碱工学》一书（上册已出版）。

侯德榜对于碱业的最大贡献，是改善德国察安制碱法（Zahn Process），创造了侯氏制碱法。现在此法已在国内碱厂投入生产。侯氏法的主要优点：（1）提高原料盐的利用率达98%以上，同时可以直接得到氯化铵充作肥料。（2）可与合成氨工业相联系，连续制造纯碱（ $\text{Na}_2\text{CO}_3$ ）和氯化铵（ $\text{NH}_4\text{Cl}$ ）两项成品，把两种重工业——制碱与合成氨结合起来，增加制造效能，成为联合企业。后来印度闻侯德榜名，请他为顾问。他对于印度塔塔公司的碱厂，作了很多的贡献，成绩超过英国专家。他在印度所得报酬，自己不要，赠与永利，这也是旧时代人们所不多有的风度。

范旭东再三嘱咐久大人员对于永利作无条件的协助，久大技师章舒元、文公信、杨子南、欧阳谷貽等，事实上都成为永利的顾问，不分彼此，同心协作，永利得到他们的帮助不少。后来李烛尘

正式由久大調任永利要職。

在同輩中，李年齡較長，社會經驗較深，性情長厚溫和，辦事持重而不急躁，廠中管理工作，得其助力最多。尤其是久大、永利兩個廠的一切職工福利措施，如小學、補習班、醫院、工人食堂、宿舍等，均由他苦心經營，計劃設置。在三、四十年前的舊時代，且在企業經濟極其困難的時候，能有這樣的福利措施，是難能可貴的，雖然現在分析起來，不免有幫助資本家麻醉工人的意義。

三、四十年前的舊社會惡劣環境，對於這樣偉大的事業是極其不利的，尤其是永利出貨極慢，債台高筑，四面八方受到嘲笑、謾罵、攻擊、阻礙。在此危難之際，全仗李燭塵從容應付，不屈不撓，起了不少的屏障作用；在這方面，靠幾個埋頭苦干的書獃子是應付不了的。

機器裝好，將要開工期間，我建議范旭東打破各工廠的工頭制度，羅致大學結業生擔任車間技術員，經大家討論之後，得到范的許可。我同京津各大學聯系，先後由我親往聘請的，有天津工學院陸獻侯、吳覽菴，蘇州工業學校的章懷西、陶顯均、鄒孟范及北京工學院的鍾子璜、張佐湯等十人。他們初進廠時每月工資三十五元，我盡量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他們，他們吸收很快，不久即青出于藍，成為熟練能手。後來成為慣例，專向學校要人，先後來廠的有數十人。這支隊伍是在最前綫沖鋒陷陣的猛將，亦是永利基礎的基礎，對於碱業貢獻極大。尤其值得表揚的是：他們現在都已白髮蒼蒼，到了含飴弄孫的晚年，然而絕大多數還是朝氣勃勃，埋頭苦干，雄心壯志，勝過當年，在不同崗位上繼續為祖國的化學工業服務。

侯德榜在美時，物色到工程師李佐華(Gilmer T. Lee)。他於一九二一年來廠，外號為“石灰窖”，因為他善于改良石灰窖的原故。

“石灰窖”一到我国，即同我说：“美国所有的碱厂，没有一个能一开工即顺利进行的，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修改，着实要经过许多不眠之夜，才能出货，但是我有把握，帮助你们建设好这个工厂。”这几句话后来都证实了。

“石灰窖”对于永利的贡献，有以下几点：（1）修改了石灰窖自然通风为机器鼓风，促进了燃烧过程；（2）另外设计了一个更大的石灰窖，用自动旋转机出灰，大大提高了效能；（3）加大了吸氨塔的冷却面积，增加了一系列的室外冷却管；（4）扩大了蒸氨塔的溢流管，改塔内管为塔外管，使灰乳畅通无阻；（5）增加了预灰桶，减轻了蒸氨塔的负荷；（6）设计了旋转化灰桶；（7）设计了旋转烤碱炉，这是对于旧设计的一个大革命。

“石灰窖”能与工人密切接触，亲自参加生产实践，终日不断在工地巡视操作，弄得浑身泥土。他常说：“我是实际工作者，不是戴白领的绅士。”

“石灰窖”先后在永利服务将近二十年，亦有他一定的缺点。他主观性太强，不大能容纳别人的意见。他的观察力是敏锐的，并且不断参加实践工作，所以他的建议，大部分是切实可行的；但别人亦有观察到的地方，他却不大会接受，所以最后几年合作关系搞得不太好。青年工程师们忘我地劳动，积累了许多经验，起初都自认是他的学生，后来却青出于蓝了，但是他不能容纳他们的意见，因而渐渐失去了青年的信仰。

“石灰窖”所表现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有的缺点，年龄越大，主观越深，没有宏伟的度量来吸收青年的长处，同青年合作。我们值得以“石灰窖”为镜子，照一照自己。

## 試工過程中的困難曲折

制鹼工廠整個的機器設備，是節節相連、持續不斷的一個系統，分為化鹽、燒灰、吸氨、碳化、烤鹼、蒸氨、動力共七個主要部分，一部發生障礙，全部即失去平衡，影響生產，甚至發生事故。在試工期間，大家沒有經驗，彷彿在汪洋大海中盲目航行，時時會發生障礙。試工三、四年中，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曲折停頓事故，已不能完全記憶，姑舉其一、二最大的例子如下：

初開工時，第一步所遭的困難是在蒸氨部門。我們用硫酸銨化成溶液，送入塔中，與石灰乳一接觸，即固化了，堵住了塔身的溢流管，整個三十米高的塔，搖擺起來，發出巨響，搖搖欲倒，當時情形十分危險。後來發現由於加料太多、太快，管道被固體的硫酸鈣堵住，致有危險，因而就慢慢減少進料量，才逐步好轉。原來這種蒸氨塔，應該用煉焦廠副產的粗氨液充原料，粗氨液中沒有硫酸根，就不會生成硫酸鈣而把塔身堵塞了。當時國內煉焦廠很少，不易買到粗氨液，所以造成這種困難。

試工時期最大的事故，是燒壞了烤鹼用的干燥鍋。我們最初設計時因圖省錢，採用了較簡單的干燥鍋，開工不久，鍋底燒穿，使整個工廠無法開動。後來採用了“石灰窯”的建議，由他設計一座旋轉型的干燥鍋，全部電焊，不用鉚釘。因當時國內尚不能自造，還要从美國定制運來，以至為此停工半年以上。

在試工階段，不斷發生問題。機件方面不斷要添加補充，亦就是不斷要同鐵工廠打交道。每一零件的鑄造修理，都要去天津想辦法，費時又費錢。我建議自辦一鐵工車間，買几架車、鉋、鉗孔等機器。當時經濟極為困難，范有難色，經我竭力陳說，他始首肯。房

屋、机器一共花了七千多元，成立了机修車間，由傅冰芝主持。傅学造船，对于机械有研究，与范本是同学，志同道合，所以愿担任这样一个小車間的主任。他忠于职务，努力钻研，又同有經驗的老工人何国祺共同奋斗，对于碱厂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件事雄辯地說明了，大型的化工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鉄工机修車間，是不行的。現在永利的机修車間大大地扩充了，原来的小房架还包含在大建筑中，所用老机器还在原位运轉着。

花了許多人力、物力，經过了漫长的岁月，产品終于制成了。但初次出的碱是紅色的，无法銷售，后来查出是因为鉄器受了氨及碳酸气的侵蝕，形成鉄锈所致。“石灰窑”建議加入少量的硫化鈉，使它同鉄器接触，在表面上結合一层硫化鉄的保护薄膜。这样，出的碱果然白了。原来国外采用炼焦厂的粗氨液作原料，其中本含有硫化铵，所以不会发生这个問題。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在国外不成問題的問題，到我厂就成問題了。

試工时期，技术困难已經够多了，还要加添一层經濟上的困难，二者彼此交織，困难就更加严重了。加以欧战停止，碱价大跌，出貨后能否生存还是問題，要繼續招股，当然无人問津，而所用試驗費、建設費，又远远超过了預算，不得已只好向久大借款。当时久大同永利是两个公司、两个組織，借款是不大合法的。記得有一次永利需款一万元，我拿了范旭东的亲笔条，到天津久大会計处領款。會計科长周雪亭攤开帳本給我看，并同我說：“久大資本只有四十万元，現在借給永利的已有二十万了，以后怎么办？”我惶恐得无地自容，相对歎歎。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后来幸而范旭东的同學金城銀行經理周作民，对范很有信仰，先后貸款数十万元，才能出貨。为了此事，周作民頗受到本行內部的責难。

从建厂日起,中间经过了无数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断断续续的工作,一条流水作业的长龙,经过了八年的苦干,才连接起来。在庆祝成功的时候,范旭东同我说:“我的衣服都嫌大了”,其辛劳困苦可想而知。

兹将永利抗战前纯碱年产量和平均日产量列举于下,只一九二九年因罢工三十多天,产量略降,其余年份都是一直上升的。

年 份	年产量(长吨)	平均日产量(长吨)
1926	4,504	12
1927	13,404	37
1928	15,356	42
1929	14,778	40
1930	19,463	53
1931	23,442	64
1932	31,927	87
1933	33,699	92
1934	37,459	103
1935	44,192	121
1936	55,410	152
1937 <sup>①</sup>	36,450	100

一九三〇年添建了烧碱车间,用本厂的石灰与纯碱,制成烧碱(氢氧化钠),历年产量如下:

年 份	产量(长吨)
1930	2

① 因七七事变后不久工厂沦陷,仅开工几个月。

1931	81
1932	170
1933	1141
1934	2081
1935	3380
1936	4446
1937 <sup>①</sup>	3893

### 在最困难的时期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旭东为人好学不倦，一向提倡学术研究，在永利建厂试工时期，又遇到无数的困难波折，更感觉到制碱技术高深，不可专赖外援，非自己设立规模完备的研究机关，自己钻研创造不可。因此，他决定在久大原有试验室的基础上加以扩大，于一九二二年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聘孙学悟(颖川)为黄海社长，时孙在开滦煤矿服务，来黄海后收入减去一半，但他因乐于为国人服务，不愿被外商利用，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宁愿舍去开滦的优厚待遇，同我们一起工作，这是值得钦佩的。

黄海是私人企业中设立的第一个化工研究机关，后来上海天厨味精厂吴蕴初，也办了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聘潘履洁为所长。当时人称“南吴北范”，认为他们都是具有远大眼光的企业家。

当时永利尚未出货，经济十分困难，要维持黄海，又多一份开支，人皆笑范有些傻气。范对学术研究非但有极大决心，还有坚强

---

① 因工厂淪陷，仅开工几个月。

的信心和豪迈的气概,一开始即說社中一切設備,必須能够供給一百位化学師研究之用。后来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范总是竭力維持黃海,始終不懈。抗战时期黃海迁往后方(四川省五通桥),发生很大的作用(关于黃海我已另撰一文)。

### 以私恩小惠麻醉工人

在那个时代,以范旭东为首的塘沽永(利)、久(大)团体的人員,都自命清高,自詡“热心救国救民”,努力兴办实业,抵制外貨,虽在經濟十分困难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福利設施仍很重視,例如办了食堂、医院、小学、补习学校等;有一部分技師还租住土房子(如欧阳谷貽等),而工人已住进砖木結構的寄宿舍。这样,我們以为算是“仁至义尽”了。有一次总統黎元洪来我厂参观,他很称贊我們的工人福利办得好,并說:“工人吃的饅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我厂初开工的时候,我因操作复杂,竭力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有人觉得有困难,不大贊同,經過反复辯論,最后得到了范旭东的同意。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不久,因为經濟困难,改为十二小时,但不久又恢复过来,从此成为固定制度。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工厂,我相信只有永利一家,不知对不对?

厂中还开办了明星小学校,但是没有幼儿园(当时称幼稚园)是一缺点。我因紀念故去的爱人潘瑛如,将我个人私蓄加上亲友送的奠仪,及永利送我的紅利股票二千元,充作幼儿园經費,盖了一所房屋,命名为“怀瑛堂”。

茲举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福利設施費用情况,以作参考(表見下頁)。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久大、永利福利設施費用表(以國幣元為單位)

項 別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永久聯合辦事處(專管人事福利)	1829.26	1504.42	1439.29	1830.62	1788.41	1873.61
醫院	528.33	544.82	831.82	635.14	575.70	880.38
工人宿舍	693.18	2180.58	984.62	1346.80	1572.91	1991.03
明星小學校	263.47	672.34	640.43	558.40	571.23	1354.62
幼兒園(幼稚園)	39.10	98.24	83.43	78.73	63.51	167.36
成人義務學校	91.27	141.82	260.46	158.13	163.39	295.89
以上福利措施費用總數	3444.61	5141.40	4240.05	4607.82	4729.15	6562.89

范旭東因塘沽事業進展很快，人事日趨複雜，在一九三二年成立久大、永利聯合辦事處，聘閻幼甫為處長，除管人事福利，應付當地的複雜環境外，還接受了早已出版的《海王》旬刊的編輯出版任務。這個刊物的宗旨，可由范旭東所撰“海王發刊詞”中窺見一斑，茲抄錄如下：

“塘沽的事業，自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久大呱呱墜地以來，譬如一個小孩，還是未成齡的高等小學生，幸虧他拼命地干，不僅他自己有了建樹，同時他那永利、黃海、永裕<sup>①</sup>三個小弱弟，也靠他提携保護，都漸漸地成立起來了。在平常人家，有了兄弟一個，就夠他一家的榮譽，現在我們一家有四個兄弟之多，也真夠大的了。從前侷促在塘沽一個村落里的兄弟，早已跑上國家舞台；近來他們更進一步，直奔到國際的路上去了。不過他們兄弟都還在幼年時期，社會誘惑又多，壓迫又厲害，他們這樣勇往直前地干，究竟能理解的人少，抱悲觀的人多，也真虧他們努力啊！他們既是各奔前程，所以他們的範圍越開越寬，團聚的機會一年比一年少，這真是大幸中一件至小的不幸，早就應該補救的。因此我們創辦了這個旬刊，每隔十天，大家得報告報告近況，行者居者都能夠互通消息。雖說沒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久大用巨款將當時政府接收的日本人經營的鹽灘購買進來，與山東鹽商合辦了青島永裕鹽業公司。

有什么大了不得的价值，譬如每十天大家写封家信，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有时能介绍一些新知识和好笑话，在旬刊上发表出来，使兄弟们做工和耕买卖的余暇，拿了解闷，比吃两粒劣货仁丹必定还有效些；况且家乡风味，大家当然没有不欢喜的，不仅是欢喜，还能够鼓励我们向前迈进的勇气。所以这个赠品，可以说是‘千里送毫毛’，礼虽说是轻，情意却很重的，也不可太小视它啊！”

这个旬刊出版后，对于本团体内部互通消息，加强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受到一般社会的欢迎；而且因为常常刊登科学消息，介绍新知识，也受到科学界的重视。从此外界对于本团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家都一致认为“两厂是永久团体的生产事业，黄海是永久团体的神经中枢，海王是永久团体的喉舌”。

以上一系列的所谓福利措施，现在分析起来，算不了什么，而实际上是想用私恩小惠麻醉工人，企图麻痹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驯服地工作，而资本家可以更多地剥削，占有他们的劳动所得的剩余价值。

一九二九年五月，铁工机修车间因某事开除了一个工人，发生误会，酿成三十多天的全体罢工，这说明了有阶级就有斗争，到了一定时期，原已存在的矛盾就必然爆发。用小恩小惠调和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的一种迷人手段，工人阶级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会永远受骗的。

### 与英商卜内门的斗争

卜内门公司（即皇家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是英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大企业之一，在英国议会中有极大的势力，能操纵政府，我国碱业市场向来为其垄断。他们听到我们要自办碱厂，当然不会甘心，初时利用盐务稽核所来阻挠我们制碱

用盐免稅的立案(已見上文)。临到我厂快要开工出碱的时候,盐务署竟被迫采用稽核所英人丁恩的主张,突然对我厂来一道命令,規定每用盐一担,要抽稅二角,即在制造成本上每一担純碱凭空就要增加四、五角的負担。如果这样,我們就根本无法生存,何况我們用盐制碱是在政府先行批准工盐免稅条件下,始着手开办的,乃据理力爭。官司打到平政院,居然胜訴,卜內門暗施毒計,終不得逞。

卜內門起初极看不起我們,以为注定要失敗;后来我們积极进行,漸有眉目,他們曾通过久大職員祁仍奚(能英語,后为协和貿易公司經理)頻頻向我方表示愿意“合作”,并对祁說:“你如帮了忙,一定是值得的(worthwhile,意指可給他賄賂)。”那时期技术上、經濟上的困难重重,扶得东来西又倒,人心是容易动搖的,但范旭东能坚决干下去,不被英帝国主义所吓倒,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从一九二五年永利正式出碱以后的三、四年中,卜內門多方进行破坏,不遺余力。当时我碱質量不佳,数量又少,在市場上还未打开銷路,尤其是机器不时发生障碍,供应若断若續,极为用戶所不滿,且經濟能力薄弱,成本又高。卜內門除了操縱市場,不时落价,以此来打击我們之外,复在暗中派其津行職員王某充間諜,偷窃我厂生产和建設情报,供給他們。后被永利营业部长余嘯秋偵知,与王某說妥,許以月給固定津貼,令其作反間諜。以后王給卜內門的“情报”,实际上皆由余躬亲口授,卜方矇在鼓中,阴谋詭計終于遭到失敗。

此后永利情形逐步好轉,一九二八年曾在美国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博覽会上得到奖状,信譽蒸蒸日上。当时三井洋行在日本試銷我碱一年,卜內門既在我国以落价手段来打击永利,我們即利用三井試銷机会,先以少量碱令三井在日落价出售,揚言不久有大量

碱到，并在暢銷时期突然运去一大批，以扰乱卜内門碱在日本的市場。待三井試銷屆滿，我們因卜内門时时要求我們实行資本技术合作，遭到拒絕，他們决不会甘心，乃以在日本代銷永利碱相誘。此事得到他們的同意，从一九二八年六月起，訂立代銷合同，为期三年，其后每屆三年換約一次，直至抗战为止。永利和卜内門的表面斗争，从此停止，我碱在国内的市价因以維持，其間曲折很多，极尽纵横捭阖的能事。一九三七年五月，我方与卜内門訂立协定，在中国（包括香港）分銷純碱、烧碱、洁碱，永利占 55%，卜内門占 45%，定期三年。未两月，七七事变起，分銷遂告停頓。

永利与卜内門十余年的斗争，是一种艰巨复杂的外交工作，幸而范旭东主持有方，操縱得法，終能使狡猾頑強之敌俯首就范，不敢欺我。人皆知范旭东是化学家、企业家，不知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与卜内門打交道时，有一坚定不移的原則，即对于卜内門要求投資及技术协助一层，决不应允，只許他們在营业上合作，使他們无法滲入内部压倒我們，这也是他的远見。协助范与卜内門折冲者为余嘯秋，他不仅每次会談时作翻譯，历年与卜内門通函概出其手；在交涉中的一切决定，范大半与余磋商。范曾同我說过：“余是我的得力的外交助手。”

从永利所經過的艰苦历程，可見民族工业要在半殖民地的情況下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是非常困难艰苦的事，要想完全摆脱它們的压迫，也是不可能的。

茲将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七年我厂与卜内門之純碱在国内市場銷售的比例列表如下（单位：担）：

---

① 洋碱絕大部分是卜碱，一小部分是其它国家的。

年 份	国 碱	洋碱 <sup>①</sup>	銷售总额	洋碱占%
1928	209,491	845,861	1,055,352	80
1929	277,074	934,530	1,211,604	77
1930	310,795	1,076,654	1,387,449	78
1931	340,731	768,592	1,109,323	69
1932	413,833	485,097	898,930	55
1933	485,326	394,030	879,356	45
1934	672,524	485,657	1,158,181	42
1935	715,668	448,939	1,164,607	38.5
1936	635,174	414,000	1,049,174	39.8
1937	650,005	447,400	1,097,405	40.6

### 軍閥、官吏的强盜行为

在旧时代,民族資產階級外面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内部的敌人是軍閥、官僚。一九二五年,身为直隶省督軍的李景林,竟用武力把范旭东“請”去,受到了几天的“优待”,明的勒索了八万八千元,暗中又敲詐了五万元,始得恢复“自由”。在光天化日之下,地方长官竟作强盜,这充分地表现了反动政府之腐化达到了极点。聞代李景林筹划这次綁票的,还有永、久股东张岱衫在内。旧时代資產階級的同室操戈,与軍閥混战一样,是常見的事情,这不过是一突出的例子。除了这件事以外,軍閥官僚来敲竹槓,明暗大小都有,从未平靜过。例如褚玉璞时代,某盐运使突然指令永利每担用盐先繳稅二元,比盐务署命令抽稅二角(見前文)还增加十倍。这等于一道催命符,当然除抗拒外无別法。余嘯秋根据盐务总署及財政部原有的命令,据理力爭,居然未耗分文,收回成命,然而厂中已因此

停止运盐十多天，影响了生产。

久大、永利既离不开盐，盐运使就成为我們經常要打交道的上司。这个“肥缺”常常更换（大約因油水太肥的原故），每逢新官上任，都需要去周旋一番；逢年过节，也有饋送；如有特別事务，更非“暮夜苞苴”不可。这些都是旭东常常同我談起的。說到“有錢可使鬼推磨”，我們两人都很憤慨，决心努力工作，战胜妖魔。听說只有一位桂系某盐运使沒有伸手討过錢，他在病中，对餽贈礼物亦婉辞謝絕，真是凤毛麟角，絕无仅有的了。

### 日寇侵占永利后的种种压迫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逐步向华北侵占。“何梅协定”簽訂之后，塘沽已在日寇魔爪掌握之中，永利应付周旋，頗不容易。范旭东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去南京永利鋸厂視察，事变后他曾来信說：“宁举丧，不受奠仪”，意思是宁可工厂被劫淪陷，絕不能接受任何代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永利終于被日寇劫去。我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离开了永利。

日寇占据我厂，繼續开工以后，对于机器設備只有损坏，很少改善的地方，足見“东洋”技术并不高明。但他們对工人的压迫奴役，殘酷达到极点，下面三份控訴书，就是很好的証据：

(1) “我是在一九三〇年到永利碱厂做工的。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占了工厂后，我在烧碱厂看泥泵，地下室的废碱液淹沒膝盖，把脚都烧烂了。实在干不了时，就被派到白灰窑去卸石头，身上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破衣服，肚子吃的是烂土豆、带沙子的豆餅，有时給点棒子面窝头，也是又酸又辣。身体冷，肚子饿，还要卸大块的石头，真是渾身无力，眼前发黑。日本鬼子經常打罵，用皮鞋踢，工头也是开口器，动手打，把工人当做牛馬。掙的工錢連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飽，那能养家呢？再加上特务、汉奸橫行霸道，稍不如意，就用紅汽車捆送到宪兵队，軋槓子，灌凉

水,最后用刺刀戳死。成天价挨打受罵,还提心吊胆。

“实在干不下去,想回老家河南省找个生活出路,就沿途乞討,好容易回到河南。到老家一看,鬼子和汉奸队到处烧杀擄掠,庄稼早荒蕪了,我的老娘和哥哥已經活活地餓死了。眼看那里也沒有穷人的活路,无可奈何,我含着眼泪又跑回来,只好又回工厂当牛馬。”(燒碱車間老工人王連瑞口述)

(2) “日本鬼子侵占了永利碱厂以后,我在鍋炉房燒火(司炉)。工人们吃的是树皮磨的窝窝头,象个驴粪蛋子,难往下咽。那时连鹹菜都沒錢买,每当吃飯就用白水往下送。

“那时三班连夜生产,抬煤工人吃不飽,肩上抬着大筐的煤,走在爬坡的斜跳板上,身体发晃。日本鬼子拿着檀木柄小榔头,看誰不顺眼,就沒头沒脸地打。鬼子老嫌我們燒的火不好,就經常用榔头敲我們的脑袋。我用胳膊擋了一下,他們就用榔头把我的胳膊打伤了。直到現在,我的胳膊还不能向前弯曲,就是那时留下的残疾。

“物价一日三涨,掙了工錢,连自己的最低生活都維持不了,后来就到碼頭上去当搬运工,勉强維持自己的生活。”(装卸大队老工人王光亭口述)

(3) “一九三七年以前,我在黃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当分析工,日本鬼子侵占永利碱厂以后,勒令我們上工生产。誰知鬼子的軍用倉庫着火,硬說我們和八路軍的地下工作有联系,把化学藥品給八路軍去燒倉庫,就把我們所有的分析工都裝在紅汽車上,送到鬼子宪兵队审讯。

“鬼子凶如野兽,过堂时不問青紅皂白,用木棒擡头盖頂往下打,直打得鮮血四濺,遍体鱗伤,以致神志昏迷,奄奄一息。鬼子問不出“口供”,就用輾槓子、灌凉水等慘无人道的刑罰来逼“口供”。几經生死,深知做亡国奴的痛苦和日本軍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当时身陷敌手,求助无門,只有拼着一死。在鬼子宪兵队押了四十余天,所受刑罰,駭人听闻。后来弄清燒倉庫是日人自己干的,拿我們做了肉囚,虽然最后得到释放,这笔仇恨却时常涌上我的心头。”(中央試驗室干部张玉瑞口述)

在淪陷时期日寇的滔天罪行,是說不尽、写不完的。他們对于較有規模的生产事业,用尽巧取豪夺的手段強劫而去;对工人殘暴压迫,視同牛馬。以上的控訴书所揭露的事实,不仅是少数人的遭遇,而是中国千千万万工人所受到的遭遇。是他們用血和泪写成的,讀之真令人怒髮冲冠,气愤填膺。幸而永久企业同人中,就我

所知道的，沒有一人降敌为虎作倂的。这是永利、久大的气节，亦是中国的民族气节。

### 胜利不久范旭东竟与世长辞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河山光复，举国狂欢。我們正希望范旭东能凱旋归来，重兴旧业，不料噩耗传来，他竟于是年十月四日在重庆沙坪坝小病四天后遽尔逝世。听说范旭东在美借款成功，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宋子文种种为难，他忧愤成疾，以致早死。民族资本家如此下场，旧时代反动政权的黑暗可见一斑。越二年，范的灵柩归葬北京西山。

范旭东办事勤奋，立身端正，自奉俭朴，没有任何嗜好。久大添增新股时，有几位素不相识的人登门投资，他们同范说：“我看见你出入不坐汽车，步行时居多，同别的公司经理不一样，所以我们拿辛苦积来的一些钱来投资入股，你办的事业一定会发达的。”

一九四七年开股东会时，我以书面提出“请以资产增值所加股本十一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五的股票赠与范故总经理遗族案”，全体股东一致赞成通过。

### 范旭东逝世后永利的情况

范旭东逝世后，大家推举侯德榜为总经理，收复失厂，重振旧业。大家同心协作，贯彻范的遗志，提倡久大、永利、黄海三位一体，紧密团结，并切实奉行一九三五年本团体所宣布的四项信条：

- (1)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
- (2)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
- (3)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



(4)我們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莫大光荣。

这几項信条,对于維系人心、团结合作方面,当时是能够起一些作用的。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开股东会时,我被选为永利的董事。

### 共产党挽救了永利垂危的生命

抗战胜利之后,我們发现厂中在日人占领时代,不仅很少新的发展,而且許多机器设备因被日人粗暴使用,损坏不少。幸工人尽力护厂,日寇退走时得以未遭破坏,但修复极费时日。待开工之后,四围环境越来越恶劣,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比抗战前更甚,蔣、宋等家族总視永利为肥肉,想一口吞下,不遂則用种种手段多方压迫。加以通货膨胀,法币跌价,如水下流,改为金元券,猛跌更甚。在这种状况之下,卖出成品所得的紙币补不进原料;賬面上按紙币数目看有盈余,实际上大有亏损。所卖出的成品,购主作工业生产用的很少,充囤积居奇者居多。有势力、有关系的人們,还要用压力用手段向我厂搶购純碱,以图厚利。情况如此,可称四面楚歌。

幸而霹靂一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从此这个唯一的国人自办的大型化工厂,得到了新生命。党对于这个民族工业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用收购、包銷、貸款、供給原料等种种方式,使这个奄奄一息的企业逐步复活起来,真如枯木逢春。工人阶级翻了身,当了主人,生产力解放了,潜力发挥出来了。技术大有进步,生产蒸蒸日上。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經过了經濟恢复时期,物价稳定下来,一切制造工厂才恢复为真正的生产事业,不再是“掛羊头卖狗肉”的投机事业了。

一九五二年六月,在重工业部化工局领导下,永利正式公私合

营,定名为“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除塘沽的碱厂外,南京卸甲甸的鋸厂(現称永利宁厂,归南京化学工业公司领导)一起并入。

一九五五年,久大与永利才正式合并为一个团体,定名为“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在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之下,永利、久大才真正成了一个統一的組織。

久大本是永利的老大哥。永利創始之初,股东們鉴于范旭东办久大成功,一声号召,大家响应投資,范兼任两公司的总經理,名义上虽是两个組織,大家都默认为一个团体。范首先拨出久大的一付盐滩,供永利建厂,調动大批久大人員,为永利服务。后来在进行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用款远远超过資金,在此成敗未定、千鈞一髮之际,借貸无門,股东对范已失信仰,决不肯再繼續投資。范于是采用非常手段,向久大挪借,到永利出貨之日,已积欠久大数十万元。后来决定分年陸續改借款为久大向永利的投資,一方面永利向銀行借款亦由久大担保。所以沒有这位老大哥在經濟上、經营管理上的竭力援助,永利是无法生存长大的。这位老大哥真真被小弟弟累苦了。一九二九年以后,永利生产順利,也常从經濟上帮助久大,飲水思源,感恩图报,亦合情合理。

解放以后,在合营期間,清产核資,久大在永利所投資金,几成为久大資金的全部,所以这两个机关合并为一个公司是很恰当的。

## 結 束 語

总起来說,以范旭东为首的永、久、黄团体,有两个口号,就是“实业救国”与“科学救国”。但是三十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不經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不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無論是“实业”,

無論是“科学”，都是不可能达到“救国”的目的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纵有一片爱国热忱，吃尽千辛万苦，要想达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宏愿，是絕不可能的。不論办工厂也好，搞科学研究也好，如果不改变企业私有制，生产关系不变革，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发动不起广大的羣众，事业也是不可能飞跃发展的。何况民族资产阶级本有两面性，办企业、搞科学研究的动机，也不完全純正，总含有一部分自私自利的因素在内。此外，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梦想調和阶级斗争，做到劳資两利，簡直自欺欺人，羣众是不会永久受欺騙的。

我拉拉杂杂地写了这篇短文，真是百感交集，慚愧万分。我最初因預算資金不够准确，造成了經濟上的困难，負担了庞大的債務；技术方面，我的預見性不够，机器設備屢改屢修，耗費了八年的光阴和无数的人力物力，才正式投入生产。我更大的錯誤是常常以提高永利对外的經濟上的声望为借口，帮助股东与范旭东力爭多发紅利，同时协助范旭东用种种方法麻醉工人，伪装工人的同情者，沾名釣誉，自欺欺人，及今追思，痛恨何及？

我行年七十，方知六十九年之非，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愿痛下决心，再为永利作一些最后的点滴貢獻，略尽一些后死的責任。我現在华北化工設計研究分院工作，院中的李文明、周瑞都是永利昔年的老战友，我常同他們談我院应同永利搞密切的合作。前年永利查定蒸氨塔时，我联合了我院与永利及天津大学，在三方面党委的领导下与永利职工的热誠协助下，共同努力，多快好省地完成了任务。

現处在轰轰烈烈的大搞双革四化的大风暴高潮中，永利职工發揮了冲天干劲和无穷智慧，正以乘风破浪的豪迈姿态飞跃前进，

不断有发明創造涌現出来。我亦常常尽我綿力,提出一些建議。例如:我曾建議用一部分氧气代替空气送入石灰窑,使窑气中碳酸气增加,以增加烧灰、压縮、碳化几个車間的效能。这个方法在将来有廉价的氧气时,似值得一試。我尤希望在計劃中的联合碱厂能早日完成,同时生产純碱和氯化銨肥料,使食盐中的鈉和氯可以同时被利用,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技术革命。

我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事业,热爱永利,热爱社会主义建設,虽年老多病,还愿追随青年同志之后,对于制碱工业发生一些微細的催化劑作用。我很高兴地看到,解放十年来,永利純碱产量不断提高,在最近两年的大跃进形势下,更有了惊人的发展。我希望到我八十岁的时候,国内碱厂林立,純碱年产量超过二千万吨,按人口平均計算,超过现在美国的产量<sup>①</sup>。

一九六〇年国庆节

---

① 近年美国純碱产量如下表:

年 份	純碱产量(以 1000 短吨为单位)
1955	5076.6
1956	5127.8
1957	4840.3
1958	4491.5
1959	5091.0

# 四川軍閥的防区制、派系\* 和长期混战紀略

吳晉航 鄧漢祥 何北衡

## 引 言

自从一九一六年护国軍兴,推翻了袁世凱政权以后,各地方軍閥乘机攫夺地盘,霸据一方,以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长时期的軍閥割据和互相混战的局面;而其中混战时期之长、次数之多以及为祸之烈,則以四川为最甚。論其時間之长,則四川自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一九三三年刘湘、刘文輝爭霸之战結束为止,二十余年中几于无岁不有战争。論其次数之多,則在此二十余年中的大小战争共有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論其为祸之烈,則川省各軍防区内所預征之田賦,竟达四五十年(一九三四年灌县田賦即預征到一九九五年);苛捐杂稅,名目繁多,爬梳刮剔,无孔不入;甚至強迫农民种烟,违抗不种者居然科以罰金,名之曰“懶捐”。至于战时之軍事征发、強拉兵夫以及生命财产之損失,更是难以估計。所謂“閭里蕭条,炊烟断絕,流离蕩析,十室九空”,并非过甚其詞的形容,而是普遍的实际現象。

四川軍閥的混战局面,同全国各地軍閥的混战局面相較,在实质上固无二致,然而也有其特点,即四川軍閥尽管在本省之内混战

\* 此稿曾送請熊克武先生看过。据熊先生表示,关于四川防区制的形成以及他同南方政府的关系等問題,文中所述与当时实际情形有出入。熊先生准备就这一段历史写出資料。

不休，而极少向外省扩张地盘。当一九三三年二刘大战之际，川省旅外同乡纷纷函电指责，其中某一同乡会在电文中指责川省各军阀“有野心而不务远略”，意思是说，这些军阀们只是一味地关起门来互相厮杀而不知道向省外扩张地盘和势力。这一句评语颇堪玩味。其实，四川军阀之所以只务内争而不务“远略”，并不是出于他们的主观意志，而是为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从地理环境来说，这是因为四川是一个夔门深锁、蜀道崎岖的省份，同时又是一个物质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的“天府之国”，为封建割据势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是，更重要、更基本的原因在于四川军阀和封建剥削势力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他们不仅依靠封建剥削势力来取得兵源和财源，而且他们本身也都是拥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大地主。例如大邑一县，军阀地主以百分之二·九的户数占田百分之六十六，最高占田在三万亩以上，每户平均亦在三千亩以上。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四川军阀只顾关起门来厮杀而不愿务“远略”的根本原因。当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时，适鄂北红军声势浩大，蒋介石命令刘湘调所部出川援鄂。刘湘指示其参谋长袁彬要“内重于外”，只令其屯兵宜沙，勿遵蒋令远去武汉，其关键也正在于此。其后，四川有人曾对刘湘不肯出师抗日写了一则语含双关的寓言以示讽刺，大意是说：某理发店学徒学艺期满，师傅对他：“你可以‘出师’了。”学徒不愿，师傅问何故，他说，“出了师我就不能‘乱刮’了。”这一则寓言不仅为四川军阀之“不务远略”作了注脚，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四川军阀长期混战的实质。

### 防区制的由来和川军派系的分析

所谓“防区”，就是四川各个军阀在本省之内所割据的地盘；各

个軍閥在其所割据的防区之内,不仅控制財政,把持捐稅,而且所有行政、司法、教育皆为所掌握,省政府不能过問。这本是在軍閥割据局面之下的必然現象;但是这种“防区”正式形成制度,則始于一九一七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国軍总司令时期。当熊于是年被推为四川靖国軍总司令,率軍进取成都后,兼摄軍民政務,銳意統一川政,并为川軍各部將領所拥护。第四師師長刘成勛且首先將所部旅团长名单报請总部加委,表示服从。但是熊之命令不能行之于滇黔軍防区。总部通令軍隊不得过問地方行政財政,而滇軍軍長顧品珍首先撤換資阳县知事沈燕胎,并自行委任人員繼任,省署亦只有听之。自此各軍相率效尤,漸成尾大不掉之勢。而熊克武初仅有一師实力,虽在战胜之余有所扩充,究不能控制整个川局。加之,唐繼堯另有企图,滇黔軍夹杂其間,情况异常复杂。同时,謝持、石青阳諸人复向南方政府攻訐熊“坐南向北”。孙中山先生聞之不滿,发表楊庶堪为四川省長,实行軍民分治;川軍石青阳、顏德基、黃復生、卢師誦各部亦趋向拥楊。在此情况下,熊不能不考虑今后軍費所从出,以免受制于人,增加本身困难,遂决定主客各軍就防划餉。殊不知此法一行,就种下了防区的祸根。狡黠的軍人看清有了防地便有軍費,有了軍費便可扩軍,軍愈多便容易爭防,因此便竞相扩大防区。起初各軍在所轄防区内尚只是就地划餉,后来逐渐变为就地筹餉,借墊預征,苛捐杂稅,层出不穷,有增无已。軍費有着,就不断扩軍;实力扩大,又不断爭防,以致演成循环不已的内战。

民国初年川省軍隊最初只有三个師:朱廳丞領第一師,朱去后由周駿繼任;彭光烈領第二師;孙兆鸞領第三師。后又增編兩師:刘存厚任第四師師長,熊克武任第五師師長(第五師是由原来的蜀軍改編的)。一九一四年陈宦率領北洋軍馮玉祥、伍祥禎、李炳之

三个混成旅入川后，川軍曾一度裁減。討袁以后，川軍仍恢复为五个师：周道刚領第一师，刘存厚領第二师，鍾体道領第三师，陈泽霈領第四师，熊克武領第五师。

一九一七年靖国軍击败刘存厚后，川軍已扩編为八个师，即：但懋辛第一师，刘湘第二师，向传义第三师，刘成勳第四师，呂超第五师，余际唐第六师，陈国栋第七师，陈洪范第八师，此外尚有石青阳、顏德基、黃复生、卢师誥四路司令。

一九二〇年，川軍團結一致驅逐滇黔客軍后，刘湘为川軍总司令兼省长，由各軍合組点編委员会，点驗枪枝，整編部队。点驗結果，川軍共为三个軍，十个师，九个混成旅，一个川边軍，一个边防軍，各軍番号如下：第一軍軍长但懋辛，第二軍軍长刘湘，第三軍軍长刘成勳；第一师师长喻培棣，第二师师长唐式遵，第三师师长邓錫侯，第四师师长潘文华，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第六师师长余际唐，第七师师长陈国栋，第八师师长陈洪范，第九师师长楊森，第廿一师师长唐廷牧(北軍番号)；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輝，第二混成旅旅长张冲，第三混成旅长李树勳，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彬，第五混成旅长张成孝，第六混成旅旅长刘炳勳，第七混成旅旅长藍世鈺，第八混成旅长田頌尧，第九混成旅长刘斌；川北边防軍总司令賴心輝，川边鎮守使陈遐齡。

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川省軍隊虽有所增加，其数不大；而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这两三年中則成倍增长，这显然是防区制直接造成的結果。一九二〇年扩編的川軍，还是經過各軍共同点編而成的，其編制和番号还是統一的。在这以后，直到一九三二年二刘之战結束，川省几乎无岁不有內战，而每經一次战役，即有一次扩軍，其扩軍的方法亦与前不同，即：番号与編制均由各个軍閥



自行决定,漫无限制,这也是防区割据形势之下的必然现象。

一九二六年秋,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委杨森为廿军军长,刘湘为廿一军军长,赖心辉为廿二军军长,刘成勋为廿三军军长,刘文辉为廿四军军长,邓锡侯为廿八军军长,田頌尧为廿九军军长。自此以后,四川的防区制就更具体化了。当时蒋介石尚无力深入四川,就利用各军对立,多方挑拨,以便从中操纵;表面上希望四川统一和平,而实际上是以毒攻毒。因此,四川政局的波动,更层出不穷。

在历年大小军阀混战的情况下,各军实力不断扩充,防区亦时有变动。一九二六年間,廿军杨森所部共七个混成旅,約三万人,原驻下川东,后被刘湘击溃,移驻渠县、广安、岳池、蓬安、营山等县。廿一军刘湘所部六个师、八个司令,約十一万人,驻重庆下川东廿余县,极盛时約达四十县,部队扩充到卅万人之多。廿二军赖心辉所部人数較少,驻泸州、合江、江津、永川、納溪、古蔺等县。廿三军刘成勋所部驻新津、邛崃、蒲江、大邑、崇庆、名山、雅安等县。刘、赖两部先后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間被刘文辉击败,所属防区亦悉刘文辉所占。廿四军刘文辉所部八个师,五个司令,人枪約十余万,极盛时据有上下川南及川东北七十余县。廿八军邓锡侯所部三个师,七个混成旅,两个司令,約六万人,驻华阳、新都、广汉、彭县、郫县、新繁、崇宁、温江、灌县及松潘、理县、懋功、茂县等廿余县;其所指揮的李家钰驻遂宁、安岳、蓬溪等县,陈书农驻合川、武胜、潼南等县,儼然另成为两个小防区。廿九军田頌尧所部三个师,三个路司令,約四万五千人,驻成都及川北綿阳、三台等廿余县。邓锡侯、刘文辉、田頌尧曾有一段时间合作,曾經在成都組織三军联合办事处,以向传义为軍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此外,还有刘存厚所部驻綏定、宣汉等数县。

防区制形成以后，各軍首脑人物为了保持和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实力，遂不免互相勾結，互为声援。他們或者利用封建宗法和乡土关系，結成派系；或者以所領部队作为基础，各树一帜。前者如刘成勳、刘湘、陈洪范以同乡关系結成大邑系；后者如一九二〇年但懋辛、刘湘、刘成勳分任一、二、三軍軍长以后，就形成了以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一軍系和以刘湘、楊森为首的二軍系。而当一軍熊克武主持川政时，内部即有九人团之核心組織。至于二軍系，則自一九二三年刘湘被迫下野，楊森率殘退鄂西以后，二軍旧部希望刘湘乘机再起，又感到力有未逮，于是有二軍刘湘、三軍刘成勳、边防軍賴心輝、八师陈洪范、九师刘文輝五部（即所謂“二、三、边、八、九”）之結合，最后演变成为二刘合作。一九二三年刘湘任四川善后督办以后，二軍系又分化为新、旧两系：潘文华、唐式遵、王陵基等属于刘湘之旧二軍系；王纘緒、王兆奎、郭汝栋等則属于楊森之新二軍系。

至于各个軍事首脑人物另一种勾結的方法，則是利用他們各自所出身的軍事学校的同学关系。以“学派”为标榜，結成軍事派系。

川省各軍事学校出身的首脑人物，大約如下：

武备学堂①：刘成勳、王陵基、胡忠亮、彭光烈、孙兆鸞等；

官弁学堂：馬德斋、陈国栋等；

四川速成学堂②：刘湘、楊森、潘文华、唐式遵、王纘緒等；

---

① 清光緒时岑春煊督川，以制营及巡防軍皆漸腐朽，奏請清廷创办武备学堂，又另在制营內抽調精干人員，成立官弁学堂，訓練新的軍事干部，来改造旧的軍隊，以挽救搖搖欲墜的統治。

② 錫良督川，又在各县招募优秀青年，建立弁目队，同时成立速成学堂，訓練下級干部，并将弁目队成績优良者送入速成学堂，为建新軍准备条件。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向傳義、呂超、陳鼎勛、夏首勛、孫震等；

保定陸軍速成學校：張羣、張為珊等；

四川軍官學校<sup>①</sup>：李家鈺、羅澤洲、陳鴻文等；

陸軍大學：陳洪范、鮮英、王靖宇等；

雲南講武堂：賴心輝；

日本東斌學校：熊克武、但懋辛、王麗中等；

日本士官學校：尹昌衡、胡景翼、周駿、劉存厚、徐孝剛、周道剛、鍾體乾等。

上列這些軍事首腦人物之中，標榜“學派”，結成派系，且歷時較久，並對川省政局變化影響較大的，有：

1. 速成系（亦即前述的二軍系），以劉湘、楊森為首；
2. 武備系，以劉成勛為首；
3. 保定系，原以鄧錫侯、田頌堯、劉斌為首，劉斌去職後代之以劉文輝；
4. 軍官系，以李家鈺、羅澤洲為首。

此外，川省防區形成後，各軍都辦有軍事學校，名稱不一，如熊克武、楊森先後在成都所辦的四川陸軍講武堂，劉湘所辦的軍官傳習所，劉文輝所辦的軍事政治學校等等。這些軍事學校所訓練的人才，大部分是充當各軍中下級軍官，間亦有少數升到師旅長者。這類軍事學校各成系統，亦為促成地方多事原因之一。

---

<sup>①</sup> 武備學堂結束後，各省設陸軍小學，數省聯合設陸軍中學。四川與陝、甘、豫為一區，設陸軍中學於西安。中學入伍見習後，才得轉入保定軍官學堂。辛亥革命後，情況發生變化，四川陸軍小學學生不能到省外陸軍中學升學，遂改稱四川軍官學堂。

上述川軍各派系，實質上都是以爭奪地盤、擴張實力的共同利害為前提而以同鄉、同學等等關係作為幌子所結成的封建軍閥集團，一旦共同利害消失而彼此矛盾突出時，便往往馬上翻臉無情，互相火併。例如劉湘、楊森雖同為速成系，但自一九三二年以後新舊二軍之分裂以及後來的下川東之戰，他們的關係就撕得粉碎。又如劉文輝與鄧錫侯、田頌堯雖同為保定系，然而相互之間勾心鬥角，矛盾重重，最後亦終於以兵戎相見。即此兩例，可概其餘。當一九三二年秋二劉醞釀第二次大戰時，天津《大公報》曾發表過一篇以“川局醞釀與中央處置”為題的社論，對四川軍閥混戰作了如下一段頗為切合實際的概括：

“查川省養兵百萬，巨餉六七，成都一地，分隸三軍，全省割裂，有同異國。其最大特色，為兵愈打而愈多，帥時離而時合，亦友亦仇，隨和隨戰。要之，萬變不離其宗者，為擴張私利，保存實力，誅求無厭，剝削地方。故夫人欲橫流，百般詐譎，捐輸苛酷，并世無兩。論地丁有征至民國四十五年，論置產有買盡全县全城房地。……論其民生困苦之情狀，則此天府之國，早墮入地獄底層。蓋兵益多則餉益絀，餉益絀則爭益甚，軍閥之莫能相安者，勢則然也。”

以下再就辛亥革命以後的四川局勢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川軍最後一次混戰——二劉第二次之戰止，這二十多年四川軍閥混戰的歷史作了一個扼要的敘述。

### 辛亥革命以後的四川局勢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武昌起義後，川籍同盟會員朱之洪、楊庶堪、張培爵、謝持等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重慶獨立，推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同月二十七日，成都四川總督趙爾豐被迫宣布將四川全省事務暫交諮議局議長蒲殿俊自治，眾推蒲殿俊為都

督，第十七鎮統制朱庆瀾为副都督。蒲是书生，朱又是外省人，就职仅仅十天，成都即发生十月十八日的兵变事件，防軍四出焚劫，全城騷然。蒲、朱政权即因此垮台，由原督練公所教練处会办尹昌衡繼任都督，諮議局副議長罗綸任副都督。尹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清宣統年間任第十七鎮教練官、陸軍小学堂总办、督練公所教練处会办等职。十七鎮秋操时，尹任評判官，对总督赵尔巽、統制朱庆瀾以及北方調来的一些軍官都尽情攻訐，于是本省的各級軍官，尤其是武备学生和官弁学生等都非常支持他。他有了这些条件，所以能够取得都督的地位。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成、渝两軍政府合并，尹昌衡仍任都督，重庆軍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

一九一二年六月間，西藏派兵进犯川边，尹昌衡自任西征軍总司令，率兵抵御，而以胡景伊护理四川都督。尹与胡是日本士官同学，平时对胡頗推重，常以智勇沉謀贊揚之。殊尹往川边后，胡景伊企图夺取都督地位，即派胡忠亮为代表到北京，通过參謀部次长代理部务的陈宦向袁世凱輸誠。陈宦曾任过四川武备学堂会办，胡忠亮系武备生，同陈有师生关系，而陈在当时又为袁氏所倚重。由于陈宦的关說，袁世凱便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而以川边經略使敷衍尹昌衡。尹甚不愿，回成都后与胡暗斗甚烈。当时省垣有部分人士主张仍欢迎尹任都督，省議會議长胡葆生就是其中主张最力的人，曾經径电袁世凱迎尹去胡。袁复电申斥，并命尹昌衡入京覲見。尹到京不久，即被袁扣押。

胡景伊取得都督后，在軍事方面以士官同学刘存厚、周駿及武备生胡忠亮、彭光烈、孙兆鸞等为骨干，各級軍官中都以士官、武备学生为基础。政治方面則用共和党来排斥国民党；裴綱、黄云鵬、张春涛、刘輔周等都是忠于胡景伊的共和党分子。癸丑之役以后，

胡景伊为根除国民党势力,效忠袁世凯起见,对于在川的国民党人摧殘压迫,不遺余力。

### 护国战争与滇黔軍入川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袁世凯为欲进行帝制,控制西南,特派陈宦为四川軍务会办,率領北洋軍隊馮玉祥、伍祥禎、李炳之三旅来川。陈到重庆后,袁即任命陈为成武將軍兼四川巡按使,另以將軍名义調胡景伊入京。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蔡鍔開关入滇,云南宣布独立,并組織护国軍,蔡鍔、戴戡各率滇、黔軍分道入川。袁世凯命陈宦分两路进攻滇省,并命曹錕率重兵入川,进窺滇、黔。陈即派顧問刘一清为总指揮,率伍祥禎、馮玉祥两部,拟由叙府經老鴉滩向昭通方面进攻;一面派刘存厚率川軍由叙永經貴州毕节向霑益方面进攻。伍、馮两部在叙府方面被刘云峯指揮的滇軍楊蓁、邓泰中等部击败。刘存厚曾在云南任过管帶,系蔡鍔旧部,又是士官同学,也跟着通电附蔡,反对帝制。陈本是主张帝制最力的人,此时見形势不佳,便采取两面手法,表面积极拥护帝制,暗中則利用刘一清及將軍署副官长邓汉祥、巡按使署总參議楊穆生、旅长雷飜等同蔡鍔通气。陈宦在蔡鍔的催促下,于一九一六年五月廿三日宣布独立。嗣因袁世凯命駐重庆的曹錕协助周駿、王陵基率兵西上,进攻成都,又因馮玉祥主张回陝,不愿到东路截击周、王,陈不得已,始离开成都。

周駿、王陵基进入成都后,蔡鍔限令各軍攻取隆昌、內江、資中。熊克武克隆昌,雷飜克內江,顧品珍克資中,各部乘胜西进,击潰周駿、王陵基,周、王向北道逃窜。

### 刘存厚、罗佩金、戴戡爭夺川省政权之战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黎、段当即任命蔡鍔为四川督軍兼省长，戴戡为四川軍务会办，刘存厚为軍长。蔡鍔在成都通电就职后，护国軍參謀长兼滇軍总司令罗佩金遇事与蔡鍔为难。滇軍将领对蔡鍔虽很推崇，但蔡是湖南人，所以实际掌握滇軍的还是罗佩金。罗企图逼走蔡鍔，取而代之。蔡又病重，因之离开成都，赴日本就医。蔡走后，督軍职务初由罗佩金代理；不久蔡在日病故，北京政府即以罗佩金繼任四川督軍。戴戡因梁启超在段祺瑞方面力保，得任四川省长，仍兼軍务会办。刘存厚以曾参加討袁有功，而又是四川人，但軍民两政均为滇罗、黔戴所得，甚为不满。罗佩金深知刘存厚和他势不两立，对刘多方抑制。罗复以裁軍节餉为名，用武力解散川軍第四师陈泽霈部，更激起刘存厚的憤怒和恐惧。刘也借此指責罗佩金削減川軍，扩充滇軍，有地方狹隘偏見，遂举兵抗罗，因而在成都发生战事。

滇、黔軍虽在表面上联合起来吃四川，实际上因罗佩金的背景是国民党，戴戡的背景是进步党，由于政治路綫的不同，刘、罗战争时，戴戡便采取中立态度。罗佩金被迫分两路退出成都，一路移駐資中一带，一路退向叙府方面。北京政府免罗佩金督軍职和刘存厚軍长职，梁启超便乘机向段祺瑞建議，由四川省长戴戡兼任督軍，于是省长、督軍、会办三要职均集于戴戡一人之身。刘存厚不但一无所获，連原有地位都不能保全，愈憤憤不平，因而又在成都发生刘、戴战争。张勳复辟时，发表刘存厚为四川巡撫，刘未表明态度，戴戡以此責备刘存厚，这也是促成战事的重要因素。

黔軍勢孤，退守皇城，求救于滇軍。羅佩金雖在文電上表示援助，但始終按兵不動。戴守皇城十餘日，因彈盡糧絕，始接受地方人士的調解，退出成都。劉存厚派兵沿途截擊，戴戡行至仁寿县所屬秦皇寺（一說在華陽姚子壩），勢窮力竭，即行自殺。旅長熊其勳被俘，亦登時殞命；參謀長張承祜、財政廳長黃大暹均死于亂軍之中。

戴戡兵敗身死后，滇軍又舉兵與劉存厚部激戰，久不能決。北京政府乃任命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道剛為督軍，張瀾護理省長。黔軍王文華借討伐劉存厚為名，以黔軍總司令名義，率領袁祖銘、盧燾、胡璣等部入川，同時唐繼堯亦有到川督師之說。北京政府復任劉存厚為四川軍務會辦，段祺瑞并派長江上游警備司令吳光新率兵入川，表面是說查辦劉羅、劉戴交關事件，實際上則是支援川省，對抗滇黔。至此，川省主客之戰一變而為南北之爭。

嗣因段祺瑞派到湖南進攻兩廣的直系將領王汝賢、范國璋在總統馮國璋的策動指使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通電主張停戰，而直隸督軍曹錕、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等通電贊成王汝賢等停戰主張，因此進一步演成為馮、段之爭。段祺瑞為形勢所迫，呈請辭職。吳光新到重慶時，新任川督周道剛及重慶鎮守使兼第五師師長熊克武均在重慶。吳知周、熊暗斗甚烈，遂多方拉攏熊克武；熊也想利用吳之權勢，來便利他的企圖。但吳希望熊打滇、黔軍，而熊以護國之役曾同滇、黔軍合作，未便反目為借口，未按照吳之意旨行事；周道剛又力量有限，不足以成事。吳知事不可為，他的靠山段祺瑞又已下野，乃不得不撤退，由重慶移駐宜昌。吳退走后，滇、黔軍遂乘機進取重慶。周道剛部王右瑜旅宣布加入南方護法，但所部譁變，往投劉湘。劉湘雖是第一師的旅長，素與王右瑜不和，對周道剛亦無深切關係。劉



存厚同周利害冲突，更多方向北京政府傾陷。周道剛自知環境惡劣，倉皇離渝，他這個督軍在未到成都就職之前，就此垮了台。滇、黔各軍進駐重慶，推舉熊克武為四川靖國軍總司令。時北京政府又以劉存厚為四川督軍，張瀾為省長；而唐繼堯則以靖國軍總司令名義支配川、滇、黔三省。熊克武乃派顧德基、石青陽、蕭德明、呂超等部川軍，會同滇軍顧品珍、黔軍袁祖銘等部進逼成都。劉存厚敗走綿陽，後又被迫退駐陝南。

### 護法運動時期川局與南北政府之關係

一九一七年八月國會南下，議員在廣州開非常會議，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先生為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唐、陸始終沒有就職，孫中山先生一面派大元帥府秘書長章太炎赴滇游說唐繼堯，并向川、滇、黔將領宣傳護法運動的重大意義；一面致電唐繼堯對於川省人事有所布署，電文如下：

“雲南唐元帥鑒：川事非得民軍相助，不足以資提挈。黃復生、盧師諱在泸州組織國民軍，茲已任命黃為該軍總司令，盧為副司令。石青陽亦在綦江組織民軍，茲已任命為川東招討使。關於牽制敵軍及調和川軍，此三人均可為用，請量予援助，并電前敵各軍長轉告師旅團長知照，互相接洽，以資聯繫，是幸。孫文”

孫中山先生致章太炎電如下：

“火急：重慶鎮守使轉章太炎先生鑒：申密：道途勞瘁，極為緊念，安抵渝城，欣慰無已。劉存厚與鍾體道抗命不悟，勢非討伐，不足以固國本。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黨難得之士，望執事勸其破除顧慮，提兵進取，安國乃所以保川也。謝蕙生來言，川中同人公推熊克武為川軍總司令，並于青日就職，不申確否？前曾委黃復生、盧師諱為川軍副總司令，聞復生亦在渝，如公推屬實，則軍府應加委任，請召熊、黃兩兄妥商辦法密復為禱。孫文叩銑”

当熊克武部吕超会同滇、黔军战胜刘存厚，进入成都时，孙中山先生直接委吕超为成都卫戍总司令，并责成办理善后。因之熊对吕超颇有芥蒂，对孙中山先生亦不免稍有误会，而唐继尧以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控制四川，对孙中山先生过问川事，亦深感不快。孙以护法运动相号召，而唐对护法运动则采取模棱态度。孙对黄复生、卢师谔、石青阳本已委有名义，而唐则另委黄复生、卢师谔为北伐援鄂副总司令，委石青阳、顾德基、李静安为北伐援陕各路总司令。孙、唐意见分歧，于此可见。

刘存厚败退陕南，仍以川督自居；张澜并将四川省长公署的招牌移挂北京。熊克武进驻成都后，南方护法政府先后发表杨庶堪为四川省长，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滇、黔军在川分驻重庆、泸州、叙府、资中、自流井等富庶地区，开始就地拨餉，直接委任地方官吏，而川军则分布于川东、川北各县。

杨庶堪就四川省长后，电孙中山先生推荐朱执信为省府秘书长，向楚为政务厅长，廖仲愷为财政厅长，蒋中正为警务处长。孙只发表向楚、廖仲愷两人。廖仲愷行至宜昌，因熊部将领电阻，廖即折回广东。这不仅给杨庶堪以打击，而且亦使孙中山先生难堪。熊任川督后，因掌握有成都兵工厂、造币厂及自流井盐款，在军事上积极扩充实力，在政治上主张地方分权，以联省自治相号召。其基本力量除但懋辛外，还有余际唐、喻培棣、张冲以及保定系的向传义等，一面又拉拢刘湘、刘成勋、赖心辉以为之助。熊局面展开后，自不愿俯仰随人，对于孙、唐两方面表面上不能不敷衍，实际上则有利害不同的分歧，于是既见忌于唐，更为孙所不满。

省长杨庶堪及黄复生、卢师谔、石青阳、顾德基等，都是孙中山

先生在四川的基本力量；而熊对石、顧、卢、黄的发展，限制頗严，于是他們不能不依附滇、黔軍来对付熊克武。孙中山先生全集有“中山致唐繼尧电”，略謂：“为达到最后目的，必須合滇黔之全力以图之，然熊克武不去，則不能抒后顧之忧。弃熊計劃，已令向、石、顧、卢、黄、刘、廖各同志早作准备，想已与兄接洽，今当促其速举。請先令駐川滇、黔軍助而促之，熊可一揮而去也。熊去則督率川軍之众，可以指揮如意矣。孙文”当时楊庶堪也公开說：“熊錦帆对我表面上很敷衍，但談到政治权責問題，他总是一点不來气。如石青阳、黄复生等迭次向我說，防区貧狹，軍餉困难，沒有得过盐款補助和械弹分配。我一再据以向熊建議，請把財政收支、械弹分配拿来公开，沒有一項好答复。我保廖仲愷来作財政厅长，熊就指使部属来反对，使廖仲愷中途折回。这样长此下去，我有什么办法完成中山先生交給我的任务呢？”唐繼尧感于熊之坐大，也乐得拉攏楊庶堪及石、顧、卢、黄来抑制熊克武。

唐繼尧的靖国联軍总司令部原来設在貴州毕节，熊克武为迎合唐的心理，緩和滇、黔对他的紧张情势起見，請唐移节重庆，以便指揮川、滇、黔联軍。唐到重庆，召集川、滇、黔、豫、鄂五省联軍會議，主张將四川兵工厂及盐款厘稅統归联軍总司令部在渝所特設的机构主持办理，熊克武拒之，不終会而去。这个主张后来拟成书面，由黔軍总司令王文华亲自拿去征求熊的同意，熊亦拒絕簽字。川、滇、黔交恶，至此日趋表面化。

唐繼尧、王文华深感滇、黔欲独霸四川，势皆不可能，乃秘密委托邓汉祥为代表，在北京向当时国务总理段祺瑞接洽，并提出治川方案，内容是：由北京政府派員酌帶北洋軍隊来做四川督軍，其人选以张紹曾为最适当，因张是日本士官毕业，清末曾任第廿鎮統

制，与唐繼尧有同学关系；至于四川省长一席則选川人担任，但必須得滇、黔同意；滇軍駐川三师，黔軍駐川二师，餉糈補給統由川省拨付。邓汉祥同段祺瑞的心腹王揖唐先商談后，一同往会段祺瑞。邓将唐、王治川方案原件交段閱后，段不贊成，并說：“为什么四川應該养滇、黔軍五个师？为什么四川省长要取得滇、黔同意？”邓汉祥为达到他的任务起見，竭力說：“这个方案照道理是說不过去的，但为国家統一設想，如果川、滇、黔問題能够解决，两广的問題也就不难迎刃而解。这件事意义很大，望从整个大局着想。”段仍不为所动<sup>①</sup>。

滇、黔勾結北方企图既未能达到，自非弃熊不可，但对熊又不敢輕易下手，从滇軍軍长赵又新致唐繼尧电中就可以想見一切。原电如下：

“唐總裁鈞鑒：攸密：熊錦帆自入成都以来，两載于茲，对于每月所入之盐款，拥为厚資。兵工厂則日夜赶造，約計所积款項已达二千万以上，枪枝子弹儲蓄甚多，而自奉儉約，家庭状况，故我依然。外則表示本色，內則坚忍精強，一往无前，为历来川中执政者第一有心計之人。故川中各軍久議去之，彼則置若罔聞，自恃穩健。邓錫侯旅不服編制，而卒就范圍；呂超師早起嫌疑，而从容不迫。其居心險詐，手腕敏活，实为当前强硬之敌。故不欲去之則已，如欲去之，必用全力，未可以輕易視之。川中各軍（石、顏、卢、黃）实力不足，而旧川軍派（刘湘、刘成勛、賴心輝）复为所利用，則将来战争視綫反萃集于我滇、黔軍，此亦不能不慮及者也。赵又新叩巧”

一九二〇年春，唐繼尧委呂超为川滇黔联軍副总司令，并在孙

---

① 光緒末年清廷亲貴为削減袁世凱兵权，抵制北洋派，逐漸重用日本士官学生，张紹曾、吳祿貞等因之得任新軍統制，当时张紹曾、段祺瑞以利害冲突，意見甚深；后来直、皖暗斗，张又站在直系方面。唐指定要张紹曾做四川督軍，恰中段祺瑞之忌，故經過几次往返，始終沒有得到結果。

中山先生的催促下，由滇、黔軍聯合呂超及石、卢、顧、黃等部進攻熊克武。劉湘支援熊部，共同抵禦。熊、劉戰敗，退駐保寧。彼時唐繼堯提出處理川事的具体办法，來征詢滇軍顧品珍、趙又新兩軍長的意見。原文略云：

“（一）川局定後，其督軍一職當然不能存在；川省民政應完全由楊省長擔任，實行民治主義。（二）川省歲入應照俱進會會議，暫歸聯軍攤配各軍。（三）兵工廠本國家所有，非一省一人之私物，川軍歷年內訌，皆由一二梟雄，據此軍實機關，擴充已勢，應即收歸聯軍管理，以遏亂源。（四）兵數以財力為標準，應逐漸收縮，依據此項主義，各逆軍應一律迫令解散；如慮力量不足，俟朱師楊、魯、張三旅，黔軍之卢旅及鄧、楊兩縱隊到川，一鼓殄滅，務絕根株。（五）和議未定，國本飄搖，應速設置聯軍總部，籌備軍事，以期解決時局，奠定國家。以上五項，除第一項應由各軍催促楊省長實行，別無問題外，其二、三、四項均非先將第五項之聯部組織成立，無從主辦。查堯前據各軍之請，宣布就職時，曾電筱齋（顧品珍）會同電輪（王文華）到渝籌設聯部，竟因筱齋遠在前方督戰，不能分身，故後改派毓衡會同電輪辦理。現我軍既占勝利，收束整理，問題正多，非有統一之機關，無從着手。此電到後，即希毓衡克日到渝，會同電輪迅速籌備，務望于最短期間即觀厥成。兄等以為如何？希復。繼堯佳印”

唐繼堯處心積慮，要掌握成都兵工廠和自流井鹽款，以便擴充滇、黔勢力，削減川軍力量，霸占四川，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 川軍聯合驅滇與劉存厚再度被逐

一九二〇年冬，川軍以爭“省格”為名，全面大團結。熊克武聯合劉湘、劉成勛、鄧錫侯、陳洪范、劉斌等，以驅逐客軍相號召，并任但懋辛、劉湘、劉成勛為一、二、三軍軍長，劉湘并兼任前敵各軍總司令。同時，熊又派李樂倫為代表到漢中往說劉存厚捐棄前嫌，重新合作，共圖排滇。劉即率所部田頌堯等回川。原在滇軍趙又新

部任參謀長兼團長的楊森，在由瀘州率滇軍兩營到前綫作戰時與劉湘勾結，加入川軍，并經劉湘委為第三混成旅旅長。于是劉湘、楊森、鄧錫侯及其他川軍向成都進攻滇軍顧品珍等部，滇軍节节敗退。楊森深知滇軍只能打勝仗、不能打敗仗的弱點，便馬不停蹄，跟踪追擊，駐瀘州的趙又新竟至受傷被俘身死。顧品珍對唐素有嫌隙，此時見川事不可為，而趙又新死后，內部又無顧慮（趙為擁護唐繼堯最力的一人），乃率滇軍回滇驅逐唐繼堯，取唐的位置而代之。駐重慶的王文華也命所部盧燾、谷正倫等率領黔軍回貴陽，逼走督軍劉顯世。滇黔軍退出川境，楊森升任第九師師長，呂、石、顧、盧、黃等部也因黔軍退走而失其作用。川、滇、黔這一次戰爭就告結束。

熊克武是廣東政府任命的督軍，劉存厚是北京政府任命的督軍，此時又成對立之勢。北京政府希圖調解，以熊克武為四川省長，并委鄧錫侯、田頌堯、但懋辛、余際唐、陳國棟、陳洪范等九人為鎮守使。北京政府命令發表后，熊克武、劉湘等堅決反對。熊自願下野，并與劉湘共同主張川省實行自治，不附南亦不附北，并由川省各軍公推劉湘為川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成勛為成都衛戍總司令，正式宣布自治。此時熊克武、劉湘、劉成勛、賴心輝等又密商驅逐劉存厚，由劉湘派李樾森旅向成都擁劉存厚的鄧錫侯進攻。鄧得知此項消息，便自動退出成都，在新都、廣漢之間同李樾森打了一仗，就退到綿陽。賴心輝又加入攻擊劉存厚。劉自知難于抵禦，乃率田頌堯等部又退到陝南（鄧錫侯兩次均未同到陝南）。

### 熊、劉援湘攻鄂失敗后之互相火并

自滇、黔軍被逐出川后，川中各軍的均勢已經形成，防區割据

局面比較穩定。熊克武、劉湘認為要避免四川內戰，川軍應向外發展，適湖北人士正謀聯絡湘省趙恆惕打倒鄂省王占元，熊克武即借此機會親到湘南聯絡趙恆惕，共同出兵攻鄂。熊回川後同劉湘商定，協助鄂人自治，由劉湘任援鄂總司令，但懋辛為副總司令兼第二路總指揮，唐式遵為第一路總指揮。因趙恆惕發動較快，川軍未能同時出動，以致湖南軍隊打到汀泗橋，而川軍尚未出川境。迨川軍到達宜昌，湖南軍隊已被吳佩孚所派三師增援部隊击潰。吳佩孚跟着又以重兵壓迫宜昌的但、唐兩部川軍。但、唐敗退回川，吳佩孚任命孫傳芳為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駐紮宜昌，遣使來川言和。劉湘乃罷援鄂之師。但、唐敗退回川，互相責難，以致引起一、二兩軍的交惡。

一九二二年夏，熊克武和劉湘之間矛盾日趨尖銳。五月中旬，劉湘通電各軍，請十日內推人繼任；下旬即通電下野，總部交參謀長王陵基，省署交政務廳向楚分別代行。六月，熊在成都策動各軍開軍事會議，推劉成勛為川軍總司令兼代省長，任但懋辛為東防督辦，同時組成聯軍，推賴心輝、鄧錫侯為正副總指揮，進攻重慶。時劉湘兼任的第二軍軍長已由楊森升任，楊袭击第一軍于忠县、开江，第一軍向川北引退。八月，熊部第一軍大敗劉湘所部第二軍于渠县之杜家岩，賴心輝、鄧錫侯攻克重慶，楊森率第二軍唐式遵、李樹勛等殘部退入湖北施南、利川，潘文華、郭助祺等則到叙府依附劉文輝。劉湘由于大邑系关系，得到劉成勛、陳洪范掩護，安然回到大邑县安仁鎮。重慶又為熊克武、但懋辛所有。所謂一、二兩軍之戰，至此遂告結束。

## 川軍內訌与吳佩孚侵入四川之战

一九二三年二月，第七師師長陳國棟強編獨立旅何金鰲部，劉成勛制止不聽，乃派藍世鈺、張存孝兩部挾制，川戰復起。鄧錫侯、陳國棟击败劉成勛軍，直逼成都。旋因賴心輝馳援劉部，鄧、陳敗退川北。三月，鄧錫侯、陳國棟又聯合劉斌、田頌堯、劉文輝、唐廷牧、陳遐齡、彭遠耀諸部進逼成都，與楊森遙為呼應。劉成勛率部退新津，劉文輝以衛戍司令名義維持成都秩序。四月六日，熊克武部第一軍但懋辛由遂寧進攻成都，與聯軍鄧錫侯等部戰于華陽之石板灘，聯軍大潰。熊部入成都，劉成勛復川軍總司令職。

楊森敗退到湖北後，即投入吳佩孚懷抱。當劉成勛掌川省軍民兩政時，先整飭自己所兼第三軍部隊綱紀，將第三軍直轄的第七師師長陳國棟免職。此舉引起了與陳國棟關係較深的鄧錫侯的恐慌，遂棄防援陳抗劉。但第一軍及賴心輝等部又援助劉成勛貫徹整飭軍紀之令，戰事遂擴大蔓延。吳佩孚見有機可乘，以統一為號召，補充楊森軍實，飭令回川，並派趙榮華率領宋大霈、盧金山、于學忠、張允明等北洋軍隊援川，同時又命袁祖銘率領黔軍王天培、彭漢章、李曉炎、何厚光等部以援川為名，聯合進攻熊克武。六月，熊部但懋辛及賴心輝督同各部與黔軍、北洋軍、楊森軍戰于隆昌迎祥街，大破之。後余際唐攻江北桃子壩，克之。劉湘甫由叙府到重慶，賴心輝已率部攻抵浮圖關。劉堅守旬日，貴州周西成部突襲南岸，唐式遵失聯絡，附熊諸軍合圍力攻，江北、重慶同時不守。劉湘、袁祖銘相率退萬縣，北軍及楊森、鄧錫侯、陳國棟等部退梁山、萬縣，唐式遵則退往永寧。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袁祖銘、劉湘再督



各部反攻，楊森先占領江北，越日重慶亦攻下。熊部第一軍退川北，賴心輝退內江。楊森在軍事、經濟各方面都与趙榮華意見紛歧，袁祖銘平素對楊更極端不滿，於是趙、袁主張歡迎劉湘出山。楊森因同劉湘爭四川陸軍速成系的領導權，本有矛盾，甚不願劉湘再起，但在趙榮華、袁祖銘的壓迫下，不得已只好同趙、袁聯名公推劉湘為四川善後督辦。劉湘道經叙府，同劉文輝商定川局全盤計劃後，由叙去渝。當時正值軍情緊急，他一面以聯合打倒熊克武為就職條件，一面即努力於“二、三、邊、八、九”（詳前）的聯合，造成安定川省的中心力量。吳佩孚亦同意起用劉湘，初委為四川清鄉督辦，劉湘以便於拉攏劉成勳、賴心輝、陳洪范、劉文輝等為理由，堅決主張就善後督辦，經袁祖銘代劉湘向吳佩孚多方疏通，吳才勉強同意。劉湘聯合楊森、袁祖銘、鄧錫侯、陳國棟等部，向熊克武部猛攻窮追。一九二四年一月，熊克武赴潼川督師，楊森等襲擊之，熊敗走，潼川陷。二月五日，袁祖銘、劉湘督諸軍進逼成都。賴心輝當時尚欲提挈一、三兩軍背城一戰，冀圖僥倖獲勝，便可自居盟主。卒以一軍新敗，三軍異趣，甫經接觸，即分道潰走，賴心輝只好一面掩護熊軍退却，一面力向劉湘表示來歸。熊克武勢處孤危，當然難於支持，不得已放棄四川，率所部由貴州經湘西退往廣東方面。斯時有人以劉、賴對熊中途背信，曾戲擬一聯以諷之，文曰：“流水為災因雨久（劉成勳號禹九）；賴人成事總心灰（輝灰諧音）”。

### 川軍聯合驅逐楊森之戰與袁祖銘被迫出川

一九二四年，曹錕、吳佩孚以楊森督理四川軍務，鄧錫侯為四川省長，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袁祖銘為川黔邊防督辦，劉存厚為川陝邊防督辦，田頌堯為四川軍務會辦。楊森因握有成都兵工廠、

造币厂，乘机尽量扩充，实力远超各军之上，企图武力统一四川，排除异己。吴佩孚既重用杨森，也利用川省多头，分别加官赐名，以示号令能及于四川，借以加强直系军阀在北方的声势，并形成控制西南的局面。一九二五年，杨森以督署统拨盐款为名，突以所部王兆奎师进驻自井，各军群起反对。杨即借口统一，首先解决川西刘斌师，随即分道派兵向刘成勋、陈洪范、刘文辉、赖心辉各防区进攻。刘湘当时本挟各部以自重，无异直接受到打击。袁祖铭、邓锡侯、田頌尧等见杨森一意孤行，亦感自危，于是力图团结，共同倒杨。刘湘表面中立，暗中则支持各军。他一面以同学及旧长官关系，多方分化杨森的部队；一面派代表到北京请求段祺瑞免杨森职。刘得邓汉祥为内援，段遂纳其所请，任命刘湘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文辉为四川军务帮办，赖心辉为四川省长，邓锡侯为四川清乡督办，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七月，各部川军在渝组织联军，共倒杨森，并推袁祖铭为总司令，分路反攻。杨部师长王缙绪在前方倒戈反杨，投降刘湘。杨森溃，退宜昌，所部大多为刘湘收编。其余各军亦将杨残部或缴械或收编，各有所得；惟黔军袁祖铭部一无所获，颇感失望。当时有讽刺杨森之打油诗一首：“十万雄兵出简阳，一王战败一王降（王兆奎、王缙绪）；一王送出夔关外（王仲明），回首巫山泪两行”。

倒杨之役，袁祖铭确尽了相当力量，刘湘为了安慰袁祖铭，曾向袁表示，由成都兵工厂赶造步枪，补充黔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刘湘、赖心辉、刘文辉、邓锡侯、刘成勋、袁祖铭等齐集成都，开军事善后会议，其目的就是以兵工、造币两厂及盐款为主要目标，实行分脏并分配防地。在开会期间，成都各界人士指责兵工厂是祸乱根源，要求封闭，停止造枪。刘湘在这次战役中收编部队甚

多，无需再造，当然乐于接受各界要求，并可借此杜絕各軍爭奪。袁祖銘認為劉湘耍手法，有意欺騙他，負氣返渝，不久即進攻劉湘駐渝部隊，并唆使原隸楊森旧部叛劉迎楊，回駐下東。劉湘亦隨形勢轉變，再由各將領以同學關係說服楊森。楊與袁宿怨本深，遂復與劉湘合作，夾擊重慶袁軍。成都鄧錫侯、田頌堯與袁虽有默契，但以劉文輝的牽制和川省當時輿論的責難，遲遲不肯行動。袁頓陷于孤立，乃撤回貴州，轉入湘西。

一九二六年春，劉文輝攻呂超于叙南。呂超當時為袁祖銘軍前敵總指揮，被击潰后，叙南六屬（高县、珙县、庆符、长宁、筠連、兴文）均為劉文輝所有。

### 下川东与上川东之战

楊森虽据有万县及下川东各县，犹以为未足。李家鈺駐遂寧，羅澤洲駐順慶，亦嫌地小，不足以迴旋，极想找机会发展。于是李、羅、楊遂互相联合，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向重慶劉湘进攻。劉湘集中兵力于重慶，將資中、內江、榮昌、隆昌等县交劉文輝部接防，牽制李家鈺。羅部在邻水向劉湘进攻，立被击潰。迨楊部进攻重慶，劉湘再回兵拒楊，羅、楊皆被各个击破。李家鈺因受劉文輝牽制，不敢有所举动。劉湘乘胜对楊穷追，楊部郭汝栋、范紹增两师叛楊附劉，劉遂統一下川东。自此以后，劉控制長江交通，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对内封鎖各軍，使无法补充实力；对外則竭力討好蔣介石，大量购买枪弹及武器修理所（变相兵工厂）和炼鋼厂机器，因而在很短期間内其实力就远駕于各軍之上。

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在重慶被劉湘击潰后，認為是受劉文輝牽制的影响，极为憤恨，乃联合起来向上川东劉文輝进攻，企图夺

取防地，另創新的局面。他們在資中、內江與刘文輝部激戰五日，又被刘打敗。經邓錫侯、田頌堯出面調停，李、罗、楊始得退回原防，上川東戰事遂告結束。

### 二刘第一次之戰(附刘田之戰)

一九三一年四月廿日，国民党政府改組四川省政府，仍以刘文輝为主席，同时任命刘湘为四川善后督辦。

一九三一年四月，刘文輝击败李家钰、罗泽洲，据有遂寧、南充各县。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刘文輝同田頌堯巷战于成都。激戰十余日，市民死傷甚重，田部不支，退出成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刘湘、刘文輝两部战于榮县、威遠一帶。二刘虽有叔侄关系，但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利害冲突日益加剧，先已有盐款爭鬭、江津爭防之糾紛。后又因刘文輝軍用器材在渝、万被刘湘扣留，刘文輝曾为此亲赴重慶，希望能同刘湘成立諒解，但刘湘成見已深，未得結果，最后終于以兵戎相見。在戰事发生以前，刘湘曾經由曾扩情向蔣介石密陈消灭刘文輝的計劃，并說必須先打垮刘文輝，安定川局以后，他才能出兵帮助蔣介石反共。同时蔣亦因刘文輝曾参加过反蔣的扩大會議活动，怀恨在心，想假手刘湘以消灭之。刘湘得蔣默許后，才敢于大举向刘文輝进攻。李家钰、罗泽洲、楊森三部因曾在上东、下东两战中損兵失地，为报复刘文輝起見，轉向刘湘輸誠，自告奮勇，愿为前驅，进攻刘文輝。田頌堯亦因所部帥旅、寇团先后叛变，均为刘文輝收編，亦憤而向刘湘表示愿合力共击刘文輝。刘湘以保定系既已破裂，又深知蔣介石对刘文輝在扩大會議期間曾通电反蔣一事始終未能释然，因而認為此时刘文輝的环境极其恶劣，进攻他的时机业已成

熟，遂唆使李、罗两部发难于川北，田頌尧亦举兵相应，刘湘亲自督师川南。刘文辉三面受敌，兵力所损虽少，防区丧失甚多，沱江以东、乐山以南数十县尽为刘湘所有。刘湘以新占领的防区尚须整理，且此次战役中邓锡侯本人及所属一部分军队宣布中立<sup>①</sup>，陈鼎勋又居间力主同学团结，估计兵力尚不足以将刘文辉彻底击败，对邓锡侯也无充分把握，乃由鲜英奔走其间，二刘第一次战争宣布停战。

### 二刘第二次之战（附刘邓之战）

刘文辉战败后，因防地丧失过多，餉糈异常困难，而在所谓同学关系方面，则田頌尧既经破裂，邓锡侯复同处成都，意见极不一致，上次战役又曾受到邓部牵制影响对邓颇为怀恨，因此仍图以家族关系取得刘湘支持，消灭邓部，并另辟新局面。这一来更予刘湘以可乘之机，一九三三年五月爆发的刘、邓之战，实为刘湘从中操纵所促成。刘、邓战争爆发后，邓出成都、昆河相持，派黄石子等通过刘从云向刘湘联络，誓以全力进攻刘文辉。刘湘乘机再度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部退集岷江以南。七月十九日，刘湘部进据成都，随即向岷江进攻。刘文辉部因彭诚孚师出降，全綫瓦解，刘文辉仅率残部二万余人退往雅安、西昌、康定一带。此为二刘第二次之战，亦即四川军阀混战最后的一幕。

---

<sup>①</sup> 时有人作诗讽刺邓锡侯：“君侯不愧号水晶，半用调停半用兵。刀打豆腐光二面，输也吃糖何况赢！”。

## 刘湘、刘文輝爭霸四川的几次战争

——以二刘爭霸为主的“田刘省門之战”、  
“鄧刘毘河之战”和二刘兩度交鋒的起因  
及其战事結束的概略情况

冷 寅 东

四川各軍閥內战，从一九一八年形成防区制以后开始，至一九三三年二刘（刘湘、刘文輝）之战結束，刘湘成为盟主，刘文輝退处西康为止，战争綿延断續达十五年之久，民生憔悴，庐里为墟，使四川长时期处于动荡混乱局面。内战导因为各軍閥据地为雄，互謀扩张，最后发展为二刘爭夺霸权。二刘勝負关键，則为保定系分裂后相繼发生的“省門之战”与“毘河之战”，最后发展为二刘之間家族火并的两次主力作战。这几次战役，我都曾亲身参加，而十五年之中，置身行伍，亦直接間接参与为害人民之内战活动。爰就記憶所及，按照主次，加以概括敘述（至这十五年中，二刘爭霸、大邑系破裂、保定系內閥的各次內战，則因了解不多，均从省略），以供史料采择工作之参考。

### 北伐以后川軍各部之离合变化

一九二六年北伐期間，四川各軍的部队先后受命改編为国民革命軍，計楊森部为二十軍，刘湘部为二十一軍，賴心輝部为二十

二軍，刘成勳部为二十三軍，刘文輝部为二十四軍，邓錫侯部为二十八軍，田頌尧部为二十九軍；至刘存厚則仍以北洋政府任命之川陝边防督办名义，統率其少数部队偏处綏定。邓錫侯、田頌尧、刘文輝同属于保定系；刘湘、楊森則属于速成（四川陸軍速成学校）系。刘湘、刘成勳、刘文輝又因地域关系而結合为大邑系。至賴心輝則接近于刘成勳；刘存厚因邓、田原为其旧属，故关系較密切。

四川自一九一八年形成防区制的割据局面以后，名义上虽間有統一的政府，而实际上各防区的軍民财各政，悉由各軍领导人自行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中央政府因鞭长莫及，亦无法过問。

一九二七年，刘文輝图謀以西康和宁远作为尾間，便于进退有据，而駐在西康、宁远、邛雅地方的刘成勳所部力量薄弱，將領又多暮气沉沉，有隙可乘。刘文輝遂于是年六月中旬出其不意，举兵解决了刘成勳，占有其防区，并将其所属之陈鳴謙、陈猷周等部收編。

同年冬間，刘湘与刘文輝为了使两軍防区能密切啣接，兼以賴心輝部横亘在两軍之間，反复无常，遂合力将賴赶出原駐的永川、江津，迫使退入黔境。

一九二八年，駐下东之楊森、駐遂宁之四川边防軍总司令李家鈺、駐順庆之师长罗泽洲，以重庆为水陆枢紐、經濟中心，如据而有之，則不仅可以雄据长江上游，扼制川中咽喉，且便于向外购买軍实，以扩充力量，图謀发展。当时楊森与刘湘之間夙怨甚深，而刘湘所部散处在上东及重庆附近各县，楊等认为一举即可击潰。楊、李、罗遂于是年春間联合进攻刘湘（李、罗两部名虽属于邓錫侯，而实际是自謀发展、自由行动的）。刘湘取得刘文輝之声援，并以資中、內江等防地交由刘文輝派队接駐，又以两地收入与刘文輝按股分潤后，乃集中兵力反击，遂将楊、李、罗各部次第打敗，并占有楊

在下东之防地，楊所屬之师长郭汝棟、范紹增和旅长穆瀛洲等部亦为其收編。楊森被迫退往广安、渠县，局促一隅，与李、罗接攏。在这期間，川軍派系头緒已日趋單純，而刘文輝一方面与刘湘有叔侄关系，一方面又与邓錫侯、田頌尧有保定同学的关系，遂居間見重于双方。故一九二八年夏間，刘湘、刘文輝、邓錫侯、田頌尧集会于資中，商定推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刘文輝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田亦参加省府之組織，并联名电請国民党政府分別予以任命。

### 資內战争后二十四軍部队的扩大

罗泽洲、李家钰等自攻刘湘失敗后，心实不甘。刘文輝既将刘成勳、賴心輝两部火并，又因声援刘湘得到資內防地，并利用机会攫取了四川省主席，因而罗、李对刘极为切齿憤恨。同时，他們认为刘文輝所占的防地甚寬，其部队虽較多，但在重新打散改編之后，內部尚欠团結，且散駐在各地，有机可乘，遂于一九二九年春間举兵袭击資、內，意在截断刘文輝与刘湘之联系，并夺取上东防地。刘文輝集中主力大举反击，不但将进攻資、內之李、罗部队打败，并乘胜进攻，将李家钰赶出遂宁。一九三〇年，罗泽洲因所部发生內变，被迫下台，由旅长陈鴻文代之收拾殘局，将部队拉归刘文輝收編为师。

### 刘文輝图謀統一四川的囊括兼并措施

刘文輝自經資、內之战以后，所有的防地除西康十几县外，在四川則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及附省之崇庆、双流、新津、华阳、簡阳等县，并扩张到順庆、遂宁一带，計共六十余县，且多为富庶之



区，而部队亦发展到十万人以上。防区内的军民财大权都集中在手。所部将领中的保定生及四川军官生，都系较为干练的人物，中下级军官和军士亦经过轮番调训。在政治方面，刘对各方面负有声誉之人，则并蓄兼收，罗致不少（如胡子昂、吴晋航、段升阶、冷杰生、邵石痴、刘明阳、张富安、文和笙、王宏实等）。其政治手腕亦极灵活，同各方面之联络亦很多，且手面阔大，善于用钱。因此，刘文辉雄心勃勃，不仅图谋统一四川，且进而要想囊括西南，如扶助胡若愚回滇，支持王家烈主黔，即可概见。他对各军采取威胁利诱、蚕食鲸吞的分化政策，企图先彻底解决邓、田，然后兼并刘湘，次第达到统一川政的目的。邓锡侯所部师长如陈书农等已暗中与刘早有默契，旅长彭诚孚、邓国璋两部，业脱离邓而来归附。邓亦向其表示愿随其后，但望刘莫挖其墙脚。刘认为邓已不足以有所为，故进而加紧对田頌尧部之分化工作。一九三一年春间，刘将田部之宪兵司令寇溥渊诱其来归后（寇原为李家钰之部队，因遂宁失守后归田），虽经双方派员协商，由刘文辉之将领冷寅东于同年夏间同田之军械处长吕保和到资阳余家寺，将寇部之武器解除一部归还田部，以息此纠纷，但此裂痕已不可能从根本上补好。不久，田部之教导师长王惠菴因把持兵工厂，自由扩张队伍，竟触田之忌，被田扣留。刘文辉又乘机将王所组成之几个营由帅国英率领，自兵工厂掩护到双流、新津屯驻，改编为一个旅。

### 大邑系的破裂与保定系的内阋

田頌尧及其所部将领，由于刘文辉一再诱惑所部叛变，加以收编，极感难堪，决心与之一决雌雄，但恐众寡不敌，因目睹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利害冲突日益显著，乃先后派其将领余安民、李蕴鼎、曾

南夫到渝說動劉湘，得其支持，表示愿出兵相助。为了切实合作，他們还拟订有統一整理軍民財各政的綱領及設立战地委員會的組織等方案，并征詢邓錫侯意見。邓亦甚为同意，曾密派师长馬德斋到渝表明态度。刘湘为加强联系，以分化保定系，孤立刘文輝，曾先后派其將領王纘緒、张再等到邓、田方面报聘。

刘湘本为刘文輝之嫡堂侄，但他們二人爭夺川省霸权之矛盾，已发展到无可調和之余地。一九三一年秋間，刘文輝曾为两軍間和其他川事問題到渝就商于刘湘。刘湘因对刘文輝已有介蒂，竟至盛气相凌，輾轉推延时日，不惟协商沒有圓滿結果，反使刘文輝备受刺激，快快而返，两方裂痕，从此更大。且刘湘认为刘文輝的措施已露出了要从各方面来扼杀二十一軍的企图，如：刘文輝背信不履行資、内两地收入的分配前約；又如双方合力將賴心輝之江津防地取得后竟据为独有，不許二十一軍部队进入江津县城；刘文輝部张志和旅阻止米船由江津下运，使重庆軍民感到糧食不济，不得不购湘米来供应。同时刘文輝又用大量金錢收买刘湘所部之將領蓝文彬、范紹增等。刘文輝之五兄刘文彩曾派人到渝行刺刘湘，被拿获后，供認曾亲身到渝运动刘湘的手枪大队长刘树成設法暗害刘湘。尤其是一九三〇年閻錫山、馮玉祥等举兵反蔣，发生中原大混战时，刘文輝认为閻馮势将获胜，如及时为之声援，内外取得联系，則川事更易于統一，乃在省联合邓錫侯、田頌尧两部，于九月发出反蔣的魚日通电。因此事未透过渝方，更使刘湘为之惊惶疑惧。倘非张学良举兵入关，馮閻失敗，則下东前后受困，而二十一軍前途将不堪設想。刘湘因有此种种存亡攸关的原因，又得田頌尧愿作打刘文輝的先鋒，保定系已由此发生内閥而分裂，时机已熟，宁能坐失。在此期間，刘文輝已得到田部决心与之作战及刘湘已同意

田部行动，并已在准备出兵相助的情报，乃一面调集部队，逐次放弃顺庆、遂宁等处的防地，一面电刘湘表示拥护，并拟挽刘湘之秘书长杜少裳同其胞兄刘升廷及其将领冷寅东（冷系刘文辉未过门之儿女亲家，又为其同乡同学）一同赴渝与刘湘协商一切，意在挽此危局。但此议由于刘湘已下定决心作战，同时也受到刘湘手下向来反对二刘合作之将领如唐式遵、潘文华、王纘緒、张再、傅常等的坚决反对，因而未能实现。刘湘对刘文辉来电竟只字未复。

### 两雄争霸的前奏——刘田“省门之战”

田、刘作战的形势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两军始而在省城内皇城附近发生冲突，跟即在省城外之东北门间和西南门间发生激战（邓锡侯部之黄隐师的刁文俊旅已协助田部参加作战）。后田部因众寡悬殊，而其绵阳、潼川的后方增援线又为刘文辉部在北门外遮断，故不得不退入城内进行巷战，据守西北隅。在两军相持之时，刘湘已出兵直趋瀘州，并将刘文辉增援瀘州之部队在富顺、瀘州间击退，迫使困守瀘州之刘文辉部杨尚周、田冠五两旅长接受刘湘收编，同时刘文辉原在永川之邓国璋部，亦受刘湘之委任而叛变。邓锡侯向对刘文辉之一再诱编和分化其所部，并处处予以过分难堪，早已极其不满，他希望二刘直接相碰，双方力量互相对消，使他自己得以居间从容应付，打开自身之僵局。故在田、刘两军相持之际，邓竭力劝刘文辉应及时放走田部，回驻潼川、绵阳原防，而集中兵力去应付主要之敌刘湘，他并表示愿驻守省门，保证后方的安全。同时刘存厚之师长刘肇乾系保定生，与刘文辉交情甚厚，与邓、田关系亦深，亦竭力向刘文辉作与邓同样之主张。刘文辉原来打算先解决田部，然后全力进攻刘湘，此时既

与田部形成相持之局，恐曠日持久，发生变化，且在省城进行巷战，居民所受损害甚大，經反复考虑，认为邓、刘主张有理，遂表示同意。他即派其将领冷寅东随邓錫侯到文殊院与田頌尧协商妥当后，打开北門，由冷前行，囑令二十四軍在城外的部队让道，放行田部。当他们先后进入鼓楼北三街田部之防綫内时，田部之官兵认为邓在两面討好，而不协助作战，致使軍事失利，困守城内之西北隅，尤恨冷为刘部作战部队之总攬者，因而对邓、冷二人到来表示憤怒，尤以田之支队司令馬翼张最为激烈，几使邓、冷两人遭到意外。幸田部之将领孙震、董长安及时赶来招呼，始未酿成事故，并由孙、董二人亲身护送邓、冷安全走出其防綫。

## 二刘初度交鋒与老君台的議和

由于邓錫侯、刘肇乾之主张为刘、田双方所采纳，刘乃将北門外封鎖之部队撤开，田部即于十月下旬陸續出城，回駐綿、潼原防（但大部分实际上屯駐新都附近）。刘文輝之主力亦于十一月上旬紛紛向井研、荣县及資、內方面出动。刘湘之軍事計劃，是由东道橫趋嘉定、眉山，与邓、田各部夾击二十四軍主力，但十一月下旬两軍即在荣县、嘉定間之馬踏井、宝兴場，井研、荣县間之东林場、賴河堤、双古坟等处接触。双方主力即发生激战，刘湘部队节节后退，轉攻为守，扼守荣县西南地区之老林口、老君台、杜家井、文昌宮一带，刘湘本人駐在自流井指揮。刘湘部队武器較為精良，而刘文輝部队則士气較旺，双方兵力均在三万以上，故在老君台（該地后为二十四軍占領）一綫战事之烈，为四川軍閥历年內战所未有，双方伤亡均頗重。当时参加刘湘方面的其他各軍，存着待二刘力量互相消耗到某种程度时，再加入作战的态度，故皆按兵不动。刘湘在这样严

重的战局之下，又苦无兵力增援，故除以共同利害关系电促邓、田等迅速出兵，合力进击刘文辉部，以竟全功外，已令后方在重庆附近构筑防御工事，以预作战事万一不能支持之准备。同时，刘文辉准备在荣县附近将刘湘之主力击溃后，由夏首勋总指挥所指挥之部队由荣、威乘胜向东道追击，冷寅东总指挥所指挥之部队乘胜由自贡直捣富泸。布置已定，在出动之前夕，冷寅东突接驻在眉山之刘文辉电话，告以战事已不能再继续进行，其原因是陈鸣谦旅已在资中方面叛变易帜，为刘湘收编为师，田部之董长安师和邓部之黄隐师已率兵十团到达仁寿之籍田铺，以袭击我军之后，同时杨森、李家钰等部亦有参加战事打击我军之情事，望冷就近与刘湘协商停止战事，妥筹善后。冷接电话后，即写信派员送与刘湘之前敌总指挥潘文华，请转报刘湘协谋停战。刘湘正在焦灼之际，得此情况，当即表示赞同，并囑潘文华就近与冷寅东协商如何结束战事的善后办法。经双方往返协商妥当，于十二月上旬在老君台签订停战协约。协约要点为：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属之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之线，刘文辉前线部队移驻嘉定属之笋子山及井研之线；刘文辉所部今后仍就现在防地屯驻，军部仍回驻省城。当双方停止战斗、正在磋商结束战事办法的时候，二十四军所派去袭击刘湘后方之王元虎、王治人两旅已绕道到达威远，其先头少数部队已到达荣县城内，但刘文辉军部事前未将此种计划通知前线的冷、夏两总指挥，因而这支部队虽已行将达成任务，而由于双方已商定停战，自不得不仍然撤退。双方签订停战协约后，刘湘曾派其将领鲜特生为代表，命到荣县长山桥劝说冷寅东，以为要使二刘以后不致再度打仗，必须削弱刘文辉的武力，故刘湘之意，希望刘文辉用川康边防总指挥名义留编三师部队前往西康，一俟将来西康建省

后,即担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其余部队由冷寅东在以二十四軍名义統率,直隶于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冷向鮮表示,他同刘文輝的关系极其密切,刘湘的盛意固可感,惟就事实环境言之,确有种种难于受命之处,愿于今后尽力婉劝刘文輝拥戴刘湘統一川事,并居間斡旋,不使两軍再以兵戎相見。鮮特生还特別轉达刘湘的意思說,如刘文輝回駐成都后,无论对任何方面有軍事行动,刘湘既为各軍推尊之盟主,必定要出兵援助,决不袖手旁观。于此可見刘湘对刘文輝尚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其目的只在使之低头就范而尚无根本消灭之意图。

### 二十四軍回师成都的移防談判

二十一、四两軍自在荣县之老君台簽訂停战協約后,双方各从前綫撤退。二十四軍之夏首勛所部撤駐嘉定一带,因嘉定以下之防地均为刘湘所占;冷寅东所部集中眉山、彭山、新津、双流等处,准备回駐省城,其余部队撤駐仁寿、簡阳一带。但回省部队到达双流簇桥及华阳白家場之綫时,即为駐在省門之各方面的部队阻止,不許其入城。冷寅东自双流以电话与邓之将領陈书农和二十四軍留省將領向育仁、唐英及統率刘存厚部队之刘肇乾师长等磋商多次,詢悉是由于邓錫侯背弃諾言,在刘輝文部队开出省城对刘湘作战后,即駐田頌尧、刘存厚、李家钰等部陸續入省。邓又未估計到二十一、四两軍并未进行主力决战即結束战事,深虑为刘文輝所不滿而进行报复,故阻止二十四軍入城。后又由陈、刘、向、唐諸人專車到新津与刘文輝研討沟通后,才由邓商得其他部队同意撤走,許二十四軍部队入省。第因迁延将及半月,故二十四軍部队于除夕日才得入駐省門,而为川軍历年内战最剧烈之一次战事,至此才告一

段落。

### 邓錫侯为居中操縱的战争导火线

二十四軍部队于一九三二年除夕日回駐成都不久后，一九三三年春間刘文輝即召开旅团长會議(只有部分旅长参加)，僉以經過省門和荣威战役以后，虽防地失去甚多，但部队損失不大，且官兵作战能力很强，士气尚旺，如困守现状，不但前途发展无望，且軍精日益維艰，势难持久。他們还认为这两次战事之引起，固有其他主要原因，但邓錫侯实为居中操縱策动者，尤其是二十四軍部队出省后，邓即背弃前言，詎其他部队紛紛入省，而二十四軍結束荣县战事返省，又被其橫加阻止，不詎回駐省城，故对邓皆极为憤恨。当即决定举兵攻邓，以占領其防地，甚至有人主张先将邓扣留，使該部羣龙无首，加以解决后，再进行向北道推进之第二步計劃。在此醞釀期間，二十四軍將領中如吳景伯、黃鰲、张志和等暗中策划倒刘，主张以夏首勛、冷寅东二人用二十四軍及川康边防总指揮名义分統其部队。但因拥倒參差，意見紛歧，且二十四軍大权均集中在刘一人之手，故吳、黃等之策划，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 邓、刘兵戎相見的毘河之战

邓錫侯得知二十四軍已决心举兵进攻，并有先行将他扣留的計劃(系刘肇乾及二十四軍將領黃鰲告知的)，故于仓卒間馳赴新都后，即集中兵力，从灌县起，沿毘河构筑工事設防，并将沿河所有的桥梁或全部毀坏，或拆毀一部；而邓部駐灌县之部队，并将都江堰調节水量之馬杈砍去部分，以增高內江的水位和流速，图阻碍二十四軍渡河。二十四軍虽决心很早，但由于將領中之保定系各有

主张,以致延到五月中旬才出动。双方在昆河对峙将到两月之久,因水流甚急,又缺乏渡河器材,故刘部迄未能渡河。邓部留省将领周紹芝、牛范久等与居間人刘肇乾在战事未爆发之前,曾挽刘文輝协商和解息爭的办法;为刘文輝所最恨的邓部师长黃隱且表示愿去职以謝刘,无如势成騎虎,已无法挽轉。

## 二刘战争再起的急剧变化

刘文輝、邓錫侯两部在昆河相持期間,刘湘因邓之一再求援,并且認刘文輝已成众矢之的,摧毁刘之力量,統一川事的时机已熟,故动员所部直趋成都,其他各部亦在准备出兵援助。刘文輝之初意,拟以相当兵力监守昆河,把主力集中在簡阳附近,誘刘湘主力深入而痛击之。但他又考虑到各軍已动员来攻,如曠日持久,軍糈軍实,困难重重,无充分胜利的信心,故最后于七月上旬才决心放弃省城,退守岷江(上自灌县,下至嘉定),意在平刘湘之气,以緩和局势,并靜待国内情势之演变(因蔣介石虽不滿意刘文輝,但亦不愿刘湘获得全胜,仍想川軍互相牵制,以利于运用)及通、南、巴紅軍之发展,以牵制刘湘。且时届夏季,江水已在泛滥,如刘湘要渡河进攻,亦不容易,因而也可以从容应战。故刘文輝曾以其将领冷寅东名义电刘湘表示,二十四軍愿全部退出省城,拥戴其促进川事的統一,并望派飞机到省,接冷到渝商承一切。但时机已迫,刘湘亦未复电。刘文輝因既已决心要保全实力,以图待机再举,故不得不及早退守岷江。他与卫戍司令冷寅东商量,唯恐在撤兵之际有奸人乘机作祟,重演辛亥年十月十八日事变,則居民生命财产,必将遭受很大損害,从而将为人所唾罵。同时市民亦深以此为慮,咸有戒心。乃由冷发动各街团防加紧組織,并构筑必要之防卫工事。



撤兵之日，先将各城門及各街口之防守任务交由团防接守以后，才将守卫的官兵逐次撤走；同时在城外的部队，一概不准入城，統由城外繞道向岷江撤去。因之，城内秩序，得以无恙，而居民亦未受到損害。

## 二十四軍撤退岷江雅河后的分化瓦解

二十四軍在七月上旬全部安全撤过岷江，实力既未受到損失，且江水亦日益上涨，本可扼江拒守，靜待时局的演变，第因該軍是在順利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般官兵很少受过艰苦的生活，在此困处岷江南岸地区的情况下不免动摇。同时，刘之子侄輩中現任旅团长的刘元塘、石紹武、刘元琮等飞揚跋扈，目空一切；刘文彩（叙南清乡司令）、刘文成（成都禁烟会办）弟兄平时把持財权，战时又不拿出錢来維持部队开支。这些情况都引起部分將領的不滿，因而內部的团結逐漸发生破綻。刘文輝又由于有些人的进諂，对某些將領也发生一些誤会、怀疑。此时，刘湘以乘胜之势，采用各种誘惑手段分化刘文輝所部將領。刘文輝扼守岷江不到一个月，师长陈鴻文所屬之一部，即在灌县与崇庆之間受罗泽洲之运动而叛变，放开缺口（因陈部原为罗泽洲部队，故受其运动）。同时，彭誠孚、邓和两部亦在岷江上游接受刘湘之委任；林云根师所屬亦为刘湘將領楊启文所运动，在彭山青龙場先后发生事变。因此，刘文輝就不得不于八月中旬放弃岷江而退守雅河，但軍糈极度艰难。高汝明旅由洪雅对岸繞道到雅安后，刘文輝以粮食困难，仍令轉回原地就食。在岷江撤退时，刘之將領陈鴻文因由崇庆县退走不及，为在邛崃之李家鈺部队所俘解省。石紹武旅长同时被擒后，被刘湘命令在邛崃枪毙。刘退守雅河以后，为时不过十天左右，师长张志和因

早已向刘湘輸誠，竟在洪雅下游冷、夏两部之間渡河而去。

### 川康划疆而治和內战的結束

夏首勋、冷寅东两人，本为刘文輝將領中的中堅人物，从毘河之役至撤退岷江、雅河，不战而潰以后，他們目睹軍心渙散，認為大勢已去，就率領一批尚能率領的队伍向雅安退去。但刘文輝又以无粮食供应，曾用电話告知冷寅东勿到雅安。同时，刘湘已明白声言，非将刘文輝在洪雅对岸之冷、夏所統的部队完全解决，万不能停止战事之进行。故冷、夏二人不得已于八月下旬先后离开部队，只身而去。刘湘派专车到眉山接冷回成都后，当面告冷說，他对刘文輝并无根本消灭的意思，但必須将其实力大为削減，才能永息爭端。他只許刘文輝保留部分队伍駐在康、宁、雅等地，俟西康正式建省后，即由其担任主席。这时，刘湘部队已进占雅安，刘文輝已退往榮經、汉源一带，部队已損失三分之二以上。冷当請求刘湘将占领雅安之部队撤到名山之綫，許刘文輝仍回駐雅安，双方停止軍事，派員从长协商善后。后得刘湘同意后，由冷电达刘文輝，亦得其贊同，双方即按照上述的办法行事。至此，四川从一九一八年起十五年来之四川各軍閥据地为雄、互相爭夺之混战局面，到此才告一結束。

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

## 关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銀行的見聞

楊 濟 成

一九三七年华北淪陷之后，日寇即扶植大汉奸王克敏于是年十二月在北平組織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簡称伪华北临时政府），同时并指使伪华北临时政府筹設伪“中国联合准备銀行”（簡称伪中联），为“华北发行鈔票之銀行”，并“推行一切临时政府之財政事务”，以图垄断华北金融，榨取华北物資。我当时任北平金城銀行經理，对于伪中联的創設經過及其种种欺騙、压榨手段，皆曾所目親身受，茲就記憶所及，述之如下。

### 一、伪中联向各銀行勒索資金的經過

伪中联在名称上冠以“联合”字样，其主要用意即在于勒逼各銀行共同出資。所以当一九三七年冬間伪中联筹备时期，王克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亲自拟定名单，用霸王請客的手段下帖邀宴北京、天津各銀行經理，写明要亲自出席。北京方面被邀的只有盐业銀行經理岳乾斋一人。他接到請帖后，探知北平其他各行都未被邀，甚为詫异。次日宴前，天津中国、交通两行及金城、大陆、中南三行經理应邀来京赴宴，先到金城銀行落脚，大家亦不知何事。盐业副理王紹賢虽与王克敏有旧僚属的关系，朝夕相見，事前亦毫无所聞。宴后大家又来金城聚会，始知王克敏在宴会上當場宣布要办

“中国联合准备銀行”，发行鈔票，要各行出資，并說南方法币准备都操縱在外国人手中，如何不可靠，等等。当时大家无人应声。后由中行經理卞白眉发言說，“这事很大，我們亦不能作主，要請示总行从长計議。”其他各行經理皆作同样表示。王克敏說，“事在必行，請大家赶快打电报，請示决定。”并當場指定中、交两行各出資一百二十万元，四行各八十万元（有无其他銀行，現在已不記得），并且全要現金。各行經理在金城会商結果，一致認為出資是办不到的事，只有拖之一法。当时并商定由王紹賢向王克敏疏通解釋，說明各行皆拿不出現金的困难情况。当时下午天津各行經理即匆匆离京返津。

天津各銀行經理一去即无消息。王克敏向来办事急如星火，但此次自邀宴各行經理以后即不再过問，出資事似乎停頓下来。后据了解，那是因为王克敏与汪时璟发生矛盾所致。王克敏为了要亲自握掌財政大权，意欲自兼伪中联总裁。而汪时璟虽与王在中国銀行时代曾有过僚屬关系，但他仗恃日寇旅順关东厅财务局长坂谷作后台（他参加华北伪組織，即是由于坂谷的力量），对王自不肯相下。結果王因爭不过汪，对筹备伪中联事遂表示消极。后因日寇催促甚紧，始又改由汪时璟出面，一面筹备成立，一面催索各行資金，企图以既成事实来威迫各行。伪中联遂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正式宣告成立，由汪时璟任总裁。开幕之日，天津各行經理虽被邀参加，俱避不敢来。北京各行則因那时已穷到极点，反能处之泰然。

天津各行因可托庇于租界，业务頗为兴旺，且北京有部分存款皆轉入天津，因此为日寇所垂涎；而天津中、交两行又为发行法币根源之銀行，日寇更是志在必得。伪中联成立后，情况日益紧迫。于是中行經理卞白眉、交行經理徐柏園不得不托詞向总行請

示，相繼秘密离津赴沪，并于走后数日，始由代理人向敌伪当局报告。他们走后，两行代理人听说即被暗中监视；我们在北京的各行经理也被坂谷传去听了一次训话。坂谷说，卞、徐之走，并不是不能打电去截留他们，而是不愿那样作，叫我们转告天津各行。弦外之音，就是“你们不要再走了”。

中国、交通两行负责人走后，这个重担就压在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行身上，而四行肩此重担的就是盐业王紹賢和金城王毅灵。王紹賢在幕后策划，王毅灵则出面折冲，因王毅灵与汪时璟过去在汉口本就相识，有些渊源。王毅灵与汪时璟商量甚久，最后向汪提出，国民党中央政府实行法币时，华北各发行银行缴纳中央银行的现金准备金，当时被宋哲元扣留下来，在华北成立法币现金准备库，由银钱两会保管（实际上是存在中央银库内，当时不能运走而已），现在各行都无现金，而这笔钱当初也是各行缴的，劝汪就在这笔钱上转一笔帐，作为各行向伪中联缴纳的资金融，这样，大家的困难就都解决了。这个办法当经汪时璟同意，并取得日寇认可后，即照此而行。于是伪中联的资金融就如此拼凑而成。

伪中联的组织为总行制。总行设于北平，并设分支行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及天津、青岛两市，共有廿五处。总行设总裁一人，常务董事一人，下设总务、管理、计算、发行、外汇、营业六局和检查、秘书、调查三室。各局设局长（营业局设经理）一人，副局长或副经理一二人，下分课办事。各室设主任一人，下分组办事。职员工役共有一千余人。另有以坂谷为首的顾问室，受敌寇大使馆及华北军部之命，监督该行一切业务，为该行最高统治机关。日籍顾问共有一百余人，薪金由伪中联支給。

## 二、伪联券的发行

敌伪成立伪中联既以发行钞票为主要目的,因此,伪中联成立后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票面的钞票(以下简称伪联券),并规定:(一)伪联券与法币等价通用;(二)持法币者向伪中联兑换伪联券;(三)各银行帐户一律改为伪联券本位,库存法币亦须兑换。以上这些规定除天津租界外,凡日寇所控制的地方均须一律照办。这是敌伪搜括法币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听说他们用这种办法搜括得来的法币并不多,不如他们的预想。这是因为那时银行库存根本不多,而一般人民对伪联券也根本不信任,兑得更少。而且那时敌伪对租界的封锁尚不严密,法币还有路可走;同时,他们需要使用法币的地方尚多,亦不敢禁止法币通行。于是租界上就逐渐形成两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局面,行市互有出入。而银行方面的存款亦逐渐分成两种,存什么取什么,只有中、交两行还不收伪联券存款。但这些情况只限于租界内,天津之东马路就要遵令改为伪联券本位了。

伪中联搜括法币的主要目的,是供日寇军方的使用。因为日寇所占的地方,伪联券尚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仰。他们在内地搜括物资,仍非要用法币作为手段不可。伪联券发行后,为了搜括更多的法币,汪时璟便找王毅灵来商谈租界内银行改为伪联券本位的问题。虽谈了多次,一无结果。嗣后,敌伪对于租界的封锁日益加紧,并于接收天津租界后,即强制执行,将法币按四扣兑换伪联券。

## 三、伪中联的各项压榨措施

伪中联成立后,对各银行的压迫是随日寇的侵略军事进展的

情况而逐步加紧的,概括说来,有如下几种方式:

(1) 查帐:当汪时珷第一次告诉我說日本人要查帐时,我就說,“好极了,我們关門候查,查完再开。”他問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說,“現在人心惶惶,存款动搖不定。日本人再到各行查帐,一定引起挤存风潮,各行必然应付不下。不如我們十三家一齐关門,听你們查完了再說。我敢說我們十三家意見是一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他听罢默然很久,然后說,“我同他們(指日寇)商量后再說,你先莫慌告訴大家。”結果一直拖到日寇天津租界接收以后,才由伪中联顧問室派人來查,主要是查庫存現金,并且規定以后每月要表报一次。北京的中、交两行則收归“傘下”(“傘下”詳后),对交通銀行还派了常务顧問。

(2) 不許各商业銀行互相存放:伪中联成立之初,門庭冷落,鈔票沒有出路。各商业銀行同它的往来亦不多。我們商业銀行仍以中、交两行为主,彼此互相存放,收到各家支票只轉帳而不兌現。伪中联为了替伪联券找出路,就不許我們各行互存,而要以它为主,所有存放一律移归伪中联。对于这条規定,我們当时只遵守了一半,即:一方面拨一部分存放伪中联,一方面我們仍私自往来。

(3) 繳存款准备金:以前各商业銀行办理儲蓄存款,曾向国民党中央銀行繳納过四成保証准备(即有价債券)。伪中联成立后,規定各行过去已繳的不算,要重新繳存。那时我已赴上海,得电赶回,商之至再,始由四成改为二成,必要时可以动用。

(4) 組織票据交換所:規定各商业銀行、錢庄銀号每日所收的票据,都要到交換所去交換,然后到伪中联去轉帳,不足者补存。这一次措施是給銀錢业一次大的打击,各行号仅有的一点活动余力都被他打尽了。

#### 四、各銀行吸收机关存款的真相

在伪中联上列这些措施日益加紧的压力下，各商业銀行不得不采取种种办法以图生存。帐面小的固然可以收縮帐面，但金城帐面又不能縮小，只有另图別路。銀行資金的来源是存款，而民間存款我們那时又不愿去招攬，无已，只有吸收机关存款一法。最初我們吸收的机关存款只是小額的，存戶大都是各伪政府机关的事务科。那时伪政府虽然明文規定所有机关存款必須存入伪中联，但因伪中联总裁汪时暉兼伪华北临时政府財政部长，而各机关都不愿让他知道它們的財務情况，因此多不愿存入。各銀行趁机拉攏，就很順利地拉过来了。但这些机关存款都是要回息的，大約三厘至四、五厘不等。当时存入金城的伪机关的大数存款，以伪建設总署开端，而且是个伪机关的負責人殷同找上門来的。当时殷同找我說，他有一笔需要，拟拨三百万元存活期，保証在一定期間内决不提取，但要定期的利息，要我帮忙。他还說，这笔利息并非他要，而是另有用途。我告訴他說，这是违法的。他笑笑說，伪中联方面由他关說。次日他即开来伪中联支票三百万元。事后我問伪中联的主管科长，他回答我說，“这件事总裁知道的。”这样，我們吸收伪机关存款，就算奉了明文。相繼而来的，还有伪治安总署和治理黃河委员会，总数在千万元以上。那时金城就靠这些为养命之源。別行情形如何我虽不清楚，但凡是存款架子大的都不能例外，只是各家的手法不同而已。至于錢庄，則更是五花八門，有的存款根本就不走帳，伪中联查亦无从查起，何况它們都各有各的內幕布置。



## 五、金城銀行舞弊案

金城因得到几戶大笔头的伪机关存款，出入較大，庫存多了，就要把現鈔存入伪中联。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就发生了存放与出納串通，伪造伪中联的签印收款单，陸續盜用了三百万元的大舞弊案（事后在天津追回廿余万）。此案发生后，我們以为存款必要大动，但事实上存款并未下去多少，有的还去而复来。当时汪时暉安慰我說，他招呼各机关不要提存。表面上看来，是他照顧我，实际上他亦怕金融上惹出大乱子，不好收拾，并非对我独厚。而广大的存款戶不来提存，那才真是照顧。同时，四行联合营业，我們也沾光不少。

## 六、天津四行儲蓄会办理登記之黑幕

伪华北临时政府及汪伪南京政府先后成立以后，日寇以为南北打通，天下已成一統，于是对各銀行又更进一步进行压迫，要南北各商业銀行重新登記。这件事也惹了很多的麻煩。最后是由各行总行出一封信，声明由資产中拨出一百万元作为資本办理登記，但实际上各行所出数目皆不相同。对于四行儲蓄会，敌伪认为既不是銀行，又不是銀号，不允登記，并且听說他們还要征用天津四行儲蓄会的房子。这是一件大伤四行脑筋的事情，因四会的庫中隱藏得有盐业銀行的私貨——清宮抵押的金鐘。这事先由我行天津經理王毅灵据理力爭，久久不得結果。后天津四会經理胡仲文来京，託我以私人关系託伪中联的某局长，請他替我們从关說，代为說明四会与四行是一体的，四会停业，恐引起四行及整个金融业不安。其間虽經過許多曲折，但交談数次，經過二个月的时间，总算成功。事后由四会送了十万元現款酬謝了这位局长。当时敌伪人員錢多

了，就买房子或金条，而这位局长却用这笔钱修了生墓，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 七、“伞下”银行和储蓄银行

所谓“伞下”银行，是日寇为了搜括物资而设立的办理特殊业务的银行。这些银行最主要的业务，是盐及鸦片。凡是日寇势力所控制的大城市都有这类的伞下银行。华北的冀东银行，山东的鲁兴银行，以及后来的河北省银行，亦都是他们的伞下银行。最后伪中联为了吸收民间存款，曾创立储蓄银行，要各银行堆花存款<sup>①</sup>，而又不许用各银行名义。当时我们认为这是骗日本人的一种手段，但是也不得不敷衍一下，原因是恐怕把他们弄急了，要叫各行停办储蓄或转存给储蓄银行，那就影响太大，麻烦更多。所以大家以各行库存现款化名送存，同时即以此项存摺在库中抵现。储蓄银行成立未及一年就换了两任经理，毫无成绩可言。那时市面上哪有人肯来储蓄，光靠各商业银行的一点私人关系，真是大海中的一粟，根本无济于事。

## 八、天津各银行经理之被捕

日寇进入天津租界以后，一面强制执行法币四扣兑换伪联券，一面在伪中联天津分行召集各行负责人，要他们具结遵守金融法令，违反者受刑事处分，并在具结书上打手印。不久，各行经理即被拘捕十余人。我曾请汪时曜出面营救。他说，“我早就说过了，他们不肯听话，现在我亦无法解救，看看再说。”当时被捕原因传

<sup>①</sup> 按照银钱业惯例，每当一行号新开张之时，得要求各同业存款，以装璜门面，吸引存户，这种性质的存款称为“堆花”存款。

說不一。我行夏采臣先被釋放出來，他也說不出所以然。後來王毅靈出來，我問他為了何事，他說他在裏頭用各種方面來試探，皆未得到真實情況。王毅靈是由天津金城續副理找人向日寇憲兵隊花錢贖出來的，單是送給中間人的洋服料禮物就送了許多。被捕經理中有被折磨死的。這完全是日寇勒索的強盜行為，並不見得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 九、鴉片押款和發行大鈔

抗戰末期，有一天汪時暉忽然召集各行負責人，拿出一張憑單，要各行做一筆鴉片押款，按各行的存款比例分配押品，利息一分，並說這是為了照顧各行的業務。總數已記憶不清，大約總在幾千萬元。各行當下只能接受，不能還價，中、交兩行也在其內，亦成了他們的“傘下”。到抗戰勝利前夕，我就憑這一紙憑單向偽中聯要求收回這一筆放款。它們亦知好景不長，未費多少口舌，即辦妥手續。我並通知中交及各行一體辦理。手續辦完，我們亦陸續提現儲存，以備萬一。事後才知道，汪時暉要各行做這筆鴉片押款，是因為要發千元大票，所以先用這種手段將各銀行的活碼集中。

偽中聯成立後，最初發行的偽聯券，票面只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種，在最初一段時期內還相當穩定。後來隨着日寇的侵略戰爭和搜括物資的需要不斷加大，偽聯券也越走越廣，越印越多，偽中聯日益窮於應付；後來印都來不及印了，只好增發五十元和百元大鈔。於是鈔票貶值，物價飛漲，百元大鈔已不濟事。一九四五年三月再增發五百元大鈔。隨後，相隔僅兩個月，復增發千元大鈔。最後到了是年八月日寇投降時，五千元鈔也出了籠。偽中聯每增發一種新票，事前必有一種措施（如前面第三段所舉的種種及鴉片

押款等),来榨取銀行的游資。而日寇的五次治安強化运动,也都与这一系列的措施有連带的关系。

## 十、日寇投降后伪中联的結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后,伪中联总裁汪时曝由蔣介石的特务周济陪同飞往重庆,不知作何勾当。汪回来后,国民党政政府所派的財政特派員張果为亦已来到。十月十七日由張果为会同中央銀行接收伪中联,这一祸国害民的伪金融机构至此結束。

根据中央銀行北平分行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接收报告,伪中联发行伪联券的数字如下:

1. 訂印券	318,590,649,007.30 元
2. 未收券	121,126,120,000.00 元
3. 已收券	197,464,529,007.30 元
4. 发行券	142,399,854,507.78 元
5. 銷毀券	2,362,631,890.48 元
6. 庫存券	52,703,042,609.04 元
庫存	29,592,951,410.36 元

上列庫存均系中央銀行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接收时的数字,庫存中除天津、青島少数部分外伪中联总行庫存二百九十余万元,均經国民党政政府財政特派員撥交平、津中、交两行代伪中联垫付同业存款和办理法币押借伪联券之用,实际上同业存款儿等于零,不过为法币抵借伪联券开一方便之門,以供国民党来平接收的大員們搶購物資之用而已。

关于伪中联的发行准备金部分,中央銀行的接收报告中所列数字如下:

## 一、生金銀

1. 生金 5,074,687.89 公分

折合本位币<sup>①</sup> 49,666,151,903.42 元

2. 純銀 11,534,433.92 公分

折合本位币 1,036,000,000 元

3. 雜銀 3,112,141.22 公分

折合本位币 132,468.47 元

4. 銀元 15,399,719 元

5. 銀輔币 94,907 角

折合本位币 6,327.13 元

## 二、外币存款

1. 日币 22,278,486,478.28 元

折合本位币 22,278,486,478.28 元

2. 特別日金 7,656,668.36 元

折合本位币 4,987,177.98 元

## 三、貸出款項 国币 70,433,653,333.50 元

合計国币<sup>②</sup> 143,434,817,407.78 元

上列准备金数字,看起来很象一回事,但如加分析,則不难看出,其中銀元部分是当初实行法币时各行向中央銀行繳納的准备金。还有一部分是日寇接收租界时按四扣向中交两行、各商业銀行以及人民手中掠夺得来的。至于所存生金,除了其中一小部分是伪中联在日寇投降以前不久,因看到大势已去而用高价买进的以外,其大部分是日寇正金、朝鮮两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用高价

---

①② 即国民党政府的法币。

抵还给伪中联的。因为日寇当时自知已注定失败，而他们在我国掠夺来的东西既不能运走，早晚是被中国政府没收，不如抵还给伪中联，既可减少他们对伪中联的负债，而又可充实伪中联的准备。实际上这是先以发行钞票掠夺物资，然后再用高价售与伪中联，既可收双重剥削之利，又可掩人耳目。而汪时曦当时尚以此事自居有功，认为充实伪中联的准备。他为虎作伥，竟至至死不悟。

## 四川防区制时期金融货币紊乱情况

吳 晉 航

四川自防区制形成以后，軍閥互爭雄长，混战迄无宁岁。各軍为了維持其不断增大的軍費开支，剝削的手段也愈趋殘酷。田賦借墊不滿所欲，則改用田賦預征，且由一年預征一年，逐步发展到一年預征几年，甚至有达十年以上者；同时又巧立名目，抽收苛捐杂稅。但是这些压榨方法往往仍不能滿足他們紧急軍需的要求，遂进一步采用金融手段，濫鑄劣币，濫发鈔票，或用非法票据貼現，以騙取大量現金。竭泽而漁，尽量压榨，其流毒所及，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現就个人在这一段时期中見聞所及，分別敘述，以供参考。

### 刘成勛发行的銀元券

一九二三年春，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勛与一軍熊克武、边防軍賴心輝联合对楊森、袁祖銘作战，相持数月。是年夏間，刘成勛即曾提出发行銅元紙票，以济軍用，以省議會和商会一致反对而中止。后以軍費奇絀，刘又提出由成都官銀号发行銀元券二百万元，票面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用造币厂余利担保，六个月后兌現。省議會初亦反对，但在刘成勛压力之下卒得通过，实际发行总数共二百九十万元。当时錢店不愿行使，多数停业。商会为維持市面兌

換，減少糾紛，乃組成公濟錢莊，呈准發行一百文、五百文、一千文銅元紙幣。此項紙幣流通不到一月，市面即發現大批偽票。商會決定先收回一百文銅元票。省議會提出應徹查發行額，並追查造幣廠按日撥作兌換的銅元如何開支及真偽如何辨認；輿論亦頗多攻擊。銀元券因此亦受影響。總司令部為維持信用，乃規定銀元券每日抽籤一次，中签號碼立予兌現。後賴心輝率一、三各軍進入重慶，隨軍帶去的亦是此項銀元券，強迫行使，為時雖暫，亦達四十餘萬元。賴所設之重慶官銀號在軍事倥傯之際發行銀元券，根本无任何担保品。成都銀元券因此也受到影響，市價下跌，每元只值四角四五。到十二月下旬，軍事愈趨不利，熊克武、劉成勛會銜明令停止抽籤付現，價更下跌。軍隊復持銀元券在市上強買物品，因而商家大都停業。於是再通令軍隊所領銀元券只能向本部長官掉換銅元，但事實上又不易貫徹。熊、劉失敗後，這種銀元券均未收回，損失終由人民負擔。

### 袁祖銘鑄造銅元和發行銅元票

清末在四川重慶筹建銅元局，民初開始鑄造銅元。一九二三年袁祖銘進駐重慶時，以保護銅元局為名，派其親信楊德純任局長，收購廢銅及制錢鑄成當廿文、當五拾文制錢的大小略有等差的銅元，从中剝削盈利，划作黔軍軍餉，別軍不得過問。不仅如此，袁並在重慶市內設一官錢局，發行銅元票，票面分二百、五百、一千三種，注明即用銅元局所鑄銅元來作兌換。時間稍久，兌換每每誤期，信用漸失，最後亦因袁祖銘被迫離川回黔，此項銅元票遂在人民手中成為廢紙。鑄造銅元，擴大面值，減少成分，已是一種剝削；再發行銅元票而不兌現，則更加上一重剝削了。



### 刘湘的鈞益公期票

一九二三年間，刘湘因有中立各部川軍的支持，取得吳佩孚同意，先以善后督辦名義再起，与袁祖銘同駐重慶。当时刘湘防区尙小，从田賦稅捐方面剝削的收入不多，常感軍費无着。他以原有軍需人員不能理財，改用川北富商奚致和为財務處長，采取商業票據方式，向重慶商家高利貼現，搜括現金。但軍方本身既不能立出商業期票，如新創一商號，又不能在短期中取得市場信用，遂与商人孫樹培勾結，借用孫所經營的鈞益公字號代出期票，宣稱以軍部應分鹽稅為保證，大利誘人扣現。利息由三四分逐步提高到五六分，最后到過大一分六。當其出期票之初，軍方亦提保證，俾為收回到期票據之用，以期建立信用，便于以后緊急周轉。但時間愈久，數量愈大，支付巨額利息已極困難，更無法支付到期之本金，因而只有不斷加發期票，最后遂造成不能收拾的局面。刘湘以避債无術，曾被迫準備去職。后經全軍協商，才決定一面縮編軍隊以省開支，一面成立丁戊債務委員會，從事整理，準備分期償還。此項債額總數為四百萬元。

### 中和銀行偽鈔案和鄒汝百墨條

繼鈞益公之后，刘湘在重慶又創辦中和銀行，孫樹培仍為負責人之一。中和銀行表面上是一個新型金融企業，實際上非常空虛，工商界早知其是為軍方周轉，先有戒心。該行業務既不能正常發展，只有大量發行鈔票。但是該行派往上海印制鈔票的職員王鴻賓，在簽約以后復買通印刷機構，私人加印大批偽票，携回重慶行使。不久經人告發，銀行亦發覺市面流通數目顯然超過銀行發行

額，遂成立中和銀行檢查清理委員會進行處理。王鴻賓雖逮案法辦，偽票作為七折兌現，但是所謂重號鈔票，只能在發行票額賬的記載上有公私可分，而票子本身根本就沒有真偽可辨，單是鈔票四十余萬的損失，結果仍加在人民頭上。中和歇業後，改由軍方直接出面成立總金庫，經管糧契庫券（詳後），但以發行不能太多，運用不能自如，後乃由金庫經理鄒汝百私人出具簽名墨條，交由各師旅自行向銀行錢莊商號或私人貼現，時間由半月到三月不等，利息的大小也有不同。軍方鑒於過去利息過高，無力支付，曾規定軍部只貼息二分但事實上各師旅急於取得現款，再自行貼息二分或三分不等。此項金庫鄒汝百墨條，總數達一千零幾十萬元，連同上述鈞益公期票本息債額四百萬元，一直拖到一九三五年成立四川省政府時，才併入發行公債整理舊債案內，按照公債票面償還，實值亦只有六折左右。加以公債分年既長，利息亦微，與當時當地金融情況相較，人民所受損失不小。

### 王陵基鑄造大銅元

一九二六年袁祖銘被迫離渝後，劉湘所部師長王陵基曾一度自任重慶銅元局局長，圖謀從鑄造銅元中剝削利潤，但由於原料價格上漲，鑄造數量不足，成本提高，一年之間，虧折達三十余萬元。王束手無策，才用劉航琛為顧問兼管事務所，劉遂建議改鑄大銅元，一面收購制錢及以前所造當十文、廿文及五十文的銅元，一面委託商號，許以大利墊款購運原銅，改鑄大銅元，面值由五十文提高為一百文、二百文。這一辦法，可在物價跟不上漲時，從中攫取利潤。又因原料來源新有增加，成本開支減輕。一年結帳，不僅三十余萬元虧折彌補，還盈餘十余萬元。當時四川各地廣大農村

所使用的貨幣，皆普遍以銅元為主，所以鑄制大銅元，不啻是一種最廣泛最殘酷的壓榨手段。當時因物價跟不上大銅元的膨脹，不少的縣鄉，或將大銅元砍為四塊，每塊權作五十文；或砍為兩半，每半各為一百文；有的甚至用錫餅、鐵片、竹簽作二三十文，為買賣貨物找補之用。劉航琛看到如再繼續鑄造，物價逐步上漲，等到與銅元面值相適應時即將無利可圖，乃力勸王陵基及時停鑄銅元而訂購白銀改鑄銀元，其成色等於民國初年四川省所鑄造的漢字銀元。這種銀元成色低於龍元及袁頭銀元，只比雲南半元與四川廠板半元略高，僅維持一個較短時間，終因無利可圖而停鑄。

### 劉湘的糧契庫券和川康銀行

銅元局獲得重利後，劉湘以劉航琛有理財能力，任為軍部財務處副處長兼會計科長，不久即任為處長，授以重權。隨著劉湘軍事力量的擴張和防區的增加，劉航琛將本防區內抽收的各種貨物捐稅合併征收，成立稅捐總局，簡化手續，美其名曰苛而不擾；同時發行一種糧契庫券，票面分一元、五元、十元，凡廿一軍防區內人民必須先用銀元兌取庫券，始能完糧納稅。採用此種辦法，一方面軍方可先收得現金，另一方面又能推廣流通範圍。但是重慶中國銀行代海關收稅，拒絕收用此種庫券。後由軍部先撥一筆現金存入中國銀行作為保證，中國銀行才同意代收。當時中國銀行襄理張禹九為財閥張公權之弟，故劉航琛不得不作此讓步。廿一軍併成立一個委員會，半數以上的委員聘請工商界人士擔任，經常查核稅捐總局每月收入數目及糧契稅庫券發行情況，以減少社會上的疑慮，而有利於庫券流通額的增加。劉湘在財政上周轉活動的能力，果然在一個時期內賴以加強，因而用買飛機，購兵船，製造槍炮，擴張

部队,从而逐渐形成四川各軍中的一个优势力量。

刘湘創办的川康殖业銀行,表面上采取純商业銀行有限公司的組織形式,但实际上刘湘个人股額即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川康除經營普通銀行业务外,仍以发行鈔票为重点,以最少量現金作兌換准备,另以一些“有价証券”(实际上只是一些放款凭証、仓单等等)来作保証准备。当时重庆尚有美丰商业銀行,亦发行鈔票(該行最初是中美合資,在財政部取得发鈔权)。重庆市府的平民銀行以周轉市面为理由,亦发行五角輔币券。廿一軍乘各銀行信用膨漲,資金活动力較強之时,以高利向各銀行借貸周轉,債額逐漸扩大;并又成立四川地方銀行,大量发行鈔票。一九三二年工农紅軍进入川北,刘湘主力潰敗于綏宣,其余各路亦一蹶不振。刘湘迫不得已,亲赴南京乞援。是时四川的防区制业已根本动摇。負有川政責任的廿一軍,旧債既不能偿还,新債又无法再举,地方銀行鈔票亦发生挤兌風潮,情况日益严重。蔣介石为了迫使刘湘財政金融信用根本破产,另由“委員长行營”明令地方鈔停止兌現,一律以八折收回。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才由財政部核准发行公債八千萬元,以了結刘湘历年来各項債務。

### 成都各軍私鑄“杂板”

成都是四川省会,一九二四年楊森被逐以后,为刘文輝、邓錫侯、田頌尧三軍合駐地区,因为不是通商大埠,商場交易习用硬幣。民国初年,四川軍政府曾发行軍用票,陈宦入川又发行濬川源銀行券,均无充分兌現准备金,后来逐漸貶值,也均未悉数收回。濬川源券曾規定每月抽签二次,中签可兌錢一千文,但后来发现重号,經查明是由于刘存厚兵敗准备退出成都时,將中签而未銷毀者強

迫提用之故。此事发生后，人民对使用鈔票更无信心。成都聚兴誠商业銀行及与廿四軍有关系的裕通銀行、与廿八軍有关系的康泰祥銀号，亦各出有流通執照，均为数不多，先后自行收回。

成都于清末建有規模較大的造币厂，历来为各軍爭夺目标之一。三軍合駐成都时期，造币厂隶属廿八軍軍部，鑄造半元銀元，获取利潤，以助軍需。所部將領发现鑄造半元，降低成色，可以得到更多利潤，是一生財捷徑。当时完整机器不易購置，且所費不貲，他們遂紛紛私設小厂，用手工业兼用部分机器仿造半元銀币，在市面行使。为时稍久，数量漸多。旋被人民发觉，把正式造币厂所出半元叫作厂板，把私厂所造半元叫作杂板。杂板成色最低者，只有銀質四五成不等。如以厂板杂板掉換生銀、龙元、袁头、及川板汉字大洋，皆分別貼水；如兌往汉申各埠，汇費尤巨。大洋、厂板、杂板兌換銅元，其价格亦各有等差，杂板价格最低。币制如此紊乱，民众深感痛苦。商会始而提出禁用，三軍部虽予批准，但数日太大，舍此又別无貨幣流通。乃采用各商帮二次請求，先由三軍部严禁私鑄杂板，同时严禁收买生銀及大洋，以断杂板的原料来源。对以往流通的杂板，由三軍部限期无折扣收回，未收回前暫准照常办理收交，在定期收回时，再分別加以鉴定。但私鑄者并无顧忌，仍繼續鑄造，以牟厚利。据当时調查的資料，仅成都市区及灌县两地，規模較大的私厂即有十三个，計：成都南門外一个，属邓部謝旅；成都城内忠烈祠一个，城隍庙一个，同属邓部李师；貴州館一个，属邓部刁旅；三桥南街一个，属田部曾旅；貴州館街一个，属刘部刘文成会办；灌县七个，皆属邓部江防軍及邓国璋师。至于其他各部在外县私設之厂尚未計及。邓錫侯一方面受到輿論压力，一方面又感到杂板半元繼續泛滥，也影响軍部直轄造币厂所鑄的厂造

半元，曾決心要徹底查禁私廠，并由三軍長會銜禁止非廠造半元行使。但廿八軍內部曾為此引起激烈爭吵，如李注東司令于會議時拍案反對，謝德戡旅長以軍費無着相要挾，拒絕照辦。鄧亦感覺處罰人員無法辦到，遂先行明白公開宣布，如查出私廠鑄造半元，立即將機器搗毀，廠址封閉。但是各私廠均各有背景，雖經三軍會同查禁，而禁者自禁，鑄者自鑄如故。廿九軍田頌堯在成都雖一再表示願意共同維持，可是他在所轄防區三台突然明令規定廿九軍防區內除雲南半元照常通用外，川省半元辨別不易，無論廠造與非廠造一律八折。因此各地市面均起劇烈混亂，成都所受影响更大，爭端時起，半元幾乎不能行使。三軍部根據商會請求，一度同意兌現維持。但在流通半元不分廠造或雜板一律通用後，要求十足收回，事實上本無可能。何況私鑄系高級軍官主辦，更是無法根絕。是時銀行不收半元，商人即不能持此辦理匯兌，也就無法從事收交。半元兌換銅元價格也不斷下跌，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只能換銅元四千二百文。三軍部再應商會請求，決定辦法四項：1. 加強力量搗毀私廠；2. 雜板半元暫定五千六百文，廠板半元不得低于八千文；3. 雜板由政府設鑑定所多處，分別鑑定蓋戳，市面則照定價行使；4. 政府在三個月內照定價收回，三月期滿，雜板不許流通。當時成都市面因幣制紊亂，商家大都被迫停業，几同罷市。鄧錫侯更單獨出示，從一月十日起，每日由造幣廠撥出銅元五萬串，交警察分五個區署，照五千六百文兌換雜板，每人每日限換一元。但是鑑定所遲未成立，私人交易，雜板只換四千余文，廠板六千文。加以各警署兌換銅元，擁擠異常，辦法亦未盡善，不肖者因緣為奸，豪強者日換多次，貧苦老弱則根本無法兌到，因此，怨聲載道，益增紛擾。經軍商雙方再度協商，改訂辦法，廠板仍由銀錢市自行議價，雜板則照議價作七折

兌換。根据新办法，厂板市价能換五千九百文，杂板能換四千三百文，秩序漸复，商家亦逐漸开业。

### 成都銀錢业的“執照”

成都本是使用硬幣市場，因此兌換錢店历来皆較別埠为多，每一十字街口，皆設有錢店，大都兼營油米业。此种錢店，按照习惯，必須間隔五十家，始能設立一家，即帮規所謂口岸，資本一般都比较薄弱。順成街安乐市为銀錢业市場，每日交易价格，在成都全市具有決定作用，由于厂杂板半元不易辨別，常起紛爭。各銀号錢店遂自动发行執照，填明大洋數額，流通市面，等于行使鈔票。这些商号資金既未經审核，執照亦无准备，政府机关亦不管理，因此信用愈膨漲，物价愈昂貴。成都附近各县民众，因为币制紊乱，怕受到意外亏折，产品多不肯运来。但各銀号錢店所发執照，轉为市民所乐用，向市場兌換銅元，反較厂板稍高，杂板更不用說。杂板跌价后，竟又有人私毀杂板。提炼銀質出售，因各种杂板先后所鑄成色不同，提炼尚有余利。龙元及袁头每元可折合厂板一元六七角，云南老板五角亦可折一元二三角。市价如此，私鑄杂板已无利可图，遂不禁自絕。有人統計此項杂板为数几达三千万元，无怪乎成都曾传遍这样一付諷刺对联：“五角生洋破烂哑；三个死人邓田刘。”可見民間当时因此对这些負責諸公怨懟之深。

各銀号錢店所发執照，三軍部漸加注意，曾經提出查驗資本，限制发行。但經營銀号者大都与各軍軍官有密切关系，并未認真取締。后来提出執照准备金問題，社会上才对執照的信用发生动摇。執照兌換大洋遂发生貼水，各錢店皆不愿代为兌換平素往来关系不深的各家執照，市面因此又有新的波动。

由于成都市制的混乱，对省外汇价也是不断上涨。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情形特别严重，每百元即需汇费百余元，厂板每二元只换大洋一元，以致各军发伙饷亦感到困难。火已烧到各军本身，势不能不管，而各军如各自单管自己防区，也不能解决问题。至此，三军部始提出成立币制善后委员会，来处理币制紊乱所造成问题和市面交易上发生的纠葛。当时厂造半元兑换铜元已跌至三千二百文，尚无人肯接手，每一百旧大洋可换厂造半元二百二十余元。汇款到省外各埠，以厂造半元交兑，每百元再涨至一百四十余元，汇水高于汇额，为前所未有。六月中旬造币厂改铸一元新大洋，并由邓、田、刘三军长会衔出示，限令发行执照各家一律于旧历五月底收回，过期如仍行使，即以伪造货币论罪。各商家始均自行悬牌收回。厂板半元市价小回，每元可换三千五百文；一元旧大洋价亦回跌，每百元可能掉换厂造半元二百元。执照虽逐渐绝迹，但新大洋如掉换厂板，与旧大洋比较，每千元仍相差三十元上下，可见民众对新大洋成色仍有怀疑。三军部再会衔出示新旧大洋一律行使，不准歧视，同时并令省会各税收机关只收新大洋。经此雷厉风行，成都市制历年紊乱问题，暂告解决。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



# 蔣方震小傳

張宗祥

## 家世和幼年時代

蔣方震，字百里，五十歲后又別號澹寧，浙江海寧州人，一八八二年（即清光緒八年）九月某日生于海鹽縣。他祖籍原是安徽，先世以經商為業，很早就因商業上的關係遷居在海寧州所屬硤石鎮水月亭的地方，以經營典當業為主，也產生了几個有名的鄉里之士。他祖父生沐（光煦）先生篤好收藏書籍、字畫、碑帖，延請了一班當時名人畫客如張叔未（廷濟）、費曉樓（丹旭）、張子祥（熊）之流，又建築了一座別下齋，而且又刊印了《別下齋叢書》和《涉聞梓旧》兩種書，當時就成為杭、嘉間一個收藏鑑賞名家。現在談起收藏家來，大家多還知道“別下齋”這一名詞。生沐先生子女頗多，生到百里的父親已經是第十九個了。百里的父親名學煥，字澤久，生下來就沒有左膀，只在左肩下垂着二三寸長的一條沒有骨頭的肉。生沐先生一見他就不樂意，待養到十歲就將他送至海鹽一個寺廟中出家做沙彌，送了廟中一筆錢，算是香火之資。（這事有一段俗間傳說，說是生沐先生最愛第五子，偏又早殤，殮時生沐先生用硃筆寫了一篇往生咒在亡兒左臂上，所以再來時就失了左臂。又據傳說：生沐先生時與東山塔院一老僧往還，他因想念亡兒，曾

問老僧此儿能否再来。僧曰：来是一定来，就是緣滿，来也不喜欢了。这段話我也曾听老僧的徒孙說过。我想畸形胎世間多有，何足駭异，这不过吃饱斋飯闲着无事的僧众編造出来一段神話，一方面哄騙世人，一方面宣传佛氏因果之說罢了。至第五子的遺像，我却见过，穿着翻轉紫貂馬褂，还是費晓樓經心着意之作。）泽久先生做了几年小和尚，他却不喜歡念南无，也不喜歡念子曰，另外找出一条讀医书的門路来。到了廿余岁，他就还俗行医。不久就在海盐娶妻楊氏，也是寒門单戶的孤女，所以后来百里幼孤，无外家舅氏亲戚的扶助。泽久先生据說确仅有右手，亦能吹笛，又能随口編造唱詞，有时也偷偷地回硤，瞞着父亲，和兄弟等說說笑笑，是一个极为活泼快乐的人物。但是他并不愿意提到归宗的問題（在旧社会中，已經出家的人就不能再过問本族的事，族人亦不再认为同族，因为出家之后就算出族了；如果要恢复原来关系，必須声請归宗祭祖之后，方算合格）。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泽久先生病卒于海盐，百里时年十二岁，母子二人一无生活可謀。楊太夫人乃使百里回硤，奔走請求于族人之門。泽久先生有弟行二十一，首先倡議，拨田数亩、披屋两小間。各房乃公議集田三十亩給母子衣食。楊太夫人略諳文墨，能穿补竹衫（是旧时暑天所着衬衣，用极細竹枝以綫連綴成各种鏤空花文，穿着久后綫断即須修补，乃是一种精巧的手工业），一方面作工，一方面訓子写字讀書。其时百里之叔世一先生适延倪勤叔先生課其子冠千，百里时时溜到书房里去听誦。勤叔爱他聰慧，又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和楊太夫人說，他愿教百里讀書，不收束脩（按当时的习惯，未做詩文的学生每年六元至八元，已开笔的学生八元至十二元；三节送禮可以称家有无酌送，也有不送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穷学生）。从此百里就从勤叔讀書，

学习詩文。我也就在此时和他相識，时时聚在一处談談功課上的事情。（勤叔是我老表兄，写得一手好灵飞經小楷，考书院极有名。我当时右足骨結核病方愈，从姑夫費景韓先生讀書，倪、費二人时时来往，碰到談及学生們的用功和資質，必然要提到我們兩人。

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們两小的思想。但是我們当时連旅順、大連和馬关究在何处，尙有点訛識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強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訴我們这些道理的。我們急得沒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約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接着又是戊戌变法。我們这个时候已經能考书院，得到一点膏火之資了。恰好双山书院购进了四大經、史、子、集和时务、策論、算学、格致等书。我們听見了这一消息，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連忙請求老师每天早一二小时下学，到书院中看书。书院中一間小屋靜靜陈列着四个书櫥，除了我們两人之外，連一个人影都不見。房門钥匙是交給我們的，书櫥是不鎖的。我們第一次爭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憤录》之类，因为我們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識。随后各人检爱看的书看。我看的史、地一类为多，他看的文学一类为多。短短的七八个月中，总算得了一个大概。当时也各写了一点筆記，現在連影子都沒有了。

百里在十七岁进学之后，第二年就在离硤石不远的伊桥孙姓亲戚家中教书，又訂了袁花查氏的一門亲。不久他就投考求是书院，取为外班生（当时年紀較大、程度較高的定为內班，年紀輕的定为外班）。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百里被选派至日本成城学校留学，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步兵科，与学习騎兵科的蒋尊

籀(百器)齐名,同为功課最好的学生。因为士官的中国留学生至第三期方露头角,而二人又为之冠,所以当时通名为二蔣。一九〇五年他們在士官学校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日本明治天皇曾亲自参加,并頒給他們指揮刀等奖品。他們毕业后又赴德国見习一年,领导他們的就是兴登堡元帅。他們見习期滿,准备回国时,我正在嘉兴秀水学堂教书,忽然接到百里从日本寄来了一封信說,浙江邀他回国練新軍,但他因要到北京不能来,并說百器来浙江任二标标統,首先要办弁目学堂,因他和百器的交情与他和我的交情一样,极盼我去帮百器的忙。他又託单不广(丕)向我劝說。我就到了杭州海潮寺住上一个多月,等到弁目学堂已經办好,方始离杭回到嘉兴。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我任职北京大理院时,百里正在南苑禁卫軍中任管帶,相見了数次。有一次留宿寓中深夜长談,談的主要是他的婚姻問題。我也替他叹息,又劝他忍耐。原来查氏訂婚之后,在百里留学期間,楊太夫人深恐将来文化程度不相称,曾經婉告查家說,恐怕毕业須待数年,不妨解約。查氏答复是:留学十年等待十年,百年等待百年。因而百里回国后于一九一一年即与查氏結婚。但是查氏是完全旧式閨女,无法可以湊合,这是百里当时一桩极苦悶的事情。

这一时期,百里是一个純粹研究軍事学的軍人,对一切政治体制都不表示主张,但內心却是厌恶清廷,覺得他們顛預、貪污,是无法可以支持下去的。

### 辛亥革命至大革命时代

辛亥革命时我在浙江,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关系,不可能与之談及政治問題。后来百里的求是书院老师陈仲恕(汉第)告訴过我关

于百里在东北的一件事（当时仲恕在奉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中）。据仲恕說，正在江、浙两省宣布独立的时节，忽然有一天总督轅門上来报有蔣方震要見，其时文藪（袁毓麟）、伯綱（邵章）均在座，急忙請他进来，問他来意。他說：“长江南北多易了旗帜，我来見赵次帅請他早点宣布独立。”仲恕說：“你真不知此間实情。几个有实力的領兵大員都是清朝的忠臣，次帅如果要独立，还要通过他們，得他們的首肯。况且次帅恐怕沒有这种思想。”正在談論时，忽然一个得力当差匆匆跑进来低声对仲恕說，各鎮多聚在客厅要請見次帅，而且帶有很多卫队，不知有何举动。仲恕听說，急忙将所帶鈔票取出，又向各同事索借一些，約有一百余元，交給当差說：“你領这位客人从后門出去，送上火車，車开了再回来。”百里也就立刻起身而去。后来方知各鎮知道百里来东消息，所以来向赵尔巽索人，當場赵答以并无此人。赵本不知道百里之来，态度自然是很真实的，各鎮方不怀疑而去。

一九一二年冬天，百里以陸軍少將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到了一九一三年間，某日報上忽然有保定軍官學校校長蔣方震用手槍自戕一案的新聞刊登出來。我那时还在杭州，急去電問生死，无复電；問其硃石家屬，則知楊太夫人已北行。乃再函電詢安危，得楊太夫人復書，謂人已脫險回北京休養。一九一四年一月，我至北京任教育部視學，到后即趨百里寓所，則見他已恢復如常。問原因，則曰，已過之事，不必談。楊太夫人為述之曰：“百里欲擴大保定軍校組織，屢商之軍部，似有允意，及至將計劃送去，却被軍學司司長魏宗瀚首而擱置不理，繼而完全推翻。這一項計劃，百里在校中曾屢次開會商討，且曾向學生透露一部分，現在一无成就，所以在校中召集學生訓話，將此事詳細經過及所擬改革方案詳細說明之后，

就拔出手枪当胸自击。”楊太夫人談到此，又手指跟百里的一个少年差弁李如意語我曰：“还亏此人見百里拔枪，即狂奔上讲台，出死力拉其右手，枪得不当心穿过，仅伤肺部，乃得保全生命。”我回顧問如意，如意說：“当校长說到全部計劃不能实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見過他这样悲憤。又見他伸手摸腰际，就觉得情形不对，已經預备上台；及見手枪，就不管多么危險，跳上台去搶夺了。”（如意是十六七岁时即随百里的，后来百里亡过之后，又收拾他的骨灰，現在仍留上海，替百里管管房屋。）于是百里向我說，“我从此認識了这一班狐羣狗党的下流軍人。”他又告訴我，經如意这么死劲一拉，枪口向左，子弹从肋骨穿出，心脏未伤。所尤奇的是：枪弹穿透前后肋骨时皆从骨縫中穿过，一根也沒有击断、击碎，后来又就日医医治，所以經過良好。我問現在伤处状况，他說，就是怕受涼，終年須以厚布围胸，方觉舒适。这时北洋尙是袁世凱窃政时代，直、皖軍閥尙未形成，而百里所受的打击，却出在段祺瑞领导的陸軍部之下，硬对头魏宗瀚又是段的亲信，所以百里后来始終未与皖系有过关联。百里当时虽然心脏未曾直接受伤，但后来心脏始終不好，且卒以心脏病去世，恐怕这一枪击就是他不能长寿的根源。可能他的心脏实已受伤，不过当时不致送命而已。从此之后，百里在北京任总统府參議和統率办事处軍事參議官。百里在医院治伤时，有一位日本看护左梅女士很細心伺候他，当时已是两情相洽。百里又不乐与查夫人同居，楊太夫人其时随百里在京，查夫人仍留硤石，而左梅女士又回日本。于是京寓中母子两人未免寂寞，且楊太夫人望孙心甚切。遂由周赤忱（承葵）至日本将左梅女士接来。一日忽然楊太夫人打电話来囑我今晚必須携妻抱女赴东城便飯，不可不来，且須早来。我于散值后即携妻女同去，至則見一切陈設，頗

有办喜事状态。楊太夫人見我至，即出，命我入內室，則一盛粧女士已在內室，乃知即為左梅女士，今日為之合卺。于是共趨宴飲之室，盡歡而散。成婚后，生長女昭，又生次女雍。楊太夫人急于得孫，有义女王若梅，亦命百里納之，但始終无所出。故現在百里所存四女，皆左梅女士所生（原為五女，長女昭早卒）。

百里和蔡松坡（鐸）是极要好的。松坡為人深沉強毅，既以术脫身赴津，欲赴滇舉兵反对帝制。袁世凱派陳公洽（儀）追之，公洽語百里及予，且商進止，蓋公洽亦不滿帝制者。予曰：“若自赴津可耳，松坡恐已走，未必能見到。”公洽悟，別去即派人趕至津逮松坡乘日本輪行。公洽至津，果未遇蔡而返。

一九一八年，百里進中將，數年之間皆寓居北京。一日語予曰：“我將著一書論中國書學，上卷為中國書學在世界美術上之位置，我自任之；下卷為中國書學源流，爾為我寫之。”我曰可。一旬后，我書成，彼乃未著一字，我書遂獨立付印。一九二〇年秋又語我：“有德文版馬克思《資本論》，思與君共譯之。”我曰：“我不識德文，子自譯之可矣。”百里曰：“我意欲以古典式文字譯成，若嚴幾道氏《原富》之類，故欲與子合譯。”我曰：“可，然必先知全書宗旨所在，方可著筆。”乃約定每日以兩小時為會談時間，經一周始開譯。譯未完首章，百里有事出京（似赴日本，但不能確定），從此遂擱置。一九四九年冬，我在上海聞百里滬寓的書籍將盡出售，欲購留此德文原本作紀念，急使其姪至國富門路，至則早為書賈所取去，不可復得。

一九二〇年，百里被舉為浙江省省議會議員。當時的選舉必須要花錢運動得來，而百里既沒有余錢，實在也沒有參加選舉的兴致；這是因為有一個朋友忽然要代他爭得此席，而此時又恰因有一

席地位大家爭得昏天黑地，不得開交，于是就容容易易把他選舉出來了。一九二二年秋天我也到了浙江，開會的時候他時時回到故鄉來，就在硤石水月亭舊宅旁邊買一塊地，仿照北方樣式造成幾間平房，安住楊太夫人、查夫人和王若梅側室；又買了東山麓下一塊地種上幾枝梅花，預備將來建幾間小屋作為讀書怡老的歸宿。這些錢還是幾個學生幫助湊集得來的，不是完全出於他自己。等到住屋造成，楊太夫人遷入不久，就得病逝世，醫藥喪葬之費，真有點拮据。百里最愛學生唐孟滿（生智）和幾個湖南學生，一聞百里喪母之訊，急派人用竹籬挑了現錢送到硤石，這可見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百里在省議會中，一切小事未嘗過問。一九二三年為了要提出預建浙江大學堂，曾和蔣夢麟聚在我的寓中談了兩日。我意先以專門學校為基礎，而浙江此時僅有法政、醫藥兩專門學校，工、農兩科均無，必須先將甲工、甲農改建為專校，如此則大學成立時將幾個專校合併，就很有基礎了。此議得他們贊成，遂一面改建工、農專校，一面提出預建浙江大學案，得到通過。

一九二四年百里因為母喪未滿，且有浙省議會的關係，也時時回浙。是年孫傳芳入浙時，他正在杭州。孫到浙之後，對於士官先後同學是極拉攏的，一到就把陳公洽找去了，并到處在找百里。當時百里恰恰在我寓中，孫就如獲寶一般把他請了去，不久就請他擔任總參議。這是百里第一次與直系軍閥合作。百里自畢業歸國之後，雖然是學的軍事，但是對於各系軍隊多沒有關連，尤其是浙江軍隊在楊善德、盧永祥之後，皆是武備、陸軍小學兩系在當家，他的性質又灑脫流勁，所以公洽當了師長，百里仍無實權。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時代，百里在孫傳芳軍中與孫同駐九江，後又在吳佩孚處充當總參謀。吳在四照堂頒布命令抗禦奉軍的時候，



他也在場。及至大革命以後，百里方始退居滬上。

### 国民党政权时代和宜山逝世

百里在滬時，唐孟瀟為購國富門路一宅，供老師休養之用。當時我也在滬住大通路，時時可以晤見。這時他似乎有點頹唐，搞了一個小小銀行，隨隨便便地尋人談天。等到蔣介石清黨和寧漢分家，唐孟瀟軍隊駐于河南的時候，百里有一天告訴我說，孟瀟當有舉動倒蔣。我說，這應該聯合西北和閻錫山等軍隊，方有力量。百里亦以為然，而且認為肯定可以聯合。及至報上發表孟瀟討蔣通電時仍用孟瀟原銜領頭，閻錫山等人皆未列名。我見到了報紙，即雇街車至國富門路語百里曰：“何以君不阻止？孟瀟如此鹵莽，軍隊南扼于蔣軍，萬一閻氏在北方也有變動，豈不危險？”百里則曰：“此電發時閻亦派代表在唐軍中，經商定後發出的。”我說：“閻氏老奸巨滑，極不可恃，我意此電正當推之領銜，使其無可抵賴反復；派一代表，未必可恃。君宜自作計圖安全。”越二日，我在金融市場處得密訊，知孟瀟總部已被抄，即雇車馳晤百里，告以此訊，且曰：“總部被抄，爾之密電本必亦被抄去，子可行矣。此間後即華界，極不安穩，如無避處，我大通路寓所可以暫住。我與各方面政治活動無關，不如決住我處觀變。”百里則認為唐軍雖敗，而他本人与南京政府熟人尚多，不必避開。我則堅欲其行，爭論二三十分鍾，見不能動，我始回寓。又越二日，單不廣病歿滬寓。不廣為予兩人總角交，傷寒復發，知其病危甚，事先曾與百里相約如有不好消息，即各携款至單寓為殯殮計。我既得單之死耗，即電約百里同去。百里乃在電話中語我：“予不能去，一切惟爾主持。”我知有異，匆匆料理不廣喪事後，再一探聽，則知暗探已日夜守住百里，不許出門一步，旋即解

至浙江。我赴杭欲为之謀，所恃者一学生陈布雷；及至杭，布雷适已赴南京，乃匆匆回沪。其时主浙者为张人杰（静江），其人极不近人情，且待百里殊无礼。幸不久即轉解南京，聞解时且加桎梏于手足，真可恨也。我探知百里已解送南京总司令部看守所后，乃到宁赴獄候之，尚安靜。第二次又赴獄候之，則左梅女士亦在南京，且可以日日入獄为之整理衣服、洒扫房屋。百里則时时閱讀佛經，写写字。一日語予曰：“隔壁房中邓演达君昨日枪毙矣，獄中少一叙談之友。”又出所书金剛經一卷相贈。予别后即有汉口之行，知其事已漸解，生命无忧。在汉口聞其出獄，即馳信囑留住南京，不必急回上海，然百里則已回沪数日。后相遇，知此事之解仍得孟瀟力，而为之进言者乃汪精卫。百里且語予：“尔劝留南京，此言极确，但我每至南京，一下火車即住勵志社，亦与子意相同。”自此之后，乃为蔣介石所容，且亦时时有所委任。蔣介石被扣西安时，百里亦在从行之列。后又曾为南京政府奉命使德，出国前曾至汉口来相晤。我知此行必甚秘，亦不問其究竟，特贈玉魚佩一，以示万里相別各自珍重之意。

一九三七年抗战軍起，次年我即先自汉口撤退入桂林。忽一日百里又来相訪。我首言及其近著《国防論》、《日本人》两书，认为《日本人》一书最佳，并謂：“举国半有恐日病，留日学軍事者更甚。子独能詳細分析日本人情形，此真知彼知己之談。独叙日本財閥尚未明彻。我意資本主义国家之一切政权，久尽操于財閥手中，譬如日本自明治变法以来，除伊藤博文一任內閣总理与財閥无关外，其余非三井、三菱子姪即为其甥舅，虽犬养毅亦輾轉与財閥有关，此点何以不詳細列入？至于《国防論》新旧杂糅，此犹是从前考书院作风，何不删繁就简，使成有系統之书？”百里笑曰：“子說誠

是。日本人昨日聞有五百“个”(意指五百本《日本人》,当时百里故意說成“个”字)到重庆了,此即予平日所謂何以中国人不肯日費数分錢定一份《朝日新聞》之类看看,略知日本国中大势。至于《国防論》則取其字多,好多得稿費而已。我昨方到桂林,知予在,即訪至此。第一須为我覓一医生检查心脏。第二想請你太太烧点家乡菜吃吃。”予妻笑曰:正欲赴菜市,此間牛羊肉甚多,又有芋头,即携篋赴市。我亦語百里有平汉路局医生张姓、黃姓者属此不远,即同車去。张医生細細听診,認為心脏确有病,但不甚危險。百里同車回予寓,車中告我此行乃赴黔代理陸軍大学校长。至属飲三花酒,食芋头煨鴨子和紅燒羊肉,縱論半日始去。明晨予訪之招待所,入門,叶南帆君即邀予在室隅相語。叶曰:“我跟百里师数年来如一日,旁达未尝变,先生深知之。今百里师赴黔不欲我相隨,甚痛于心,請先生必为一言。”予諾之。見百里后,室无旁人,問其組織大概,則知管理总务、財政諸事皆委之赵墨龙,亦其学生也。墨龙我不熟悉,只語以南帆相从多年,无过失,人慧而朴,何不亦帶之行。百里无語。嗣又数相聚晤,南帆又囑予相助,然百里終不携南帆去。相別前夕百里語予:“明晨某时行,好在經子門,当在門口图一面。”不知彼出南門而予实住北門門内,遂相失。行二日,有电来曰因病住宜山。又二日,电来告喪。是时交通不便,无車可覓,遂不能临其喪,然終不意其死如此之速。时浙江大学亦在宜山,祝廉先弟(文白)、郑晓滄弟(宗海)皆在校任教师,乃快函詢病状。晓滄弟答甚詳,云夕間尚在百里寓,見其食面碗余,尚无异平人;夜間得病,即由浙大校医診治,已不可救。时馮玉祥將軍亦亲自至宜山訪問病况。百里歿后,即殮葬于宜山县之鶴山。抗日胜利后,其姪复璉商于浙大,得校地于万松岭,乃自宜山迁杭。解放后万松岭另有

他用，又将迁葬。左梅女士偕李君如意到杭訪予議所从。予曰：‘其他予不知，予則自愿火葬。葬宜移浙已多事，今复欲他营，予以为可省。且百里学生杜时霞（伟）正主南山公墓事，何不与之一商。’左梅女士然之。杜亦主火葬。即用石塔葬于南山公墓錢文穆之墓之西北，一切均由杜主持。焚时左梅女士先回沪。次日收拾骨灰，如意来告曰：“骨灰中忽有一物，检视即先生贈家主之玉魚。当时主人爱之，終日佩帶，死即以殉，今尚未化，故取以来。”予即命李将此物即携至上海交左梅女士或其女收藏，以为記念。自此百里乃长眠于凤凰山之下。

百里五女，昭最长，未笄而卒。今所存第二女雍及第四女名某，皆适人，旅居国外；第三女瑛，适錢学森。第五女名某适周，皆在北京服务。左梅女士即随三、五二女居北京，若梅仍居硤石。

百里四十后从梁任公为师，盖不欲专以軍事学見长者；其好博覽縱觀，性情亦有类于任公。然政治經驗皆浅，故从政則非所长；师生之相合，盖亦因其性質有相同之点故也。

我与百里同岁，而百里小于予半岁。自十二岁时相識至于今日为之安排葬事止，盖六十余年，生前相聚处亦四十余年。議論有不合，見解有不同，予則必反复爭之，百里則鉗口不語，然終未尝以为忤，亦决无面紅耳赤之事。盖予慧而百里慧，皆能相諒。至于二人出处向背之間，則各行其是，未尝一相商，亦未尝一相詢。盖相处至六十老翁而犹若童时天真，故能一无所忤。

近来传百里者，有湖南陶菊隱先生一篇，极詳尽，然有时或可补充。予故就予所知者写成此篇，恐仍多挂漏。但就予所亲历、所見聞而言，則所記皆事实，无一夸大之詞，亦无一违心之論，或者可供采擇之用。

一九六〇年八月于杭州

## 袁祖銘“定黔”始末

譙志篤

貴州省政治協商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組根據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指示和要求，要我寫一些有關我省黔軍活動的歷史資料來響應黨的號召。因此，我訪問了好幾位從民國初年以來就在貴州軍政方面活動、深悉內幕的前輩先生，獲得不少史料，加上我自己從一九二二年參加貴州軍閥袁祖銘“定黔軍”工作，到一九二三年被滇軍襲擊、退往四川這一年間所知的一鱗半爪，綜合起來寫成這篇素材。但事隔三十餘年，我的回憶難免有些遺漏，記述其他先生所談，也可能不夠完整，希望親歷其事的先生們和同志們糾正。

袁祖銘在全國來說，不算一個大軍閥，而在西南來說，他確是一個數一數二、野心勃勃的大軍閥。他不僅“圖霸西南”，還妄想“問鼎中原”。他控制過貴州政局（不僅他自己做過省長，還保委過彭漢章、周西成做省長），操縱過四川內戰（先後曾任川黔邊防督辦和川、黔、鄂、陝、甘五省聯軍總司令），而且後來又做過國民革命軍左翼軍總指揮，頓兵湘西，虎視大局。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在短短五、六年中，他曾經是一個反動政治舞台上的風雲人物。

袁祖銘是貴州安龍縣人，貴州陸軍小學畢業，清末任劉顯世的靖邊團防營隊官。辛亥革命後，團防營改陸軍，劉顯世以其外甥王

文華為團長，袁為營長。一九一六年護國之役，袁升團長，一九一七年護法戰爭時升縱隊長，出兵援川，旋升黔軍第二師師長。他在戰爭中有謀有勇，功績稱著，為官兵所信服，但由於功多而驕，不肯偪促為“轅下駒”，同時也因為“功高震主”，大為總司令王文華所忌，屢加抑制。這是造成袁祖銘後來派人刺殺王文華、組織“定黔軍”的直接原因。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貴州政局自一九一六年護國之役之後，以王文華為首的新派和以劉顯世為首的舊派，在政治上爭權奪利的明爭暗鬥，日趨尖銳和複雜，終於發生了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間在貴州政治歷史上素來所未有的幾次殘殺血案，使貴州社會陷於恐怖，政局動蕩不安，從而成為袁祖銘組織“定黔軍”回黔戡亂的有力藉口。為了追溯與“定黔”有關的歷史背景，應當從一九一九年王文華與張協陸因柳渝鐵路借款問題公開破裂這段歷史開始說起。

### 柳渝鐵路借款掀起了貴州政潮

一九一九年，王文華曾和其兄王伯羣商議，由王伯羣代表貴州省公署在上海與華僑趙某（背後有法國人）接洽，出資修築柳渝（柳州——重慶）鐵路，同時將鐵路兩旁各三十公里內的礦產歸鐵路公司開採。附帶條件是：貴州省公署向鐵路公司借美金一千萬元興辦實業，年息六厘。這件有關貴州整個經濟建設事業的大借款，事前不僅貴州省公署不知道，就連督軍兼省長劉顯世也不知道。王伯羣把他在上海和華僑趙某簽訂的草約寄回後，劉顯世召集各廳長和省議會議長及地方紳耆開會討論，大家方才明悉。王文華出席說明經過後，與會諸人對於修建鐵路、便利貴州交通運輸，原則上表示同意，但大家認為此事牽連川、桂兩省，必須取得他們的贊

成合作。其次，大家对于附带借款一千万元美金开发贵州实业一节，认为从签约之日起即照付利息，而事先又无计划，如此，企业还未见效，每年便须先付息金六十万元美金，折合银洋一百二十万元，当时贵州地方财政收入每年不到三百万元，军政各费开支尚感不敷支配，这笔利息从何而出？对于大家所提的这个疑问，王文华回答说：“办实业三年内自然不会生利，可以‘挖本填息’。”会上有人又说：“交款时先扣除三年利息一百八十万元美金，就损失银洋三百六十万元，未免太吃亏。”王文华就用威胁语气说：“官兵欠饷几个月，不发钱就很难维持，希望从这笔借款中拨一百六十万美金补发欠饷。”大家默然不语。实际上，驻川黔军饷项由四川省按月付给十三、四万元（定额十五万元），足够开支，并无欠饷之事；王文华不过是以此威胁大家通过借款条约，以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刘显世见着僵持不下，便转圜说：“下次再详细讨论。”当时无结果而散。次日清晨，政务厅长陈幼苏到财政厅长张协陆家，并约集省议会议长张彭年（张协陆之弟）共同密商应付办法。陈首先表示：“我是政务厅长，责任尚轻，你们一是财政厅长，一是省议会议长，都必须在条约上签字。如果借了款做不成事，不仅受到人民的攻击，还要留给后代子孙的骂名。”张协陆说：“今天若附和他们，将来绝无人原谅，责任所在，牺牲亦所不辞。”三人协商，态度一致，坚决反对。张协陆以财政厅长的职责，提出了书面反对意见：（一）修铁路是贵州人民和政府多年来的希望，但铁路两旁各三十公里内矿产由铁路公司开采，即令我省同意，川、桂两省是否赞同？（二）创办实业，事先无计划，挖本填利，损失太大；款既要借，可缩减为银元三百万元，每年息金十二万元，由财政厅负责筹付，不增加人民负担。（三）此项借款必须点滴用在办实业上，军政机关不能挪用，

并由負責长官立約簽名蓋章保證。張協陸不僅將這項意見向政府提出，還連同草約全文印發，因而引起了全省人民尤其是貴陽市民對王文華弟兄的行動的極大不滿。王、張就從此公開破裂，並且因此而掀起了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間貴州新舊兩派在政治上不僅是暗鬥而且是明爭的巨大政潮，釀成了貴州政治歷史上為了爭權奪利而殺人流血的幾次禍端，從而危害了廣大人民的生活和安寧。

### 谷、何組織暗殺團

張協陸既不與王文華合作，甚至出面公開反對，使借款問題歸于失敗（從那次會議無結果後，即擱置不談），新派自然更加仇視張協陸了。劉顯世的“謀士”熊鈺岩當時任貴州中國銀行行長，又兼督軍署秘書長，向不為王文華所利用。劉顯世胞弟劉希陶時任駐京代表，曾密電熊暗中制止王文華圖謀奪取貴州政權的野心活動，此電為王文華所悉，因而恨熊刻骨。因此，王于借款問題失敗後，就唆使其死黨谷正倫、何應欽等組織傷兵到張、熊兩家吵鬧示威，同時擬定十三個人的黑名單，招集親信六十餘人組織暗殺團進行暗殺。陳幼蘇首先遭到暗算，因時在深夜，僅受重傷未死。這個恐怖組織在取得第一次暗殺政敵的勝利後，更加猖狂，公然企圖用明殺手段來謀殺張、熊：他們密謀召開一個平民大會，并把庫存舊棉軍服三千套運出分送市民，條件是召開平民大會之日，人人都要到會。他們企圖以暗殺團分子為骨干來操縱這個平民大會，在会上宣布張、熊反對修鐵路、辦工廠，使窮人不得生活的“罪狀”，煽惑羣眾找張、熊算帳，把他們二人強迫拖到省議會，并逼迫張彭年作主席，執行民眾審判，宣布二人死刑，立即在省議會門前槍斃，同時分兩組人到張、熊兩家私宅查抄財產。他們這個陰謀當夜就被張協陸派去打



入这个組織的人回报。在这个阴谋手段未定之先，谷正伦还叫其爪牙唐念益(先是张所用的滥文人，后倒向谷)在报上大登广告說，他不久要出一部“财政厅黑幕大观”，来公开威吓张协陆(此书始終未出版)。张見情势极端恶劣，欲生不能，欲逃不可；即令逃出貴阳城，中途还是危险，与其受辱被杀，不如自裁而死。他遂函促张彭年快快逃走，而他自己則于张彭年走后不久服毒自杀。张彭年輾轉逃到上海以后，积极帮袁祖銘策划一切軍事、政治活动，其目的之一，就是替兄报仇。

### 民九政变的成因和惨杀的内幕

一九二〇年貴州政变，演成杀人流血的惨剧，其内幕錯綜复杂，并不是如一般流传至今的“是孙剑峯蜜干出来的”那样，实际内幕是：自一九一九年陈幼苏被刺、张协陆被迫自戕后，旧派人人自危。他們认为要搞垮王文华，必先解除其兵权，而督軍刘显世昏庸老朽，兵不在握，对王虽深恶痛絕，亦无可奈何。旧派中人多与云南唐繼尧有私交，乃秘密求援于唐。一九二〇年某月，唐繼尧电刘显世，謂：即派韓凤楼(滇軍宿将，曾几次来黔)来替王文华为在川的黔軍总司令(唐彼时为滇、川、黔三省联軍总司令，在名义上可以指揮在川的滇黔軍)。此电为黔省督軍署譯电員曾宪孔所得，即密电重庆。王文华閱电大怒說：“我还没动手，他們就动起手来了。”他就馳赴成都郊外龙泉驛与滇軍軍长顧品珍密商。顧早对唐繼尧不滿，其中虽別有原因，而他与王文华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觉：滇、黔两軍在四川苦战，唐、刘不仅以此作政治資本，在家里坐享其成，还怀疑他們，不如各自打回老家去。王、顧二人商定后，顧品珍就回云南策划了倒唐事件；而王文华則回貴州发动了“民九政变”。

王文华既取得滇軍顧品珍的同意，各打回本省去，即赶到重庆下令布置。据说，当时王文华的計劃，是叫他的部下指揮官胡瑛、谷正伦以“清君側”为名，赶掉旧派的熊鉄岩、郭子华、何季刚及丁宜中（督署机要秘书），代之以他的亲信，但仍拥戴“光杆督軍”刘显世做傀儡，同时他本人則避往上海，如此就免得背上一个部下逐长官、外甥赶舅舅的恶名。他預計在半年以后，他的軍隊把貴州政治上的障碍扫清，自己就可以四平八穩地由上海回貴阳坐享其成。但是王文华的这个算盘并不如意，他的副指揮谷正伦和他素来勾結密切的政客牟貢三，在回师遵义执行向貴阳夺取政权的軍事布置中，变更了王文华的指示，而派先遣部队警卫营长孙劍鋒到貴阳与何应欽秘密联系，捕杀了熊鉄岩、郭子华。何季刚聞警逃脫，只子姪三人被杀；丁宜中藏匿得好，也未遭害。谷正伦为什么要这样殘忍屠杀？一方面，他素来就参与王文华的阴謀活动，知王深恨这些人，杀了正迎合其意。另一方面，又別有他个人的政治阴謀：他企图用这种蛮干手段来激起黔人对王文华的公憤，使王“无面見江东父老”，回不得貴州，这样，他就可以从中大做其文章，就可以登上貴州政治舞台（后来王文华在上海遇刺不久，貴州就发生谷正伦从中操縱的“五旅长爭权”的一幕丑剧）。王文华听说貴阳搞的政变太厉害了，觉得面子上过不下去，曾对人說：“他們是要我回不去了。”这就証明其中内幕的錯綜复杂。

因为政治上的爭权夺利而发生的一九一九年的暗杀和一九二〇年的明杀，造成了袁祖銘“戡乱”、“定黔”的有力借口。

### 袁祖銘潛往北京

袁祖銘在王文华的部队中由于勇敢善战，王依为臂助，屢加提

拔，从連、營而升至团长。袁恃功而驕，且因王文华是文人出身，不能冲锋陷陣，尝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一九一七年护法之役，袁以团长兼第二纵队长率黔軍两团助熊克武击败川督刘存厚于成都，战后，授意团长李蘊奇、魏应鰲及參謀刘端裳等电督軍刘显世、总司令王文华要挾，要升袁为副司令。王文华意識到袁将篡夺兵权，严电申斥，但仍保升袁为黔軍第二师师长。袁仍不滿足，图謀将所部拖到陝西別图发展。事为王文华探悉，由貴阳赶到重庆，将袁等調回，旋即解其兵柄，飭各团归还建制，并責令赔偿浮报軍費开支八万元。袁祖銘因此悶悶不乐，怀恨在心。一九二〇年川战又起，川軍进逼重庆，王文华命袁为总指揮率兵六团应敌，战争結束，調为总參議。袁更憤憤不平，乃乘王文华命黔軍搞政变而王本人去上海的机会，到重庆南岸黃葛埡运动中下級軍官拥戴他回黔。副指揮谷正伦知道袁这个阴謀，在两人同榻吸大烟时，谷以暗示的語气警告袁說：“总指揮的枪(烟枪)很好，送我两枝，不然我派人去繳。”袁很机警，心知不妙，即送谷烟枪一支，而将其手枪数十支交与亲信一团团长彭汉章。他既抓不到部队，被迫跑到上海。王文华在上海听說袁祖銘也到了，深恐別有阴謀活动，即派亲信朝夕陪袁嫖賭，表面上是引导他玩乐，实寓監視其行动之意。某日袁祖銘找到张彭年，神色惊惶，四顧无人，才說：“我被王电輪(文华号)派人監視，行动很不自由；我有一个亲信何厚光在此，我叫他和你接洽，有話由他轉达。”又問脫身之計于张。张回答：“这很容易，叫何厚光替你买好上北京的車票，你在宿‘堂子’的次晨溜到車站，等他們发觉，你已到北京了。”袁祖銘就这样悄然离沪，潜到北京。

## 王文华在上海被刺

由于袁祖銘的介紹，何厚光常与张彭年往还，共商除王之策。何觉得很难找到下手之人，张彭年就拿出十多个旅沪的闲散黔軍軍官对王文华表示怨恚的信給他看，其中有些人是何厚光的哥老会弟兄，他选上了賀永安（假名，本姓张，后充袁的黔軍总司令部谍查长）。何厚光煽动他說：“你我弟兄当年在貴州遇到仇人，一歪嘴，一眨眼，就白刀进，紅刀出，今天干他（指王文华）还怕嗎？”賀永安便慨然承訖当刺客。王文华素来就喜爱烟、嫖、賭，每天下午都要到一品香旅館过那种腐化生活，賀永安就在一品香开一間靠近馬路的房間伺机下手。某日王文华在一品香門口刚下汽車，賀永安一弹从窗口飞出，击中了他的左肋。王文华想从車尾繞到汽車外側上車逃跑，賀又发一枪，弹从背上腰間射入，复发第三枪，亦击中。貴州的这个少壮派軍閥的首脑就在一品香旅館門前結束了他的生命，距一九一九年他阴谋狙击陈幼苏、逼死张协陆，一九二〇年赶走刘显世，惨杀郭子华、熊鉄岩及何季刚家屬，不过一、二年。賀永安見王已中弹倒下，目的已达，乘混乱中由一品香后門溜出，在“野鸡堂子”宿了一夜，次日将手枪交还何厚光。

王文华之被暗杀，除了以他自己的血償还他殘杀政敌的血債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他和袁祖銘爭夺貴州軍政权的矛盾尖銳化到了頂点。王不屡夺袁之兵柄，則不能高枕无忧，回黔統兵主政；袁不图王，終是籠中之鳥，要想振翼雄飞，決不可能。“先下手为強”，这个暗杀事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 “定黔軍”的組成

袁祖銘到北京后，初住在刘希陶家。刘为人极为吝啬，袁不安，迁住前四川盐运使张英华家。张与袁原在重庆相熟，时方闲居，亟欲謀出路而苦无机会，袁祖銘一来，他就以此作为向靳云鵬內閣献功的礼物，袁祖銘也利用张的介紹向北洋政府勾搭。于是，张介紹袁去見財政总长潘复，訴說貴州政局混乱，人心不安，中央政府不能不管，請求援助，安定貴州。靳云鵬也想利用袁祖銘想回黔攫夺軍政大权的企图，乘机把貴州納入北洋势力范围，以牵制湖南、四川，不使倒向孙中山方面，就通过潘复的接洽，叫袁拟回黔計劃。袁是个武人，又长期在四川打仗，对貴州政治内幕并不甚彻底明了，如何去干，拿不出具体办法，就向潘复介紹张彭年，要他来京共商。张到京对潘复表示：不需要中央动大兵，只希望帮助械弹和軍費，就可以回黔戡乱；如遇战事，只要一部分北洋軍隊作后盾，胜利絕對有把握。潘复轉报靳云鵬，并取得靳同意，除由財政部拨款二十万元与袁祖銘作筹备費外，当时天津意大利洋行存有步枪三千支待售，商定由袁往购，訂約后由財政部付款。至于軍隊，則电武昌两湖巡閱使王占元照拨。袁、张持靳云鵬介紹信到湖北見王占元，王拨张允明旅(补充旅)归袁指揮。一九二一年春，“定黔軍”总指揮部就在武昌小朝街正式成立，袁为总指揮，张为总参議，下設各处，安置軍官数十人。他們既要武装回黔，必須通过湖南或四川，而川远湘近，自以走湖南一路較便，当即派人向湖南省长赵恆惕假道。赵初則犹豫，不作具体答复。此时四川督軍熊克武(国民党人)探悉袁祖銘借北洋政府的支持准备回黔，就赶到长沙对赵恆惕說，貴州扼川、湘之背，袁如回去掌握政权，扩大了北洋势力，于

两省都不利。赵遂决心拒绝袁假道。川、湘既挡驾，袁、张束手无策，又转回北京找靳云鹏、潘复解决。由于那时川、湘两省都打着联省自治招牌，不听北京政府号令，北洋政府莫可如何，因而袁、张在北京住了半年，不得要领。

### 袁祖铭与吴佩孚发生关系

一九二一年夏间，赵恒惕攻打王占元，岳州失守，武汉岌岌可危，王占元电北京告急。当时靳云鹏正以“和平内阁”为标榜，若是国内和平破坏，势将下台，就一面通令全国申讨赵恒惕破坏大局，一面严令王占元反攻。王战败辞职，靳云鹏就调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率所部由洛阳南下，一战而收复岳州。赵恒惕向北京乞和，熊克武接应赵恒惕之川军亦由夔门撤退。当吴佩孚由洛阳南下时，靳云鹏、潘复就电吴支持袁祖铭回黔。袁、张到汉口和吴佩孚接上了头，吴表示尽量帮助，允拨汉阳枪六千支与袁组织部队回黔。袁祖铭与吴佩孚发生直接关系自此开始，他以后在黔、川政治、军事活动中一直走直系军阀的路线。

### 袁祖铭夺取黔省政权的胜利和施政之一斑

当袁祖铭向湖南假道遭赵恒惕拒绝后，就遣人到广州、桂林与黔军团长王天培、彭汉章密商回黔夺取政权计划。因为这两人过去都和袁私交很深，又均不满意于王文华指使谷正伦等搞民九政变、惨杀政敌的行为，因此，袁既欲回黔摧毁王文华系军政势力，王、彭两人首表赞同。当时驻紮在湘西洪江之黔军游击司令王小山，原系刘显世所组织的用来对抗王文华的一部分力量，袁亦派人与之勾结。因此，一九二二年一月，袁祖铭不带北兵，也不用向赵恒惕

假道，仅带随身少数人员和张彭年一起到了洪江。王天培这时已受孙中山先生委为大元帅府直轄中央黔軍第一混成旅旅长，彭汉章亦委为第二混成旅旅长、吳传心(厚安)同时被委为第三混成旅旅长，均在桂林一带准备北伐。王、彭二人走的政治路线，与袁祖銘本来是矛盾的，何以会不随孙中山先生出兵北伐而轉回貴州？这是因为他們二人的直接长官谷正伦被孙中山先生委为中央直轄黔軍总司令(原为黔軍第二混成旅旅长，王、彭均为其团长)，图謀回黔掌軍政大权，但由于民九政变是谷在遵义下令干出来的，谷极为黔人所痛恨，这次谷想回黔夺取政权，王、彭非常反对，因此与袁結合，拥袁驅谷。谷正伦率軍行至本省榕江西山附近时，聞王、彭已变，带一連警卫先行逃回，行至独山县，又遇彭汉章部营长朱幼吾截击，但朱把他放过。后谷經貴阳向四川狼狽逃走。王天培、彭汉章既赶走了谷正伦，王即派其參謀长傅晉廷率兵一部与原駐清江河一带之王天錫营到洪江迎袁，和駐紮該地之王小山、貴州鹽硯厘稅局长楊德淳，在袁祖銘的主持下开会商討回黔行动，决定分三路进兵：傅晉廷、王天錫率所部护卫袁祖銘等取道鎮远为中路，时駐防鎮远之毛以寬团(一混成旅竇居仁部)亦向袁表示同情，遂不战而入鎮远，毛并为前鋒。王天培、彭汉章率所部由榕江、独山向貴阳挺进为左路，沿途暢行无阻，首先进入貴阳。右路方面，銅仁所駐竇居仁旅是坚决拥护王文华系的，王伯羣彼时亦在銅仁，想由竇旅拥他回黔主政，但竇旅之另一团胡刚亦傾向袁，毛、胡两团又均归袁用，竇居仁、王伯羣見大势已去，放弃銅仁，跑往上海，由王小山率所部去收拾殘局。楊德淳則以鹽硯厘局稅收充軍餉，給养問題亦暂时得到解决。袁祖銘乃于一九二二年三月順利到达貴阳，即电北京政府报捷，靳云鵬內閣遂任他为貴州省长。张彭年以总參議

名义在袁幕中策划一切。在政治方面，袁首先解散省議會(时国民党員方策当議長)，同时改組貴州省公署，以周素园为政务处长，以陈幼苏为财政厅长。为了向社会表示政权“公开”，将原来的教育、实业两厅改为委員制，聘了一些教育界和实业界人士为两会委員，各互推一人为委員长(教育行政委員會推出魏幼安为委員长，实业行政委員會推出乐伯衡为委員长，我是委員之一，并兼总务科长)。在軍事方面，升王天培为“定黔軍”第一师师长，改委彭汉章为第一混成旅旅长，吳传心(厚安)为第二混成旅旅长，其他拥戴有功之人，亦分別委为旅长、梯团长等。軍事組織既經扩大，为了筹措軍餉，袁祖銘就将原属于财政厅的筹餉局改为总司令部直轄，委楊德淳为局长。所謂筹餉局，就是专门負責征收鴉片烟稅的一个机构。貴州鴉片烟在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厉行禁烟后，原已基本上肃清。一九一八年，王文华在护国之役以后大量扩軍，財源无着，就开放烟禁，一九一九年实行抽稅，每担(一千两)收通行稅六十元。袁祖銘又将通行稅提高一倍，每担收一百二十元；复增加产場稅一道，每担抽稅八十元，共每担收二百元。估計貴州每年产烟六十万担，可抽烟稅一千二百万元，超过正稅四倍(当时貴州地方財政每年正稅收入不过三百万元)，当年只收烟稅三十万担，合銀六百万元。由于这个飲鴆止渴的“禁烟政策”，农村普遍种烟，烟商大发其財；同时，由于烟价低廉(每两在貴阳只售三角多錢)，許多劳动人民也染上烟毒。这一年(一九二二年)所产的三千多万两大烟，除毒害本省人民外，烟商們为了牟取暴利，还大量販运出省，使湘、鄂、桂、粵四省人民也遭受了毒害。不仅商人販烟，政府也大做其烟生意。一九二二年秋季，袁祖銘派何厚光率領警卫团长許开凤帶徒手兵两营运烟八万两到汉口变价，向汉阳兵工厂买步枪六千支。当时貴阳有



人作了一首題为“哀定黔軍賦得黔字”的詩，中有句云：“无乱偏戡乱，軍淮說定黔；人材龟兔驚，政策运烟盐，……”虽出于个别文人对袁之諷刺和謾罵，也可以說是代表一般羣众对他回黔以来“禁烟政策”的一种反映。

### 滇軍第二次侵黔，袁祖銘率部走川

袁祖銘投靠北洋直系軍閥取得貴州政权，在西南独树一帜以后，对广东孙中山先生既不买帐，对新闻云南重掌政权的唐繼堯更看不起。一九二二年唐繼堯电袁祖銘，希望袁拥戴他恢复滇川黔联軍总司令，貴州归其轄制。袁对唐这个要求当然不答应，由张彭年代拟一电回答，婉詞拒絕，大意說：我們对你要做“联帅”并无异議，不过目前局势与前几年不同，倘将这个名义拿出，恐要发生問題。唐繼堯接袁复电后，大不高兴。与此同时，滇軍胡国琇旅由广东回滇，事先唐繼堯曾电袁假道，并得袁同意；但胡旅經由湖南靖州到黔东黎平一带时，袁密令王天培、馬怀冲在剑河、荔波等县将胡部截击繳械。胡国琇逃到兴义，电唐申訴袁之背信。唐复派代表馬子祥到貴阳与袁交涉索还枪械，袁口头答应而久不兌現，更激起唐之憤怒。滇軍第二次侵黔，由此二事肇其因。唐繼堯为了搞垮袁祖銘，侵占貴州，遂自行恢复滇川黔联軍总司令名义，并委刘显世为副司令，派其弟唐繼虞率张汝翼、王洁修及吳学显等新招安軍送刘显世回黔复职，同时刘亦密派其姪刘敦吾回兴义原籍召集旧部准备接应。当时黔人吳子循在昆明获悉后兼程到貴阳密报，袁尚不以为意。及至是年冬季滇軍渡北盘江，越过关岭县，进逼鎮宁，袁才惊惶失措，派駐安順的彭汉章旅和张亚伯团匆匆前去抵抗，一战而潰，彭弃安順，貴阳告紧。袁祖銘始知滇軍力量不可小視，为了保

存實力，一九二三年正月十四日率軍政人員三萬余人全部向東路撤退。他向黔東退却，是想經川邊酉陽、秀山到鄂西去接收前往湖北的何厚光、許開鳳購回的六千支槍，以便充實武力，再行反攻貴陽。行到貴定，王天培主張往廣東走，去依靠孫中山先生，袁默不作答。張彭年即云：廣東滇軍楊希閔、楊池生、楊如軒三部經常派人守着廣東兵工廠，造出槍就立刻拿去，孫中山先生要想補充我們，也無能為力，還是去鄂西的好，王只得隨袁去黔西。袁經銅仁直赴四川秀山縣龍潭鎮暫住，但後來鄂西之行未成，却轉移到重慶幫助楊森打熊克武，造成長達四年之久的又一次四川軍閥混戰之局。在這次混戰中，袁祖銘起了縱橫捭闔、聯甲打乙、聯乙倒丙的主導作用，兵力擴充至十萬余人，更助長了北洋直系吳佩孚在川、黔的勢力，俟另文述之。

# 王怀庆二三事

李 綸 波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王懷慶曾以第十三師師長兼任京畿衛戍司令和步軍統領達七年之久，并博得“宣武上將軍”的稱號。我當時在十三師任參謀，現在根據記憶所及，寫出如下一些關於他的片斷，雖系一鱗半爪，但也可以看出北洋軍閥集團的腐敗氣息。

## 一、腐朽透頂的軍閥私生活

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北京東四牌樓十一條胡同有一所規模宏大的宅第，門前有四名武士，手執長矛，鵠立守衛。第中亭台池沼，山石花木，多自圓明園遷移而來。這就是王懷慶的“公館”。

王懷慶除了這所富擬王侯的宅第以外，還有四處優游休憩的花園。一處是位置在西苑的“達園”，園內山石、木材、磚瓦等亦多是由圓明園拆移而來，建造亦極幽美，有人稱之為“具體而微的頤和園”。一處在頤和園門前三十三師司令部後院，叫作“悅春園”，中植芍藥數十叢，都是從各地搜求而來的罕見的異種，盛開時，有如一團團花蝶。余如秋桂、柳桃、菊花等，也都非凡品。一處是西直門外的紫竹院，中有畫樓，三面環水，水面荷花，花中遊艇，是一個消夏的所在。一處在右安門抽分廠，是舊參將衙門的後花園。

他雖然擁有數處風景宜人的花園，可是令人難以想象，他却喜

欢经常蹲在厕所里面办公。他这个厕所而兼“宣武上将军”的办公室，是两间宽敞整洁的屋子，中间设一“大便椅”，椅下铺细净炉灰，椅前设办公桌，上陈办公文具。其属下有请示报告事宜，都须齐集厕所听候指示。他在厕所处理公事，常常持续二、三小时之久。外边有知道这样情况的，便称他为“王拉”。

在他的“公馆”和花园中，用公款养着数十名副官差役人等，其中还有来自清宫的太监。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专人趋承伺候。他去花园游玩散步时，随身副官陈二总要携衣包一个。有时一阵凉风吹过，王即两臂向后一垂，陈二立将衣服穿在他的身上。在便溺的时候，陈二便从他的身后轻轻将长衫撂起。

陈二是王怀庆最亲昵的副官，不知其名，但以陈二呼之，王的部下都称他为陈二爷。他原是王任大名镇守使时专为他剃头、修脚的人，殷勤善伺人意，颇得王欢心，日久便成了王的“红人”。王以数名空额兵餉作为陈二的工资，相当于排长的待遇。王一次一次地升迁，陈二也随着水涨船高，居然成了他左右的要人。十三师的参谋长和高级带兵官，以及其它一些归王管辖的机关人员，无不奉承这位陈二爷。有些机关的负责人为了讨好王怀庆，还每月送给陈二一份参谋的“干薪”。每逢“三节”“两寿”，官员们为王拜节祝寿的时候，王的副官处可以收到大量的“门包”，送“门包”的人，都晓得要另外单送陈二一份。

陈二的职务，是管理青年差役、两名刽子手、坐轿、坐马及轿夫、马夫，照料王的饮食起居，有时甚至连王的眠宿——如宿在“大公馆”还是“小公馆”，也受着他的控制。陈二虽然不是什么达官显宦，但他的家庭生活却非常阔绰豪华，家中用具陈设，如地毯、木器、磁器等等，多是清朝宫廷之物。当时有人把他比作曹锟的李六

(李彥青)。

王怀庆有数处“小公館”，这些“小公館”的日用都由陈二管理。陈二向軍需处支錢，只說“老头”用若干元，軍需处即如数支給，不需要任何手續，而师參謀长具領軍隊必需費用时，虽經王批示“照发”，却往往推說无錢。王的“小公館”从来密不告人，只有陈二知道。

王的部下都摸透了他的习性，如果有所希求，便到他面前跪地連叩三个头，陈訴“困苦”或“委屈”，就能取得他的欢心，說这人“誠实可靠”，應該注意提拔。他常常說这种人比軍官学生、洋学生得用，那些洋学生多有革命党思想，靠不住，因而他宁可培养营中老粗和貼身副官，使帶队伍，乃至独当一面。他对这些老粗，时常无故施以責罵或处罰，視其能否貼然接受，有无怨言，来考驗其是否“忠誠”，然后决定升迁。据說这种“不打不升”的办法，是小站練兵的一套“宝贵經驗”。如后来作过察哈尔都統的譚庆林和將軍府將軍张昆山等，就是这样提拔起来的人物。

## 二、“宣武上將軍”出征热河的“威风”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曹錕出任总統，升任王怀庆为热察綏巡閱使，原来是希望他到承德組織巡閱使署，将京畿卫戍司令社出。但是王不愿出京，一再拖延。原来是因为承德有个棒捶山，而“棒捶打磬”（磬字与庆字同音），王忌其不祥，故不愿往，只在北京成立了热察綏巡閱使署軍务处，派一中将參議駐承德联系。迨二次直奉战起，吳佩孚派王为第二軍总司令，出冷口，經朝阳，趋义县、錦州。王在京养尊处优，甚不愿往，故意迟迟其行，后因朝阳方面情况紧急，不得已，才决定出发。司令部也未組織起来，只帶了參

謀长馬履恆、參謀二人、參議數人及隨身副官差役人等。他事先特地選定了农历八月十九这个宜于出征的黃道吉日，并且選定經由德勝門出城，取其含有得勝凱旋的意思。到火車站登車時，由事先特地物色得來的一个名叫王得勝的軍官跑步向前，高聲大喊：“王得勝迎接將軍！”王即頷首微笑，登上專車，向東方進發。

車抵灤州，改為徒步行軍。時直軍因奉軍進攻朝陽甚急，正待王部馳往應援，王却毫不介意，仍按平時行軍的速度，每日按站行軍六十里，而且還要從容不迫地擺出一套行軍的儀仗。这个儀仗行列是：最前面是三十匹馬隊，其次是一乘馬軍官手舉綉着“宣武上將軍王”六个大字的大紅旗，再次是一乘馬軍官背負六支令箭，再次是一乘馬軍官背負用黃緞包裹的大印，再次是二名劊子手，背負大砍刀，再次是他的承啟副官，然後就是他自己乘坐的四人大轎，轎後緊隨他的坐馬，馬後是一羣副官差役為他攜帶着各種隨身用具，甚至連便盆都帶着隨時听用。殿後的是衛隊營和機槍小炮等特种兵部隊。這一行軍行列，綿延長達二里許，浩浩蕩蕩向前方行進。

第一日在遷安宿營，接前方急電，朝陽已被奉軍攻陷，王即嚴令堅守叶柏壽陣地，如有貽誤，以軍法論罪。次日前進，得報，叶柏壽勢將不守。王乃嚴飭守軍，叶柏壽萬一有失，決不能再退凌源，違令以軍法論罪。第四日行至刀爾登，凌源又告失守。王乃以最嚴厲的命令堅守三十家子陣地，並親臨前綫督戰，借以振作士氣。至次日黃昏，守軍又紛紛潰退，王亦倉皇抄僻靜小路向刀爾登逃走。

第十三師缺額很多，各部少則三成，多則五成，而且从不補齊。王懷慶就把它些缺額的餉項納入自己私囊，當時把這叫作“吃空額”。王懷慶總以為他的隊伍是專門拱衛京畿的部隊，而自己對內

战又向取中立态度，根本没有实际作战的打算。加以平时训练很差，军队生活腐化，不耐艰苦。特别是自出发到作战，王怀庆始终没有对官兵明确宣布为什么要打仗，并向什么地方去打，打的对象是谁。官兵就这样糊糊涂涂地开上前线，又糊糊涂涂地退下来。有的是稍与奉军接触便不支而退，有的还没有发生接触就望风而逃。

王自刀尔登后退时，知无追兵，于是又恢复了乘坐四人大轿的排场，轿后并跟随着坐马和几名副官差役，只是那绵延二里许的行军仪仗却取消了。事后方知他的卫队营和几十匹马队早已跟随行李大车先期逃进了冷口。这天晚間，王乘轿行至一小山村住宿，并命副官从轿内取出一对带官衔的大红纱灯张架在宿处门口，令过往村民皆知“宣武上将军王”在此驻节，勿得喧闹。

这时，吴佩孚令胡景翼率部应援第二军，不料胡部竟将第二军从北京招募的六百名新兵连同枪械弹药全部劫走，并将带队的团副打死，声称：“王怀庆打垮了，吴大帅命我们收编他的部队。”王得此消息，即不敢离开队伍，以免被胡景翼吃掉，并率部脱离了战场和兵站补给线，力避与胡部接触，把队伍开到白马川一带休息整顿。一日，张敬尧奉吴佩孚命来言：冷口、灤州间战况紧急，请王率部收复凌源，抄敌后路。王答以军中无衣无食，恐难再战，请速运服装给养，即率队出发。实际上王已无意再战，张敬尧去后，他即率队北行，翻山越岭，开至平泉县之八沟。热河都统米振标派张继武来迎，邀至承德，并言冯玉祥亦将至承德召开会议。王拒不前往，图绕至隆化、丰宁一带，再进据宣化，与察哈尔之谭庆林取得联系，再看形势的发展。但王至隆化后，即得到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消息，顿觉一切皆空，走投无路，便给黄郛内阁打电报请示。黄复电着王

將軍隊交米振標整編，其本人着即回京。王不聽命，仍想開往宣化。張作霖派張九卿前來，帶有鮑貴卿的信件，勸王把軍隊交奉軍改編，並請王去沈陽，王亦拒不前往。數日後，王士珍亦派員携函見王，勸其速離隊伍，回天津居住，並携有鮑貴卿函件，建議將步兵改編為兩個旅，騎、炮兵亦由奉軍的騎炮兵整編，名為奉軍，但人員仍舊，如王將來需要部隊時，由鮑貴卿、張九卿負責索還；王如不願去沈陽，可由鮑護送回天津，北京、天津的財產由奉方尽力保護。王至此，乃不復作他想，將人馬槍械清冊造齊後，即乘坐汽車出發，經凌源、朝陽到錦州乘專車去天津居住。

### 三、王懷慶維持下的北京“治安”

一九二六年四月，國民軍第一軍撤離北京，北京治安一時陷入無政府狀態，北京商會、銀行公會等團體發起組織“京師臨時治安會”，聘王士珍、趙爾巽、熊希齡等主持一切，以維地方治安，同時醞釀直奉合作，王懷慶亦參與其事。吳佩孚推薦王懷慶任京畿衛戍總司令，經奉方同意。王得治安會電，即率毅軍三旅進入北京。以前王任衛戍司令時，警察總監和憲兵司令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所有北京治安方面的權力完全掌握在他一人之手。此次再起，警察總監李達三則為張作霖所派，憲兵司令王琦又為張宗昌所派，他們只听張作霖和張宗昌的指揮，而奉軍的紀律又很壞，以致使他這個衛戍總司令對地方秩序感到難以維持。在經費方面也沒有着落，索餉的結果，同樣的支票，憲兵司令部在銀行能取現款，衛戍司令部則不能。王很氣憤，便派司令部人員到財政總長顧維鈞家里坐索現款，僵持一天，直到晚間才獲解決。

當時張學良經常在鐵獅子胡同顧維鈞家跳舞，每晚八時，即



禁止男人在这条胡同出入。李达三常于夜間派汽車送来伴舞的妇女。王对此不能过問。北京的治安情形很坏,奉軍和张宗昌的軍隊尽用的是不能兌現的奉票和直魯軍用票,誰要說不用就得挨打。前門一帶的妓院,因仗勢爭風,往往发生軍人用手枪打伤游客的事故。清室某王公的儿媳到东安市場游玩购物,被张宗昌塞进汽車搶走。王士珍为此找到王怀庆,請王立即設法营救。王当晚即去見张宗昌,和张套交情,拉关系,一直談到深夜一两点鐘。王見談得很投机,便提議要和张拜把兄弟,张亦欣然同意。于是王給卫戍司令部副官处打电话,要他們赶快僱办一份香烛紙馬送到张公館,他便和张宗昌焚香叩头,拜了把兄弟。“拜把”之后,王才漸漸把話題引到搶走妇女这件事情上来,說了很多好話,张才答应立即將人送回。自从这件事情发生后,北京很多青年妇女都有了戒心。有一次,梅兰芳为了招待外宾,在开明戏院演出“廉錦枫”,約請軍政官員陪同觀剧。张学良、张宗昌、王怀庆等都在被邀之列,同时也卖一部分客票。王去的很早,是一偏廂,中間是张学良、张宗昌的包廂。王的后側一包廂,是一家女眷,有老嫗,有中年妇女,还有少妇和青年女郎,廂外一差人伺候糖果茶水。“廉錦枫”快要開場的当口,张学良偕同张宗昌到了,并帶着一羣穿軍装大衣的青年侍卫。正当大家聚精会神欣賞这个精采剧目的时候,忽見后側包廂的那一差人走近老嫗身旁耳語,包廂中的女眷隨即一个一个悄悄地离开包廂出去了。王看到这种情况,便問他的左右說:“为什么她們都不看戏了呢?”皆笑而不答。王始恍然大悟,原来她們是怕被张宗昌搶走。

王看到北京的治安情况如此,对公事即不愿多問,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清理曹錕私产方面。曹錕自被馮玉祥拘禁,私产多已不知去

向，他为了保持小站練兵时的“道义”，要把曹錕的私产进行一次清理，同时借机把自己的私产也清理一番。他为此事特地成立了軍法处，約請了一批京、津失业軍政人員，供給飲讌和住所，希望借助这些人查对曹錕的财产。当时經查对出曹錕有一項九十万元的存款，存折已押在銀行；尚有其它财产，一时都不易清理。

在清理他自己的财产时，他的原机要課长馬光魯突然发了神經病。据說馬是王的亲戚，王倚之为腹心，委他为机要課长，凡是想要趋附王怀庆来升官发财的人，都要請托馬光魯为他們关說。王在热河战败去天津以后，馬就把王交給他的公債票、股票及貴重物品等，凡是旁人所不知道的，都給变卖处理了。王在天津居住，馬始終避不見面，王亦緘口不言。迨这次王怀庆复职消息传出，馬光魯家立即門庭若市，戶限为穿。及王到京組織司令部，他的祕书长王綉卿首先把祕书处的編制名单請王批示，第一名就是机要課长馬光魯，王在“馬光魯”三字上面划了两条黑杠。王綉卿很惊讶，追問原因，王說“他不是讀書人。”从此才透露出其中的秘密。

与此同时，王的随从副官陈二忽然釘了鐐。原来，陈二看到王已失敗下台，避居天津，他再也沒有有什么指望了，便把他經管的几处“小公館”連房带人都私自处理了。王叫他去天津，他也不理睬。王亦无如之何，隱忍了二年，并无第三人能知其事。一直到这次清理财产，他才将陈二釘鐐看押。

北京城在奉軍的控制下，秩序混乱，王感到束手无策，便以回籍省視为借口离开了北京，他在北京收編的两个步兵团遂被奉軍改編，京畿卫戍司令部亦于此时自行撤銷。

## 民初修建清室崇陵和光緒“奉安”实况

杜 如 松

公元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十月間,清朝慈禧皇太后与光緒皇帝相繼逝世后,清廷立即筹办两宮“奉安”事項。慈禧太后的陵寢在东陵菩陀峪,前后修建了十余年,她生前曾亲自到地宮看过多次,所以在她死后的第二年(一九〇九年),就“奉安”于东陵,定名为菩陀峪定东陵。光緒皇帝在梁格庄修建的崇陵,在清室退位时,基础工程尙未及半。当时已經从京汉鐵路高碑店車站起,修建了一条支路,經過涞水县、易州城,直达西陵梁格庄,光緒皇帝的梓宮即由北京用专车“奉移”至梁格庄行宮內“暫安”。当清室退位时,就一再要求民国政府代为繼續修建崇陵。南京临时政府議和代表伍廷芳及各省都督对于优待清皇室条件都主张无妨寬大,經参議院通过后,就将这一問題附加于优待清皇室条件中。一九一三年春,大总统袁世凱根据这个条件特派赵秉鈞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紹英等协商之后,立即拨款赶修。当时我充任駐守西陵的禁卫軍連长,在奉安时又是仪仗队的一員,对崇陵的修建經過和光緒皇帝“奉安”情形,由始至終完全亲眼見過,只因年代已远,不免有所遺忘。今就記憶力所及者追述在下面。

### “万年吉地”的勘定和施工組織

崇陵建設在西陵範圍內,地址在直隶易州城西偏北約四十余

里的太平峪，是一个丛山环抱、面阳背阴、約五里見方、比較平坦的山谷。据說按照清朝定例，于皇帝登极的同一天，就由特派的王大臣一員，会同欽天监前往指定建陵的地点勘定“万年吉地”。但是光緒皇帝自入承大統以后，慈禧太后从不提起为他找“万年吉地”的事，臣下也沒有一个人敢說这句话，所以一直到他死后，才由宣統皇帝下諭派溥伦、陈璧二人为勘定吉地大臣，勘定了这块“吉地”。

勘定“万年吉地”的方法是：首先根据“二十四山向”用罗盘测定一块祥瑞土地，做出标志，謂之“点穴”。在这个穴位上掘成一个磨盘大小的圓坑，謂之“破土”，圓坑名曰“金井”。然后在掘好的圓坑上复盖以斛形的木箱。据說自复盖这木箱后，就永远不許这个坑再見日月星三光，并且从此就派专人守护打扫，以待兴工。

梁格庄在易州城西約二十里左右，是京汉铁路特辟的西陵支路的終点，也是西陵的大門。在街內有泰宁鎮衙門，村外有永福寺喇嘛庙。永福寺东隔壁有皇帝謁陵駐蹕的行宮。光緒皇帝的梓宮就“暫安”于行宮的正殿內。守护的队伍，除內务府值班、綠营走筹<sup>①</sup>外，还有陆军第一鎮步队第三标，由統带宮长貴率領护送光緒皇帝梓宮从北京奉移西陵，到达后就奉命駐守西陵一带守卫梓宮。一九一三年春，該标調赴多伦，遂派禁卫軍步队第三标統带札拉芬率領所部，附宪兵一排，接替西陵守护和弹压的任务。

承建崇陵的厂号，有兴隆木厂、斌兴木厂、广丰木厂、德源木

---

① “走筹”是一种巡邏制度，由綠营（泰宁鎮总兵所轄）官兵于每晚起更后，由一人手持“头筹”两字之木牌，口喊“头筹”，率兵若干人繞行宮行走不歇，口喊亦不輟。二筹以至五筹皆如是，至五更天明始止。北京宮內由八旗护軍繞皇城墙內走筹，与此相同。

厂、广和木厂、二合公柜、三合公柜等二十余家。工程开始时,仅有架子工和壮工数百名;至工程紧张时,每日上工人数总在六千名左右,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才大致完成。

施工区设有工程处,管理一切设施运输等事宜,附设有监工、走工等组织,并由北京调来消防队一中队防备火灾。另由禁卫军设立弹压处,附设稽查班,每班由宪兵二名、禁卫军士兵十名组成,循着规定线路昼夜巡查。

### “暂安”和“暂安殿”

光绪皇帝梓宫于公元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就从北京奉移到易州梁格庄行宫内停灵,即所谓“暂安”,停灵的所在,就称为“暂安殿”(又称“芦殿”)。在暂安殿的近傍设立了王大臣六班公所,凡现任各部院的王大臣和八旗都统都要轮流值班,守护梓宫,每日朝奠(民国后专由八旗都统担任)。该公所派有禁卫军充任门卫。暂安殿门内由清内务府包衣(满语,即奴仆)旗人们负一切责任;门外由泰宁镇的绿营白昼巡逻,夜间走筹。暂安殿内非有任务不准擅入。当时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梓宫<sup>①</sup>都正在上漆。工匠们都是内务府吃钱粮的人,他们进暂安殿里面应差,叫做“进匠”。每名工匠都有腰牌一面,上打火印。进匠时首先要验明腰牌,而后搜腰,除了应用的工具外,一概不准携入,作工时另有专人监视。帝后梓宫大致相同,都是内棺外槨。内棺看不见;外槨很高(若放于平地,左右各站立一中等身材的人,彼此谁也看不见谁),平头齐尾,两侧板直。棺盖向上倾坡,于前端按一木板葫芦(用金

<sup>①</sup> 隆裕皇后于一九一三年旧历正月逝世,即于是年三月专车运送梓宫至梁格庄暂安殿,与光绪梓宫同暂安于此,后合葬于崇陵。

屬的合頁裝按于棺蓋上)，可起可落。這是滿洲式棺材，名“葫蘆材”。棺材上面的是米色（麻醬色）油漆，皇帝的棺材上面有漆繪金龙，皇后的棺材上面則為彩鳳。據內務府官員說，皇帝和皇后的棺材都上漆四十九道，每上漆一道，同時另在一塊木板上也上漆一道，作為記錄。臨到四十九道漆上完時，就根據木板斷面漆的層數厚度來檢驗質量（我曾見過這塊漆板和匠人們在棺材上漆繪的龍鳳）。

### 遺老梁鼎芬的“愚忠”

王六班除在節日特別奉奠外，每日由值班王大臣照例朝奠一次。惟有梁鼎芬長期住在王六班公所，每日必隨班朝奠，風雨無阻，並有時哭臨于梓宮前，跪地不起。梁鼎芬忠於光緒皇帝，比較清室親貴有過之而無不及，從以下幾件事實可以證明：

一、募捐栽樹：建陵工程竣工後，梁鼎芬認為陵園無樹，既不美觀，又關風水，但因在建陵的計劃中和廠號的合同上都沒有栽樹的條文，梁鼎芬雖一再要求補栽，終未被採納。於是他下定決心，想出辦法，在崇陵栽樹。他先派人往北京定購了二三百只陶瓷酒瓶，運回西陵。然後他就率領着十數人往崇陵的“寶城”上將所有的酒瓶都裝滿了潔白的雪，塞好瓶口，封上紅紙簽，上書“崇陵雪水”，再運回北京他的住所，並寫了一份公啟，說明崇陵理應栽樹的理由。隨後他就每天攜着從人，用人力車載着雪水瓶，按着道路的遠近和預定拜訪的先后，到各親貴和遺臣家一一拜訪。他到達某一府第，先投名片並送雪水一瓶為禮，隨即開門見山對主人說明崇陵理宜栽樹，勸他們拿出幾個錢來購買樹秧，並將捐啟遞予對方，寫上捐款數目。這些人所寫的捐款數如與其身分職位相稱，他就含笑而

別；否則他立刻用激烈的語氣給對方以難堪。倘若至某府第拜會未遇，他即留言于某日某時再來拜訪。真是“有志者事竟成”，梁鼎芬終于用這種辦法把崇陵栽滿了樹。這是隨同梁鼎芬到各處拜訪的便衣先兵盛泰親眼所見的事實。

二、殉葬未遂：梁鼎芬當時已年逾古稀，並且有一條腿有病，行動十分吃力。可是在光緒皇帝“暫安”期內，梁鼎芬不斷地坐棚車往施工區各處瞻視，問長問短，一般工人全認識他。他住在王六班公所，不斷有士兵去求他書寫對聯，他經常是一揮立就。在奉安之際，他在靈前執紼，自暫安殿起柩一直走到地下宮殿，由二個親隨在左右攙扶着。梓宮安了位，所有的殉葬物品都布置妥當後，恭送人員就先後退出地宮的石門，惟有梁鼎芬身軟如泥一般，坐在地上不動。人們見狀，都很驚慌。在他身旁的兩個親隨說：“梁大人曾說過到皇上奉安時他要殉葬的話。”主事人員這才令梁的親隨將梁背出地宮，派三四個人保護着，乘棚車回到梁格莊住所。隨後各親貴和各大臣等也都回梁格莊到他的住所探視，見梁的神色萬分疲倦，並且神經有些錯亂。後來梁在其親隨和家屬以及留駐西陵人員的照顧下，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養，精神雖然日漸清醒，而身體反日益衰弱。每遇好天氣，他時常令人攙扶，到梁格莊後的山麓下面田地裡溜達。有一次他在一塊地邊坐下不走，令隨從去詢問他所坐的這塊地是公產還是私產。去人打聽明白是某姓的私產，後來他就託人將該地買下，并向公方和他的家屬聲明，他死後必須將他葬埋在該地。後來他死後，他的家屬和公方就依着他的遺志，將他葬埋在這塊地裡。

除了梁鼎芬之外，趙秉鈞也葬埋在梁格莊。趙秉鈞是建築崇陵的主要人物，對修建崇陵出力不少。在動工期間他經常往來于

西陵。有一天他走到梁格庄对面一座名叫龟山的小山上，看到这座山的形势很好，“四面无缺欠，八方有关拦”，认为是一块“明堂广聚、生气勃勃”的好风水地。后来他便把山上原有的一座小庙易地重修，于庙的旧址兴建了赵氏家祠。赵秉鈞死后，就葬埋于赵氏家祠的近傍。

### 崇陵的外景

崇陵远望好象坐北朝南的一座寺院。最前面的建筑物，是一座琉璃牌坊。在牌坊左右微抬前些，各建有以下马碑。自牌坊沿着通向宫门的通路向里面走，约三百丈处有一碑亭，亭内立有“圣德神功碑”，碑面无文字<sup>①</sup>。亭东侧建有宰牲亭。宰牲亭东北约四百余丈处，为光绪皇帝的珍、瑾二妃园寝<sup>②</sup>。距碑亭约数丈，就是横跨护陵河的五孔桥。过了桥，东西两侧建有朝房。对着朝房北山墙，建有南向的值班房，上面就是崇陵宫门（隆恩门）。门内当中是饗殿（隆恩殿），左右有配殿。

隆恩殿内设有木制金漆龕，龕内供着木主神牌，前面设有桌案、供器。明堂设拜台，两旁摆着戳灯式的方柱，上系方木盘，盛着装“册宝”的木匣<sup>③</sup>。隆恩殿西侧紧挨着后墙，有一架帷以黄云缎的绣花牀帐，内放黄缎绣花枕衾和衣冠带履等物。关于这一架床，有二种说法：一说是皇帝于大婚礼时用过的吉物，一说是皇帝宾天时所用的灵床。东西配殿是皇后和贵妃的木主神牌。

---

① 此碑文例由嗣皇帝亲自撰书，因清室已退位，故崇陵此碑有碑无文。

② 帝、后墓称陵寝，嫔妃墓称园寝。

③ 册文系檀香木木简，上写满汉文，连缀在一起，作折叠形；宝亦用檀香木制（帝后之宝，生前用玉，死后用木），满汉篆文，方形。



在隆恩殿后方,宝城的前面,建有明楼,上有石碑,上刻“德宗景皇帝崇陵”,有梯可以上下。楼下有甕圈式的門通哑叭院(即地宮的外口),上面就是宝城。对着明楼的門,建有黄琉璃影壁一座,堵着地宮外口。影壁左右,各建有阶梯,俗謂“馬道”,专为攀登宝城之用。宝城的底下即地下宮殿。

### 地下宮殿的建筑

地下宮殿是整个陵寢的主要部分,也是全部工程的中心。修陵的步驟,是先搭棚后动工。开工之前,就以万年吉地的“金井坑”(即当初所点之穴)为中心,支搭一座高十三丈、圓径六十丈的大圓席棚。据說先搭棚后动工,是为了掩蔽日月星三光的照射;也有人說是为了防备空中飞鳥的遺矢。搭好了棚之后,仍以金井坑为中心,开始在棚下掘地除土,深达三丈有余,然后鋪墊三合土(粘土、沙土、白灰),分层用夯打固二丈,下余丈余砌鋪粗渣石。基础完工后,就开始建筑直径六丈的地下宮殿。

地下宮殿是根据旧成法和一定的方式,用預制的凿磨細致的汉白玉石块,选用技术最高的工人,在走工人員(技师)指揮监督下砌成的。地下宮砌好后,就分为内外两部分施工。外部工程是先在汉白玉石外面砌以粗渣石,再在粗渣石外面用大砖砌成如普通城牆样式的大圓丘(即所謂的“宝城”),并砌出高丈許的垛口。在各垛口下脚都留有向城下流水的沟眼。宝城上面鋪墊約三丈厚的二合土(粘土、沙土),除了用夯打固外,特別选用百数名小儿登城踴踏,每日早晚二次,每次二小时,一共五日,名之曰“童子夯”。后来經梁鼎芬在宝城上栽滿了梧桐和翠柏。这是地下宮上面宝城的概况。

地宮內部設備分述于下：

一、“石竈”和“石牀”：地宮內部直徑六丈，在後緣建有二丈寬的漢白玉石竈，下面是石牀。在石牀的當中，有凿透成軛轆錢形狀的一塊大方石覆蓋着“金井”（即當初所點之穴），直通地中，以交流生氣。

二、“龍鬚溝”：在石牀上面兩前角上，各開一個二寸見方的石孔，直通牀前下角的孔口。據說是為了預防万一地內有水從石牀上軛轆錢涌出來的時候，就可以從牀角上孔道流下石牀，不致妨及牀上的梓宮。自牀下的孔口起，沿着地宮兩側，又凿有由高漸低的小淺溝各一道，順着地宮隧道直至護陵河。這二道干溝，名“龍鬚溝”。

三、石門：地下宮有一道石門，隧道有三道石門，構造形式和關閉的方法皆相同。每道門都是二扇，用銅包裹門樞，按在銅制的坎上。在門坎的平行綫內面漢白玉石鋪成的地上，緊挨着石門下角里面，凿有兩個約有半個西瓜大小的石坑；對着這兩個石坑里边約二尺之地面上，也凿有兩個淺坑（僅是兩個凹沓），並在這深淺坑中間凿出一道內高外低的淺溝。另外每扇石門都預制好西瓜大小的石球一個，放于石門里面的淺坑上。當奉安禮成、關閉石門的時候，二扇門並不合縫，中間離有三寸許空隙。然後用長柄鉤從石門縫伸進石門，將淺坑里的石球向外鉤拉，這石球就沿着已凿好了小溝滾進了門邊的深坑，合了槽，恰好頂住了石門。從此，除非設法破壞，這石門就不能打開了。

修建崇陵的同時，在崇陵的東側一小山谷內，另建有光緒皇帝的珍妃和瑾妃園寢。這兩座園寢在地面上僅建有綠琉璃瓦亭和宮門、饗殿；在地下雖也建築了洞穴，但在地上不建寶城，而各建直徑

丈二的紅色坟墓(即坟头)，前面設有石桌、供器和拜台，四面围砌紅牆，和我們在京郊所常見的公主坟、皇姑坟类似。皇后的陵寢，与貴妃的園寢就不同了。后陵与帝陵相似而有逊色，最显著的标志是：帝陵的宮殿是黃琉璃瓦，后陵是綠琉璃瓦。后陵地宮上面也建有宝城。惟在东陵的慈禧皇太后陵寢宮殿的建筑也用的是黃琉璃瓦，其建筑質量都高于光緒皇帝的崇陵，非常坚固。

### “奉安”的准备事項

一、修筑道路：修理奉安經行的“御路”，除了平高垫低，修桥掘渠之外，还要鋪垫黃土；并組織护路工队，担任随时修补和保管的責任。

二、演习皇槨：为保証奉安时梓宮安全起見，照例要演习皇槨数次。为了練習嫻熟而免临时差錯，光緒皇帝的槨，是用的所謂“独龙槨”。独龙槨是用一根前按龙头、后箝龙尾的大槨为軸心，并用加倍法以一百二十八人組成的大槨。槨外裝置葫芦金頂、黃緞綉金龙の棺罩，罩頂上系有二条絨繩，披于前后兩側，有夫四名各牽一头。棺罩兩側各有十二名槨夫，各举拨旗(紅漆竹杆，上挑尺二見方黃旗)。棺材前面有两个身穿孝衣、头戴去纓秋帽的人手敲响尺(系約二尺长和一尺长的木尺各一根，用繩相連，用小尺敲大尺)，以引导皇槨的行进。抬槨員工都是包衣旗人，一律身穿紫色团花麻駕衣、黃手套、黃靴罩、土黃套褲，头戴盆式的黑毡帽，上按朝天黃鵝翎。演习皇槨时，是在皇槨上面放棺材的位置摆上一桌一椅，桌上放一平盃水，并派一員官坐于椅上監視着这水盃。起槨后，任行多远，必須保証不搖不顫，不訖水盃傾斜、蕩动，不使水溢出盃外，以維皇槨的平穩。

三、設置臨時運靈車：自地宮外口至地宮石牀上，特仿輕便鐵路式樣，鋪就木制閉槽軌道（用鐵道枕木鑿出縱長的槽），在軌道槽上鋪以綿毯，上面置一硬膠皮輪的平車，車上鋪以棕毯，以備放置梓宮。

### “泰安”實況

各事準備就緒，即行奉移。辭靈致奠后，先用六十四人槓（小請）將梓宮抬至行宮前大道上，換升大槓（一百二十八人獨龍槓）。這時輻輳輅仗、亭傘旌旛等全副鑾駕，已由鑾輿衛（鑾儀衛）準備整齊，待命發動。除了太寧鎮綠營馬隊在最先頭開道，并有一部禁衛軍及先兵沿路警戒外，在鑾輿衛所屬的鑾駕範圍內，最前是三十二人抬着紅漆四方木架，中間裝置一根紅漆旗杆，上面掛着一面直幅下垂、黃帛金龙、紅火焰、上系銅鈴的一架旛杆（官文書稱作丹旛）。在旛杆後面，有木制采漆的斧鉞鏹棍、熊虎常旗。其后是一班滿洲執事，持大門纛一對、小旂旒八根，形式相同，俱用紅漆杆挑着直幅黃帛、金龙、紅邊的“驅路”（滿語，譯音）。驅路与旛杆相似，只是無鈴成對。其次是大轎和小轎。小轎無帷，僅是一張大椅，上鋪豹皮。隨後是采綢紮的影亭，跟着一柄黃緞綉花傘。下面是金鼓重樂器和笙管笛簫輕樂器各一班。再次有身穿孝衣的二排人，手托着木盤，盤內放着檀香爐，燃着檀香，分左右二班，一面走一面用有節奏的調子接連不斷地發出舉哀的聲音，俗稱“呼小吶”。另有一班身穿孝衣的人沿路向天空和路上撒紙錢，從起槓起，隨走隨撒，直到落槓為止，把所經的道路上都鋪得滿滿的（我尚記得當時有三輛棚車滿載紙錢，在道傍隨行，到了宮門尚余半車）。隨後就是由禁衛軍步隊第三標統帶扎拉芬率領營連長和第一連官兵所組成的儀仗

队，官长抱刀，士兵荷枪上刺刀。在队伍后面便是和尚、道士、尼姑、道姑、喇嘛的行列。他们都穿着各本教的法衣，手执法器，不断地吹奏念经。喇嘛的降经方式和法器都有些特殊。“格司贵”（达喇嘛）身穿黄布袍子、白布褂子，斜披着紫色“哈达”，足登青靴，头戴挑顶黄秋帽，手托木盘，盘内放着用莜麦（他们呼为“巴拉麦”）捏成的灯和塔，灯还燃着。“得木奇”（二喇嘛）的衣帽与达喇嘛一样，手执法器铜铃。其余各喇嘛都穿着黄布袍子，斜披着紫色布代哈达，青靴子，戴着去掉帽结子的黄秋帽。喇嘛组的前引是一对两丈有余的大铜号（他们呼作“元筒”）。每支号前面有一人用黄绒绳提着，后边有一个人吹奏。二支号轮流吹奏，一起一落，声音极响。跟着是插把鼓二对，每个鼓用一人荷负，一人敲打。此外有手摇的“人皮鼓”、人骨制成的“金口角”等项蒙藏轻重乐器。再后面就是执紼恭送的王大臣们了。王大臣等一律穿着青布袍褂、青布靴子，戴着去掉顶翎的秋帽（因为皇帝宾天已过三周年，故不着缟素）。这是槨前的大致情形。在槨后尚有一小部分行列。紧随槨后有一班人，全身行猎装束，穿着灰布袍子、黄坎肩红边、青靴子，头戴秋帽，上缀豹皮叉尾，骑着马，手执矛，挂着刀，名叫“后扈”。其后便是隆裕皇后的影亭、凤辇（轿式的车）和九十六人槨。在皇后大槨后面，还有些车辆和备差员工人等。

到了吉时，烧了纸，撒了纸钱以后，即起槨。经过半碑店，进了“口字门”（在整个西陵区域四面围有围墙，名“风水墙”；这里所说的口字门是指风水墙东面的门，即东口字门；西口字门在紫荆关关外，属广昌界），直达崇陵的牌楼门。随即换了六十四人槨，抬至地宫外口，安放于特备车上，施以保险设备，左右有护卫人员，前后有槨夫牵引着黄绒绳，打响尺的一前一后，前敲后应，徐徐将灵车升

堂入殿，移上了石牀。后由欽天監指揮樁夫將梓宮按着山向，奉安于石牀中央的“金井”上面。随后也同样將隆裕皇后的梓宮奉安于皇帝梓宮左傍齊頭微低一些的位置。合了葬，奉安禮成，即布置殉葬事宜。殉葬物品除石桌、供器、万年灯（是用两口大缸裝滿了植物油，复以蓋，上面正中置一灯台，系以灯捻，直通缸內，临时燃着）、册宝之外，其余大半是生前用过的衣被和心爱的文玩、金銀器皿，以及佛經、香料、金玉等貴重鎮压品。布置妥当后，恭送人員先后退出地宮，前去朝房更換吉服（頂翎齊备的朝衣朝帽）。在这时候，有專人關閉石門（就是用鉄鈎子从門縫將石球由淺坑鈎入深坑中，頂上石門）。四道石門都關閉后，就由事先派定的瓦工拾砌哑叭院的琉璃影壁，堵絕地宮門的外口。王大臣等在朝房休息片刻，即齊集于隆恩殿虞祭，由鴻臚哈番（滿語，官員）贊禮，行三跪九叩首禮；禮成后退出，仍回朝房更換便服。除有尚未完成任务的少數人員外，其餘人員都回梁格庄乘專車返京。

## 南昌教案見聞\*

王 邁 常

南昌縣知縣江云卿，名召棠，江寧人，在江西州縣中頗負時名。歷任繁劇，辦理教案尚能力持正義。顧教士教民之不法者以不得為所欲為，切齒于江知縣者眾矣，不僅法國教士王安之一人而已也。而王安之為尤甚。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二月間某日傍晚，合城喧傳南昌江知縣被教士王安之殺死于某處法國教堂之密室。凶訊四布，道路洶洶，蓋民眾義憤之氣一發而不可復止矣。沈寐叟（曾植）師時為南昌鹽法道，亟遣人前往南昌縣署探听真實狀況，已亦往謁胡撫台與各司道商量一切，并往縣署視召棠之傷。寐師本任南昌府，是召棠直接長官，宜其格外關懷也。先是，王安之為某處教案，屢有非分之請求與無理之要挾，江置之不睬；又屢次邀宴，江亦不赴。王安之蓄恨已久，而無可如何。不知此日何以江召棠竟身入虎穴矣。據說此日并邀新建知縣某人，某飾辭謝絕不去。江抵教堂時訊知新建知縣已謝絕不來，明知凶多吉少，初不料王安之竟動手殺人也。

---

\* 本刊第九輯王芸生、曹谷冰所撰《英釁之時代的舊大公报》一文內，曾提到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一事。此篇是作者當時的親身見聞，文內所說江召棠系被迫自盡一點為其他資料所未見。關於本案詳細經過，《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六年第一期載有《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資料輯錄》，可供參考。

第一日所得之消息如此。

第二日，清晨有小雨。余刚下床盥洗間，仆人来告：某处教堂被焚，某某教士被杀。少頃，署外友人，特来告訴，某处天主堂被劫，教士被毆受重伤，某女教士被击毙于某某桥头，……大抵是日自晨至暮，耳所聞者不外外国教士被杀之訊，約略計之，似有二三十人之多。或云王安之逃往城外，亦已被击毙于某教民之家。至江知县之伤势如何，生命有无危险，似已无人提及。余本局外人，不便多所聞訊。

第三日矣。府县差役拿到杀人凶手不下百数十人，枷鎖鐐鑼，牽連入獄。所有拏获之杀人嫌疑犯，一律发交南昌府审明具报。其时署南昌为徐性臣，名嘉禾，徐菊人世昌之胞叔，奉到上官命令，即召集发审局各委員在府署坐堂分別审問。于是問官怒叱声，犯人口冤声，板子劈拍声，声声不絕，而通宵彻夜不得宁靜矣。已經數度审問者尙未定案，而陸續被获之犯紛紛不絕而来。

至第四日，聞传法国兵艦数艘已开进鄱阳湖矣，省会各城門已紧閉不許擅自出入矣。人情洶洶，又是一番景象。候补官員之眷屬，有暗中迁居外县者。城内百物涨价，农产物尤居奇貨。最可笑者，洗澡堂亦涨价，托詞城外取水不易也。是日聞清廷特派外务部侍郎梁敦彥，会同法国使館参贊端貴刻日到江西查办此案。电旨到，而巡撫以下諸官不免有些棘手，以外国人死了許多，凶手尙得不到主名，江召棠之伤势反日有起色，似此情况，“何以对朝廷，又何以对外人”。

自是以后，奉旨来贛查办法教士杀江案之欽差大臣外务部侍郎梁敦彥与法使館之参贊端貴两人之行踪日逼日近，而江召棠喉間刀伤亦日逼日重矣。果也，梁、端两人行抵九江之电訊到南昌，



而南昌知县江召棠因伤身故之訃告亦传遍江城内外矣。哀哉！江大令之死也。

有人曰：召棠喉间受王安之刀割，伤势严重，屡濒于危，以医治得法，创伤渐平，原可不死。乃以王安之之死以及其他外国人之死，而江召棠遂以吞金死传闻于道路之间矣。

此案结果，杀若干人，长监若干人，释放若干人，赔款抚恤若干万两。官吏之获严谴者署按察使余肇康革职，巡抚胡廷幹开缺。署南昌知府徐嘉禾以到任未滿三个月，照例免予追究。

教案发生时，余适应寐叟师之邀，寄居南昌为南洋译书局译述东文书籍，曾亲见发审局酷吏审讯教案嫌疑诸犯之种种苦痛，种种经过，种种冤枉，故得以洞悉此案之内容如上。

## 毅軍沿革談

黃曾元

我从前在河北和甘肃久为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幕僚，于学忠是由毅軍出身，閑来的时候，时常喜欢談談毅軍的掌故，我听之既久，是以对于毅軍沿革也知道了很多。就是他久所統率的陸軍第五十一軍（国民党政府中央陸軍番号），探本索源，也可以說是毅軍旧部，現在把它写出来，以供后之編史者参考。

毅軍始創于宋庆。宋庆是山东蓬莱人，前清同治初元在安徽省亳州做練长。那时捻軍声势很盛，这些地方軍隊的任务都是在那里防捻。宋庆最初統带的是捻軍投降的孙之友的部众，宋庆把它号为奇胜营。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唐訓方做安徽巡撫，裁撤临淮軍，又将三个营拨归宋庆統带，于是成立毅軍。所以叫做毅軍者，是因为宋庆在这个时候已积功升至总兵，賜号毅勇巴图魯，所以取勇号第一字作为軍号。毅軍起初在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与捻軍作战，至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西北回民起事，清廷命宋庆带兵从左宗棠西征，于是毅軍又轉战关隴，約有数年。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因崇厚与俄国擅訂伊犁条約一事，风传俄国将派兵来华。时清廷正在筹議成立海軍，建筑旅順軍港，不能不調重兵駐扎陆路，所以又調宋庆統带毅軍防守旅順。先是，宋庆于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已自西北回师，但所部馬玉昆仍然留在西北。这时，宋

庆已屡著战功，补授了湖南提督，其后又调补了四川提督，然而都没有到任，还是统带着毅军。

宋庆驻防旅顺十余年，军容很盛，醇王奕譞到旅顺阅兵，曾格外夸奖，于是得清廷信任。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战起，宋庆出发东边九连城，所部姜桂题留守旅顺。那时，中国大军云集朝鲜平壤，诸军总统起先是北洋淮军的叶志超，后来战败，叶志超逃回国境，清廷将他革职，命宋庆代为诸军总统，但也是屡战不利。后来清廷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并命宋庆、吴大澂帮办军务。

此时宋庆部将马玉昆已早由西北调回直隶，日朝构衅，统毅军赴防平壤。叶志超既败，马玉昆后来也退回国境，至是又与宋庆军在一起作战。

中日和议成，北洋整顿军旅，大裁冗兵，仍留豫军三十营归宋庆统带（北洋亦称毅军为豫军，因毅军向由河南协餉）。此后宋庆先驻奉天锦州，光绪二十四年移守山海关。

此外，尚有张曜所统之嵩武军旧部，也在豫军之内。咸丰、同治年间张曜在河南与捻军交战，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成立嵩武军。那时宋庆统毅军，两人交谊至厚，往往并肩作战，宋庆曾以蒋东才、李承先两部拨归张曜。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张曜与宋庆同时被命随左宗棠西征，张曜从此引军在西北作战，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始调回直隶，先率所部治都城河道，后来奉命为山东巡抚，带兵赴任。张曜很注重治河，嵩武军一部改为河防营。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张曜逝于山东巡抚任所，清廷命将所部嵩武军归李鸿章节制调遣，此军遂属北洋，中间虽有变革，但总的说来，还是编在豫军之内。

戊戌后荣祿奏設武卫軍，以聶士成駐芦台为前軍，董福祥駐薊州为后軍，宋庆駐山海关为左軍，袁世凱駐小站为右軍，自將中軍駐南苑，于是毅軍改称武卫左軍。庚子后，依辛丑条約，山海关已不能駐軍，武卫左軍遂全部移駐通州。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宋庆逝世，清廷任馬玉昆总統武卫左軍，但其中有老毅軍八营則撥归姜桂題統率。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八国联軍入侵，馬玉昆統武卫左軍御于天津北仓等处，終以无援后退，后米履駕西幸。宋庆既逝，馬遂接統全軍。此时武卫左軍共四十营有半，內炮兵两营，騎兵三营，余皆步兵。步兵每营五百人，騎兵每营二百五十騎，炮兵每营約三百人，此为毅軍人数最多时代。其时軍餉仍半由豫省协餉。这时馬玉昆早已补授了直隶提督。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日俄战起，清廷很怕战事会展至长城一带，震惊內地，于是將武卫左軍調扎热河，以資戒备。馬玉昆亲駐热境平泉，防綫起喜峯口直至阜新，事定后又回通州原防。

光緒三十一、二年（一九〇四、〇五年）間，并曾調武卫左軍十营由統領陈希义、赵倜、馬廉溥（玉昆之子）統率赴黑龙江呼兰、綏化、巴彥一带协剿蒙古陶什陶之乱，在黑龙江駐扎年余，始回通州原防。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馬玉昆逝世，清廷以姜桂題为武卫左軍总統。姜桂題本宋庆部將，甲午宋庆赴防九連城，以姜桂題留守旅順，旅順不久失守，姜桂題被革职。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袁世凱練新建陸軍于小站，以姜桂題宿將，任为翼长，自是求武卫右軍。袁世凱后来做了山东巡撫，姜桂題亦調駐山东。辛丑和約簽訂后，慈禧太后与德宗將回京，李鴻章囑袁世凱派姜桂題率兵

赴河南彈壓地面，迎接車駕。自后姜桂題所部遂入卫京师。宋庆既逝，老毅軍八營即撥歸姜桂題統率。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改兵制，姜桂題先為北洋左翼翼長，未几奉命辦長江防務，駐浦口，于是率老毅軍八營赴防，擴充為江防軍二十營。馬玉崑既逝，姜桂題代統武卫左軍，北來接事，所帶江防毅軍則由后任總統江防各軍之提督張勳接統。

辛亥革命前后，武卫左軍又改稱毅軍，因武卫各軍名稱已久有变革，不复存在，独此軍尚沿旧稱，于是仍改為毅軍。其分撥調動情形如次：（1）宣統間趙倜帶十營前往河南，入民國，在剿辦白狼之后，改編為宏威軍。（2）民國初元，熊希齡為熱河都統，那時毅軍部將米振標已率部約三千人駐扎熱河。（3）姜桂題代熊希齡為熱河都統，毅軍主力遂進駐熱河。（4）一部分毅軍仍駐京拱卫，蓋自辛丑后，毅軍即久任宿卫。入民國，袁世凱為大總統，公府宿卫，仍任毅軍，以所部都老成宿將，不致別生反側，袁世凱認為可恃。（5）選拔軍官多名撥與皖督倪嗣冲，編為安武軍軍官。清季倪嗣冲曾以道員總辦毅軍營務處，蓋亦與毅軍夙有關係者。（6）張勳既代姜桂題總統江防各軍駐浦口，于是接統姜桂題所帶之江防毅軍。鼎革之際，張勳既失南京，所部退集徐淮，袁世凱旋授張勳長江巡閱使、定武上將軍，于是張勳所部稱定武軍，江防毅軍亦一并改編在內。其不及北撤、改歸南軍者，只趙榮華所統三營而已。張勳旧曾為宋庆巡捕，蓋亦為毅軍部屬。（7）張勳之定武軍分為八路。張勳發動復辟時，調兩路十營北來。統領殷恭先、梁可法本皆毅軍旧人，事敗后此兩路十營統為毅軍收編，調往熱河。其在南方之六路三十營，則統為倪嗣冲之安武軍收編。

毅軍名將宋庆、馬玉崑、姜桂題，清季皆加太子少保。三宮保

声名，近畿一帶，婦孺皆知。此外馬三元（玉昆弟，世傳馬三元即玉昆者誤）、郭振邦、程允和，皆驍勇善戰；后之趙倜、趙榮華、米振標等，亦皆有名于時。

甲午中日戰起，張作霖時為宋慶所部末弁，并曾為馬玉昆軍醫，后来毅軍將領，其時多在偏裨，故亦多與相習。如趙倜既失河南督軍，往依張作霖為參議，即其一例。

毅軍服裝，士兵皆衣藍布軍服，自清季已如此，與各鎮（后改師）之用灰布軍服者異。入民國，姜桂題之毅軍、趙倜之宏威軍、張勳之定武軍、倪嗣冲之安武軍，服裝俱相同，要皆取法于毅軍。惟張勳所部獨尚垂發辮。

再談毅軍兵器：毅軍在甲午之前所用者皆鳥槍、抬槍、刀矛、藤牌之屬旧式武器，炮則旧式銅火炮；甲午前后，一部分已易以鐵板開司槍（獨子鉛彈頭），并置有火門鐵鋼炮；其后則完全改用鐵板開司槍。庚子前后，宋慶以頻年軍餉節余購德國曼利夏快槍（五子鋼彈），為全軍易用；炮兵兩營，則置有克魯森八生的口徑炮多門。既入民國，全軍又改用套筒七九步槍。

一九二一年，姜桂題逝世，毅軍由米振標接統（入民國，姜桂題、米振標皆稱毅軍軍統）。米振標久駐熱河，前后歷林西鎮守使、幫辦熱河軍務、熱河都統各職。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授米振標幫辦河南軍務，遂率毅軍駐河南。至一九二七年，南北諸軍紛集在河南境內，各謀擴展。時毅軍暮氣已深，雜以烏合，米振標亦老邁，所部有變附他軍者，有不戰而潰者，有束手被人解決者，數十年勁旅至是消滅。

辛亥江寧之役，江防毅軍中趙榮華所統三營不及北撤，遂屬于南軍林述慶；繼調湖北，屬于黎天才，編為鄂軍第一師之一團，后擴

充为第十八混成旅，赵荣华、于学忠相继为旅长。

于学忠亦山东蓬莱籍，其父于文孚久隶毅军任管带，光绪间随宋庆驻防旅顺。光绪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年）于学忠生于旅顺。后毅军移防通州，设武卫左军随营学堂，以培养将弁。于学忠年十八入堂肄业，习步科，毕业后，历任排连长，米振标为林西镇守使时，任为副官长。一九一八年，赵荣华在湖北编第十八混成旅，成立炮营，电召于任营长。于学忠既至湖北，历营、团长，后竟代赵荣华任第十八混成旅旅长。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深加倚重，晋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二十六师者本为曹錕弟曹錕所统帅番号，至是以与于学忠。不久又授为长江上游副司令，再晋陆军第九军军长。一九二六年，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直军既溃，吴佩孚入川，余部完整者只于学忠一军。张作霖少隶毅军，既与于学忠父有旧，又知其所部精强，遂以奉直合作之谊招其隶东北。初为东北陆军第二十军军长，热河失陷，张学良下野后，又改为陆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其所部原由清季之江防毅军历经姜桂题、张勳统带者递接扩展而成，是以即谓之为毅军旧部，亦无可。毅军既消灭，薪尽火传，仅此一部，烟云变灭，今都成往事矣。

## 关于南苑航空学校的資料

### 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吴 承 禧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次年袁世凱繼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聘請駐北京的法国公使館武官白里索为总统府顧問。白里索向袁世凱建議購置飞机，开办航空学校，訓練飛行人員，作为編制空軍的基础。袁很同意，將建議书批交參謀本部办理。參謀总长黎元洪、次长陈宦命主办的第四局局长姚仲伊，向白里索所介紹的法国欧亚公司經理布瓦克索，訂购了法国哥德隆式飞机十二架，其中一架是水上飞机，并聘用了法国陸軍中尉飛行員蓬、駕駛員欧白勒、机械員馬耳帝内世、机身員包发，来中国担任教練飛行和建筑飞机場、倉庫、机器厂和校舍等。參謀本部决定在南苑設立航空学校和建筑飞机場，乃于一九一三年派秦国鏞为航空学校校长，吳承禧为航空学校机器厂厂长兼无綫电教习，潘世忠、厉汝燕为飛行教官，赵干臣、刘万齡为繙譯兼战术教官，招收陸軍师范学堂毕业生胡文彬、刘既长等六十余人為學員，練習飛行，并調拨上海制造局各种机器匠来机器厂工作。一九一四年派姚錫九、鮑丙辰为飛行教官。此后該校曾奉命組織航空队，轰炸豫西的白狼和湖南的反政府部队。一九二〇年国务院派丁錦为航空事务处处长，接管參謀



本部所轄的航空學校。該處直屬國務院，設有訓育、機械、編查、經理等科，並派吳承禧為訓育科科長，房汝燕為機械科科長，王鐸為航空學校校長，潘世忠為該校機器廠廠長。直皖戰爭後，航空事務處擴大為航空署，處內各科擴改為廳，署長初為丁錦，以後由潘矩楹、趙玉珂先後繼任。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戰爭，直軍失敗後，航空署和航空學校均被奉軍張作霖取消。

## 南苑航空學校

杜裕源

### 一、南苑航空學校的創辦及其教育概況

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凱採納軍事顧問白理蘇（法國人）的建議，決定創辦航空學校，為建設空軍造就人才。當時由財政部撥款二十七萬元，交由法國人博樂赴法聘請了行政官和修理飛機的技師、技士，並購買教練飛機和航空備用器材。同時參謀本部亦領到專款六萬元，在北京南苑的營房以南，練兵操場以西，建築航空學校一所，包括用房百餘間，停機棚廠和修理飛機的工廠各一座，並將原來練兵的操場加以擴修，作為練習飛行的起落場。同時，參謀本部第四局負責草擬了航空學校的一切制度規章。夏末，博樂由法返華，購到法國“高得隆”式的教練機十二架，其中四十四匹、五十四匹、八十匹馬力的飛機各四架，還購到修理飛機的一切器械和材料；並聘請法國上尉軍官博翁為飛行教官，歐白爾為技師，馬爾底碼斯為技士。不久校舍完工，飛機裝好，規模粗具。經參謀本部委派秦國鏞為航空學校校長，玉鶚為教育長，隨即招考學員，于秋末開學授

課。

航空學校的學員，系由當時陸、海軍各機關部隊中的現役軍官、軍佐選拔而來。先由原機關部隊按照規定的資格選拔保送，繼由航空學校進行身體檢查，必須五臟健強，毫無宿疾，身長、體重適度；檢查目力，更加嚴格，不但遠視、近視不行，色盲尤為所忌。檢查合格的，方准參加學科考試。必須體格、學科考試都能合格，方予錄取，否則仍送回原機關、部隊服務。學員的官階，以中尉至少校為限，年齡限于二十五歲至三十歲。學習期間仍支原薪，學校另給津貼十元，被服、伙食和醫藥，統由公給。

學校的課程，分學科、術科兩門。術科以練習飛行為主，拆卸發動機、幫助修理飛機為副。學科以航空學、機器學、氣象學為主，陸海軍戰術、戰史、外國語和體格鍛煉為副。學員學習的時期為二年。第一學年，學習初級飛行，其程度以能在飛行場安全起落，並能在空中旋轉自如為合格。第二學年，學習高級飛行，其程度以能按照方向儀規定的方向和指定的地點作長途飛行為主。當時航校長途飛行，系由南苑起飛至保定降落加油，再起飛至馬廠，最後由馬廠加油起飛回南苑，是為三角飛行；如能沿途無誤，安全降落，即算合格。

當時飛機為新鮮器物，初到中國，還沒有會裝配、修護的員工。為了創辦航空學校，曾由德州、禹縣各兵工廠和南口火車修配廠挑選最優秀的鐵工、木工各數十名前來北京，經過法國技師和技士的指導訓練後，擔任對教練飛機的裝配和修護工作。

## 二、南苑航空學校改隸和改組的經過

南苑航空學校原隸屬於參謀本部。第一期學員于一九一五年

秋季毕业后，因政府无力建设空军，学员亦无处分发，乃临时规定：凡自愿留校候差者，准予留校，待遇仍旧；不愿留校而自愿谋职业者听便；愿回原机关、部队任职者，由参谋本部咨送原机关、部队录用。在这苟延残喘的情况下，参谋本部在六年期间造就了两期学员，此外别无成就。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成尾声，英国推销战时剩余飞机。北京政府得与英商费克斯公司订立一百八十万英镑的航空借款，以五十万英镑存储银行，作为办理航空行政经费，以一百三十万英镑购置飞机、航空器材和航空工厂应用的器械。并于是年冬成立航空事务处，以丁锦为处长，直隶于国务院，专司航空一切行政事务。一九二〇年春，政府即将参谋本部所主办的南苑航空学校划归航空处管辖，改组为航空教练所。该所的编制，除将校长改称所长，并将航校附属的修理工厂划出，另成立清河航空工厂外，其他与前航校编制大体相同。以王鶚为所长，姚锡九为教育长，招生八十余名，开始训练。该期教练飞机，为英造百匹马力“爱佛楼”式，聘请英国教官数人和英国技师、技士多人，负责教练和办理飞机修护事务。

是时航空事务处的政治背景为皖系，而皖系又暗分为两派，即靳云鹏派和徐树錚派。丁锦是靳的心腹人物，在直皖战起，皖系失败后，靳云鹏背叛段祺瑞，依附直、奉两系，并由于总统徐世昌的支持，得任国务总理，因而丁锦乃得主持航空事务处，并于一九二一年春将航空事务处扩大为航空署。嗣后，直鲁豫巡阅使曹錕想在保定自办航空，正值丁锦在航空署因用人行政有失公正，与航空人员发生冲突，引起风潮，因而曹錕借此机会，怂恿徐、靳将丁锦免职，并推荐其参谋长潘矩楹为航空署署长。从此，以皖系势力为背

景的中央航空，就轉移到以直系勢力為背景的中央航空了。

一九二三年曹錕任大總統時，特派趙玉珂為航空署督辦。將南苑航空教練所改組為國立北京南苑航空學校，以趙雲鵬為校長，蔣達為教育長。在此次航空教練所改組以前，第三期學員已經畢業，新航校又續招第四期學員，於秋間開學訓練，於一九二五年冬季卒業。計在航空教練所時期，五易所長，首任王鶚，次厲汝燕，次鮑丙辰，又次沈觀宸，最後為周家澍；三易教育長，首任姚錫九，次王季子，最後為蔣達。在航校四期當中，四易校長，首任趙雲鵬，次金世中，再次曹寶清，最後金世中；兩易教育長，首任蔣達，次則為金巨堂。航校第四期所使用的教練機亦為英造百匹馬力“愛佛樓”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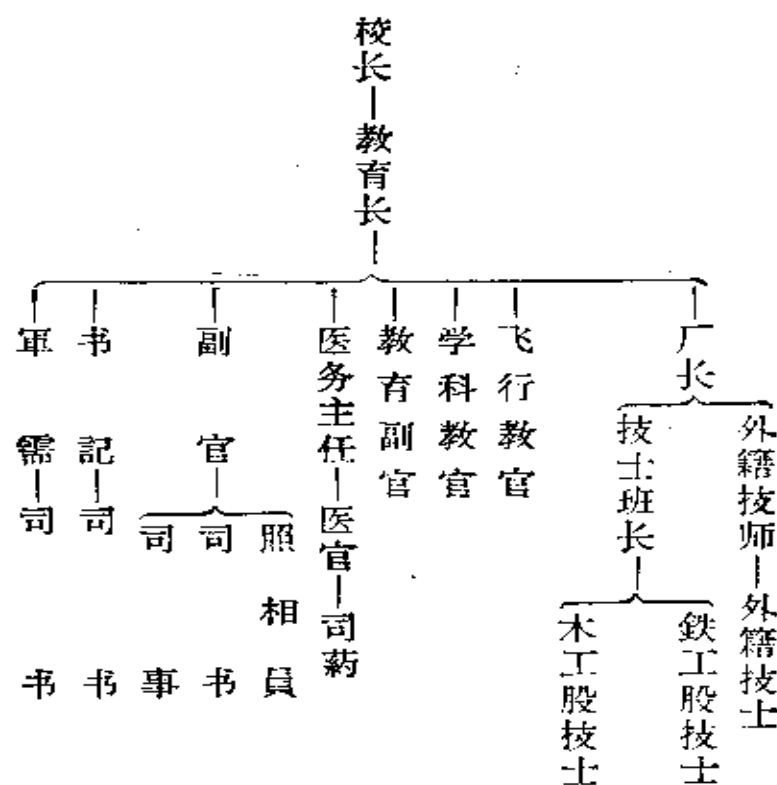
### 三、南苑航空學校的結束和各期畢業學員的就業情況

一九二八年春張作霖任大元帥時，將航空署撤銷，另成立航空司，隸屬於軍事部，同時南苑航空學校亦告結束。總計南苑航空學校有十五年的歷史，由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的十二年當中，共訓練了四期學員。第一期畢業者為四十一人，二期畢業者為四十二人，三期畢業者為三十九人，四期畢業者為三十六人，共計一百五十八人。這四期中，在參謀本部隸屬的航空學校畢業者二期，航空事務處隸屬的航空教練所畢業者一期，航空署隸屬的國立北京南苑航空學校畢業者一期。以上四期雖然學校的名稱和隸屬關係不同，但地址始終設在北京南苑，所以後來統稱為南苑航空學校第一、二、三、四期。

北洋軍閥政府辦理航空學校，雖有十五年的歷史，但只是造就了四期航空人才，其他毫無成績；對於飛機只能修護，不能製造，

也始終沒有建立空軍部隊。因此，在一九一九年以前，航空學員無人使用，亦無處可用。後來第一次大戰結束，各戰勝國家紛紛向我國推銷剩餘的陳舊飛機，而北京政府和各省軍閥鑒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空軍所發揮的巨大威力凌駕海陸軍之上，為軍事上新興的兵種，遂爭相購買飛機，羅致航空人才，辦理航空，從而航空人員一時聲價十倍，不為航空教育機關首長，即為空軍部隊骨幹。從此才開始改變了過去航空人員的冷落情況。

附一、南苑航空學校編制系統概要表



附二、南苑航空學校各期畢業學員姓名表

第一期

趙雲鵬 章 斌 金世中 黃靜波 杜裕源 王鳳翔

张纳墀	关丽生	关忠铭	刘保泰	楊文獅	刘振国
靳西銘	杜保銘	傅国栋	赵 助	翁松泉	吳經文
李藻麟	赵步墀	金 賢	蔡祖堯	刘既长	柯宗标
吳振璽	胡文彬	刘明章	錢迺斌	王勇智	关文海
馬恩錫	庄以临	方抱一	李金城	尉迟良	张 凱
赵希曾	孙华管	吳永忠	白永魁	曹崇俊	

第 二 期

蔣 達	沈德燮	周 明	王季子	朱同助	赵祥祿
罗 夔	支应遴	关应璋	吳汝夔	范兆棠	袁振卿
王尧周	张延齡	段席珍	鈕玉庭	李士怡	江光瀛
陈步洲	张画一	馬振昌	邹庆云	赵怀彬	张国輝
张守祿	陈屏藩	梁 富	和 震	周致戡	张子斌
白明印	赵天豪	何士龙	赵延緒	陈泰耀	刘道一
曹明志	馬毓芳	馬桂山	田兆霖	傅錦隆	邓建中

第 三 期

李 珉	陈嘉樞	葛世平	伊贊周	张 總	梁上轡
刘光克	万咸章	金巨堂	张书紳	陈海华	江紹榮
吳寿康	叶荣印	高 勤	米嘉禾	曹宝清	王立序
欧阳璋	胡百錫	顧荣昌	傅藜青	张家彦	韦庭鉅
陈思濂	盛建謨	黃 英	安思良	张維周	崔 鈺
刘泮芹	刘国楨	彭云庆	耿煜曾	謝云鶴	王貫一
梁璧堂	徐国一	李忠毅			

第 四 期

高在田	李瑞彬	曹文炳	胡光璿	丁普明	郝中和
紀广汉	王振五	严伟成	阮恩溥	王福恆	唐金声
袁宝琛	赵凤林	焦义成	呂振先	晏长祐	李云鵬
李錫哲	刘中檀	孔庆桂	王 貞	馬寿山	王世源
张国宝	陈德全	张守珀	苗福田	吳鴻裾	石曼牛
石宗汉	郭鴻湘	慕成化	楊郁文	李文祿	李錫珪